



#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季刊

2017年  
4-6月

我院荣获校人才工作先进集体及贡献奖荣誉称号

我院举办首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共商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我院举办首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我院冯帅章教授成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17 Firms in Emerging Economies Workshop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二零一七年 季刊  
4-6月

# 目录

CONTENT

**01**

学院要闻—— 01

**03**

学术活动—— 10

**05**

数据调查—— 104

**07**

IESR 人物—— 128

**09**

图说—— 142

**02**

科研动态—— 07

**04**

思想聚焦—— 50

**06**

对外交流—— 119

**08**

学生天地—— 133

## 学院要闻

我院顾问委员会主席 *James J. Heckman* 教授  
当选2017年度美国经济学会“杰出院士”



暨南大学宋献中副校长（左）与 Heckman 教授（右）

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 James J. Heckman 教授当选2017年度美国经济学会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杰出院士” (Distinguished Fellow)。美国经济学会杰出院士奖每年将授予于全球公认具有终身成就的杰出经济学家。学会将 Heckman 教授评价为科研成果极其丰硕并极具影响力的学者，称其为计量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人。Heckman 教授不仅在许多方法类研究中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他为整个人类社会作出了更为重大的贡献——“他使得我们重新思考了人类在健康与人力资本上的生命周期投资模式，并改变了人们对于重要公共政策的定义，如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Heckman 教授系芝加哥大学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人力资本与经济机会国际工作组 (HCEO) 创始人，2016年10月9日，获聘暨南

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是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因对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发展和贡献，与丹尼尔·麦克法登一起荣获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美国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学家所组成的学会，建立于1885年，被认为是经济学界最重要的组织之一。美国经济学会每年都会颁发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John Bates Clark Medal)、杰出院士 (Distinguished Fellows)、海外荣誉会员奖 (Foreign Honorary Members) 以及美国经济学期刊最佳论文奖 (the "Best Paper Award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s)。Heckman 教授曾于1983年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John Bates Clark Medal)，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入选的条件为“四十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者，并在经济学思想与知识上提供了卓越的贡献”。这个奖项被认为是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外，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

## 我院冯帅章教授 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2016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我院冯帅章教授获此殊荣。

政府特殊津贴制度是党和政府关心、关怀广大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激励他们充分发挥引领作用，为国家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的重要制度，也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人才保障的重大举措。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将获得由国务院统一发放的证书，同时每人还将享受一次性2万元的津贴。



为推进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及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人才工作坚持向国际化标准看齐，在国际人才市场上成功引进21位国外名校博士，并建立了一套对标国际的人才考评体系，为暨南大学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打造卓越师资队伍做出积极贡献。

首先，研究院坚持向国际人才市场迈进，自主引进高端人才。在人才引进工作上，学院在校人事处给予充分自主权的支持下，打破了以往通过人事处统一招聘的规则，按照现代经济学学术机构的通行做法，通过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博士招聘会延揽海外优秀人才。研究院成立一年多，已通过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招聘引进21位优秀博士，其中包括来自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顶级名校的海归博士。同时，研究院还通过建立学术委员会和特聘教授制度柔性引进若干名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带动整个研究团队的进步。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受邀任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Mark R. Rosenzweig，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经济系教授甘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教授胡颖尧等。

其次，考评对标国际，产出成绩显著。在成功引进了一批海外优秀人才之

后，我院参照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通常采用的终身轨（tenure-track）制度对其予以管理和考核。该制度给予科研人员稳定的工作环境，充分激发其研究潜力。成立至今，研究院的教师共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达20篇，其中不乏如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等经济学领域的顶级期刊。研究院通过激励机制的重构，推进高校传统师资管理与晋升制度的改革，充分激发师资队伍活力，带动学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助推“双一流”大学建设。

再次，我院建立了一支专业化行政团队，一切为科研服务。研究院建立了一支高素质、年轻化、专业性的行政服务团队，分管人事、财务、科研、外事、宣传等工作。学校在行政人员的编制规模方面也给予研究院一定的自主权。研究院始终坚持“行政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原则，为保障研究院正常运转实行弹性年假制度，为科研人员提供高效的后勤支持，大大提高了科研队伍的效率，也增强了全院职工的归属感，营造了和谐轻松的集体氛围。

研究院自成立伊始，得到学校的充分授权，在人事管理方面做了一系列创新尝试，成为“人才特区”的成功试验单位，效果显著。接下来，我院将继续在人才工作的创新与管理方面积极探索，砥砺前行。

## 我院荣获校人才工作先进集体 及贡献奖荣誉称号



冯院长在会议上介绍我院人才工作具体情况

近日，暨南大学表彰一批近年来在人才工作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荣获人才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荣获人才工作贡献奖，表彰结果充分肯定了我院自成立以来在人才工作方面的创新举措与突出贡献。



冯帅章教授（右四）接受颁奖

# 暨大招生咨询日上经济学 (国际化创新班) 专业受家长热捧

6月17日，暨南大学在本部图书馆举办2017年暨南大学招生咨询日活动，吸引了大量人流。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作为暨大今年新增专业也得到众多家长、学生的关注。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是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为培养经济类精英人才而牵头设立的本科专业。创新班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学术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今年该专业计划招生20人，其中广东12人(文科4人、理科8人)、安徽3人、山西2人、广西3人。

当日，暨大招生办公室召开了招生信息发布会，公布暨大今年招生计划、录取政策等招生信息。会上，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作为特邀嘉宾解答了家长就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这一新专业提出的问题，对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的师资力量、专业特色



信息发布会上张荣华副校长介绍暨大今年招生政策

及招生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发布会结束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了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专场宣讲会。会上，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助理谷一桢向众多感兴趣的学生及家长详细介绍了研究院的成立背景与目前发展情况，并就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的培养目标、招生计划、主要课程等方面进行细致讲解。

会场外，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也受到不少学生、家长热捧。学生及家长



对于全英授课、与国际接轨的培养模式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当得知创新班学费按暨南大学一般文科经管类专业教育标准(6060元)收费时，更表达了欣喜的心情。不少家长认为英语授课环境、以及专业导师制的精英化培养模式，能让自己的孩子在毕业后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就业都更具竞争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报志愿时“冲一冲”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

## 从上至下:

- 招生信息发布会现场
- 冯帅章院长回答现场家长与学生的提问
- 学生及家长前来咨询
-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助理谷一桢在宣讲会上介绍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
- 学生及家长围着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 科研 动态

我院助理教授史炜  
合作论文被国际期刊



**Real Estate  
Economics**

接受

近日，我院助理教授史炜的合作论文“The Accuracy of Senior Households’ Estimates of Home Values: Application to the Reverse Mortgage Decision”（合作者：俄亥俄州立大学 Donald Haurin 教授以及 Stephanie Moulton 教授）被国际期刊 Real Estate Economics 接受。

我院副教授徐吉良合作论文  
被计量经济学知名期刊

**Economics Theory**

接受

近日，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徐吉良副教授的合作论文“Injectivity of a Class of Integral Operators with Compactly Supported Kernels”

（合作者：Yingyao Hu,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usanne M. Schennach, Brown University）被计量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接受。



近日，我院副教授徐吉良的合作论文“Nonparametric Identification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Completeness”（合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教授胡颖尧）被计量经济学领域国际知名期刊“Econometric Theory”接受。

我院徐吉良副教授合作论文  
被计量经济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接受

## 我院副研究员孙伟增合作论文 被城市经济学权威期刊

###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接受

近日，我院副研究员孙伟增的合作论文“The Birth of Edge Cities in China: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Parks Policy”（合作者：Siqi Zheng，麻省理工学院房地产中心、城市研究与规划系副教授；Jianfeng Wu，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S）副教授；Matthew E. Kahn，南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被城市经济学权威期刊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接受。

近日，我院助理教授朱宏佳的合作论文“Run away? Air pollution and emigration interests in China”（合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秦雨）被人口经济学权威期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接受。

## 我院助理教授朱宏佳合作论文 在人口经济学权威期刊

###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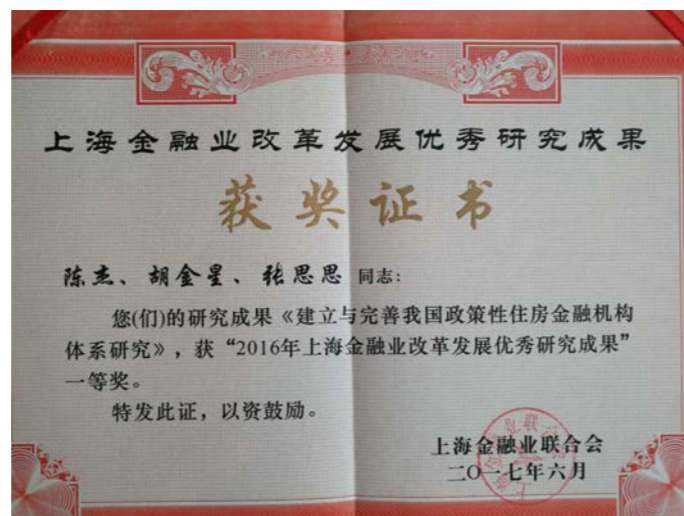
## 我院张思思老师合作成果荣获

### “2016年上海金融业改革 发展优秀研究成果”

### 一等奖

杰、胡金星）的研究成果《建立与完善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体系研究》荣获一等奖。该报告以推进棚户区改造作为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体系构建的最主要出发点，由此建立起来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同样可以用于推进新型城镇化、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和房地产去库存等。为此，该报告考察两种可能的建设方案。方案一是供给端与需求端相互分离的机构体系，方案二是以新成立的国家公共住房银行为统一平台。

近日，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公布表彰“2016年上海金融业改革发展优秀研究成果”的通知，我院副教授张思思老师与合作者（陈



# 学术 活动

# 首届流动人口子女 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 ——共商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与会人员合影

5月20日上午，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在暨南大学中惠楼顺利开幕。研讨会汇聚了美国、法国、中国、香港等国内外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学者，邀请了卫计委、民政部等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参会，议题聚焦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将开展为期两天的政策论坛与学术报告活动。



上：会场全景  
中左：广东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容锡宏  
中右：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  
下：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





上午的议程包括了会议致辞与主题报告，会议由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主持。他首先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的嘉宾莅临研讨会，他称本次研讨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自政府部门、教育战线的领导、长期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专家学者以及多位学界新秀参会，给予了会议大力的支持。冯帅章称本次会议的主旨有三点：搭建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的平台，搭建留守儿童研究与流动儿童研究相结合的平台；搭建将北京、上海、广东的研究学者联系起来的平台。

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称，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在我国高速推进的城镇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子女，在他们的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中面临独特的挑战。如何解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暨南大学与经济社会研究院组织这次研讨会暨政策论坛，非常有现实的意义。论坛的目的在于为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究提供更广泛的政策视野，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政策讨论提供更加坚实的学术研究。他相信通过在座各位嘉宾在本次会议上的思想碰撞，流动人口子女问题本身也将会引起社会各界更加广泛的关注。

接下来，广东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的容锡宏处长也为大会致开幕辞，他代表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对各位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和各位领导表示热烈欢迎。他总结了广东省对于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出台的政策，去年广东省民政厅对全省农村留守儿童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摸查、入户调查，现在已经完成了大约 25 万农村留守儿童的入户关爱建档等工作。同时，省民政厅联合了有关部门，开展了对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的专项活动，加强对无人监护的、父母一方外出，或另外一方不予监护，比如服刑人员子女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今年省民政厅准备启动双百镇社工工作服务计划与入户关爱计划。他认为，流动人口子女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不同的领域为孩子们发声呼吁，共同营造关爱保护的社会氛围。

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为大会致开幕辞，他代表暨南大学与胡军校长向各位出席会议的专家领导和来宾



自左到右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研究所所长吴霓

国家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处长杨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

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陆建非

## 四大主题报告聚焦政策研究前沿

在大会开幕致辞过后，进入到了主题报告阶段。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作了题为“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财政供给政策”的主题报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研究所所长吴霓作了题为“流动人口子女异地高考政策实施状况调研分析”的主题报告，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陆建非作了题为“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几个突出问题——以部分大城市调研为例”的主题报告，国家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处长杨剑作了题为“高度关注并切实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主题报告。四位来自政府部门、教育战线以及长期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学者分享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政策现状、实地调研报告，为本届会议的主题提供了更广泛深入的视野。



# 会场交流



## 政策论坛围绕“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

本次会议举办的两个政策

论坛围绕“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展开。“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论坛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主持，讨论嘉宾包括国家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处长杨剑，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局长彭波，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张宏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宋映泉，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公共服务处刘晶晶。而“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政策论坛由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政策论坛讨论现场



陆建非主持，讨论嘉宾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冯文猛，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广州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教育学院教授吴开俊及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在政策论坛中，各位嘉宾深入交流，各抒己见，给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视带。

(关于政策论坛的详细讨论内容  
请见本刊思想聚焦栏目)

政策论坛讨论现场



## 中英文学术报告 助力议题深入

本次研讨会共举办了**两场学术报告**。学术报告英文专场由**美国巴克内尔大学 (Bucknell University) 经济系助理教授林树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Albert Park**，**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张宏亮**及**巴黎经济学院博士生黄旻**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学术报告。

-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助理教授林树明报告了题为“Social Disadvantage and Child Health among China’s Rural-Urban Migrant Households”学术论文。本文使用 RUMiC2008-2009 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家庭的社会劣

势情况与子女营养状况的关系。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家庭、老家以及现居住城市的特征之后，与年龄相对应的体重仍和农村户口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女性户主家庭孩子的营养状况并不比男性户主家庭的孩子要差；女孩子的营养状况通常比男孩子要差。此外，文章还运用 Oaxaca 分解、反事实分析等方法证实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差于流动儿童。

-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Albert Park 的报告主题为“Educational discrimination and school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igrant children”。根据 2010

年的人口普查，中国有接近 38% 的儿童属于流动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歧视，具体表现为流动儿童的学费比本地户口儿童更高。本文利用 2001、2005 以及 2009 年的 CULS (China Urban Labor Survey) 数据分析了流动儿童在城市上学的影响因素，并重点探讨教育歧视对流动儿童上学地点的影响。最后，本文采取了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不存在教育歧视时流动儿童在城市上学的比例。结果发现，教育歧视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推广整体呈下降趋势；更多流动儿童选择在城市上学，但在城市高中就读的流动儿童比例增长较慢；受到户口条件的限制、学费上的差别使流动儿童在城市上学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助理教授  
林树明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Albert Park



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 张宏亮

的比例显著降低，尤其在高中教育阶段。

● 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张宏亮报告了题为“Family Background, After-School Tutoring,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本文实施了一项关于课后辅导的随机对照实验，该实验招收成绩较好的四、五年级学生为成绩较差的二、三年级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课后辅导。结果表明，该试验显著提高了接受辅导学生的数学成绩，但对语文成绩没有影响。其中，对于父母双亲均外出务工的学生而言，他们的数学成绩的提升显著大于单亲外出或双亲均在家中的学生。文章还发现，相比于双亲均外出的学生而言，单亲外出或双亲均在家中



巴黎经济学院博士生 黄旸

的学生的家庭辅导大大减少，这表明，家庭辅导投入的替代性是该项目对留守儿童和其他学生具有不同效果的主要原因。此外，研究还表明该课后辅导项目对高年级学生的考试成绩没有任何不利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间接地证明了家庭辅导不足可能是父母陪护缺失影响留守儿童认知能力的渠道。文章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过程中的父母缺位加大了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甚至其他农村儿童的差距。

● 巴黎经济学院博士生黄旸带来了题为“Children Left Behind in China: The Role of School Fees”的论文分享。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务工，留下大量留守儿童在农村生活。本文利用Rumic2008-2009年的数据探讨儿童为何无法随父母一起外出，并分析城市学费是否阻碍孩子随父母流动。首先，本文构造了家庭效用模型，认为家庭效用由家庭可支配收入、孩子人力资本等因素决定，若孩子跟随父母一起流动获得的净收益为正，则父母会带着孩子一起流动。当再定居成本足够大时，学费的增加将影响父母安

置孩子的决定。接着，黄旸以当地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比例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分析发现：学费限制家庭的迁移；受当前财政体制的限制，外来务工人员仍然需要为孩子在城市上学付额外的费用，使外来务工人员的整体福利受损。

**本次大会的中文学术报告专场由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候海波，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宋映泉，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魏东霞，北京大学现代农业学院副研究员王晓兵及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刘玉照为大家精彩呈现。**

**候海波（中国社科院）：寄宿与留守对农村儿童卷入校园欺凌的影响**



● 如今校园欺凌在全世界中小学普遍存在，但常被校方和家长视为孩子间的“戏耍”，这种校园欺凌不仅造成心理障碍、行为失范和辍学，甚至还增加了成年犯罪风险。而且中国特有发展阶段和经济转型期，校园欺凌现象更加严重，再加上户籍制度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城乡教育资源布局不均等造成诸多问题。因此本文利用“农村寄宿制学校调查”联合课题组于2015年在河北和四川对137所农村寄宿制小学收集的数据，结合工具变量法探究寄宿且留守的儿童与是否卷入欺凌的关系以及卷入欺凌儿童的内外化行为和学业水平状况。

结果发现寄宿且留守的儿童可能由于童年与父母分离，缺少家庭日常关爱与保护，更容易卷入欺凌；卷入欺凌的儿童内外化行为及学业水平均处于劣势，且“被人欺负也欺负别人”这类儿童辍学和成年犯罪的风险高。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相关的治理思路，即国家应该提供充足的生均公用经费保证校园管理的专业和有效；提升生活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升班主任的素质与责任心；而最根本的是要打破户籍制度壁垒和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农村寄宿且留守的儿童不再是迁

移成本和城乡二元制度成本的承担者。

**宋映泉（北京大学）：谁是最弱势的农村儿童？——回流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



● 根据2016年中国最新公布的相关数据，全国留守儿童已达到约902万，另外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回流儿童的增加。本文运用“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睡前故事随机实验”基线和第一次跟踪数据，包括河北、四川5个县，137所学校，探究了回流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所造成的影响，比较所有农村儿童之

中，谁才是最弱势的群体。

通过对样本儿童学业表现、身体发育及睡眠情况、心理发展、校园人际关系等四个方面的测试，发现回流儿童与非回流样本、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相比，在学业、心理和校园霸凌等几方面都显出弱势。而且相关回归和稳健性分析表明回流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

（睡眠、人际关系、外化、抑郁、自尊等）有负面影响，加上父母外出打工对子女成长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孩子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从而对学业发展（阅读习惯、阅读能力）有显著负面影响，也增加了这个群体留级的可能；随迁时间越长，其负面影响越大；如果留守儿童在幼儿园阶段回流，那么对其学业发展没有显著影响；最近一年回流的负面影响越大，但影响机制有待继续探讨；特大城市的以教育控人以及高考制度导致大量流动儿童回流成为留守儿童有长远的社会代价。

## 魏东霞（暨南大学）： 落户门槛、技能偏向 与儿童留守——基于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 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



● 由于户籍分割，流动人口居家迁移率偏低，存在着亲子分离的问题，大量的孩子成为了留守儿童。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主要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度量了不同城市落户的难易程度，提出了 2 个假说：1. 高落户门槛提高了流动人口家庭儿童留守特别是独自留守的概率；2. 城市落户门槛的技能偏向增加低技能流动人口未成年子女留守的概率。

本文采用 2014 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 46 个城

市落户门槛指数数据以及建立回归方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落户门槛与儿童留守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贡献有以下 3 点：1. 现有文献认识到户籍是留守儿童产生的主要原因，但忽略不同城市户籍制度的异质性，亦缺乏实证检验，本文实证检验了落户门槛与儿童留守之间的关系；2. 现有文献缺乏户籍对流动人口影响的异质性；3. 本文发现流动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产生留守儿童的重要原因。

## 王晓兵（北京大学）： Migration, Schooling Choice and Student Outcomes in China



● 大量的流动儿童因为户口制度不能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本文将留守儿童分为了三类：1. 父母外出，孩子进入移民学校；2. 父母外出，孩子留在家，进入农村公立学校；3. 父母在家，孩子进入农村公立学校。根据这三种留守儿童类型对移民和农村公立学校的学生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尤其是以下两点研究：1. 在同一周内对移民和农村公立学校的学生进行统一测试，比较两者之间的分数差别；2. 研究了父母移民对学生数学分数以及学习上焦虑的影响。

本文数据来源于上海和苏州 87 所农民学校，以及安徽 5 个县中 30 个农村公立学校的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 父母的移民状态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有显著的影响；2. 第一种类型的学生表现低于第二和第三种类型的学生；3. 对比第二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父母的移民状态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没有影响。

最后本文给出两点政

策意义：1. 学术进步将为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提供更优质的移民儿童，同时，这也是中国未来社会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核心；2. 城市学校系统应该建立扩张计划，不管户口如何，都可以让学生接受公共教育。

## 刘玉照（上海大学）： 制度衔接、结构转型 与流动子女义务后过 渡教育



● 流动儿童的义务后“过渡期”是指流动儿童离开义务教育段的中小学之后，到正式进入就业之前这段“过渡期”。这个“过渡期”产生的基本原因是因为按照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儿童一般是截止当年 8 月 31 号满 6 周岁

入学，经过 9 年义务教育，6 月份初中毕业的时候，绝大部分同学年龄应该是在 14-15 周岁之间，最大的距离满 16 周岁应该还有 3 个月的时间。按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满 16 周岁是不能参加就业的，也就是说，如果企业雇佣了 16 周岁以下的人，就属于雇佣童工，属于违法行为。

这样问题就来了，我国目前绝大部分初中毕业生，除了继续求学之外，大概会有不多于 3-15 个月的“过渡期”，在这个期间，他们既不能入学，也不能参与就业，那么这个“过渡期”该如何度过？来自田野的经验证实目前这批孩子主要的出路有三个：

(1) 最好的出路是通过各种关系非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虽然工资少一点，但是成为问题青少年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2) 其次一个出路是整天宅在家里上网、玩游戏，因此染上网瘾而不能自拔；

(3) 成为无业游民，整天在大街上溜达，拉帮结派，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严

重的危害社会。

对于后面两种情况，无论是网络成瘾，还是进入团伙中，很多人一年之后，即使达到了合法就业年龄，再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变得很困难。因此需要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文章提出几个建议来流动儿童义务后的“过渡期”难题。首先可以利用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过剩的”职业教育资源或成人教育资源开放给流动人口子女。其次可以考虑利用民工子弟学校资源，延伸一年义务教育，实行职普结合。最后还可以实行青年见习岗位计划，创新企业内部的“师徒制”，以此解决流动儿童义务后“过渡期”教育。

# 2017 城市与房地产 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2017 Urban and Real Estate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6.7-6.10 JN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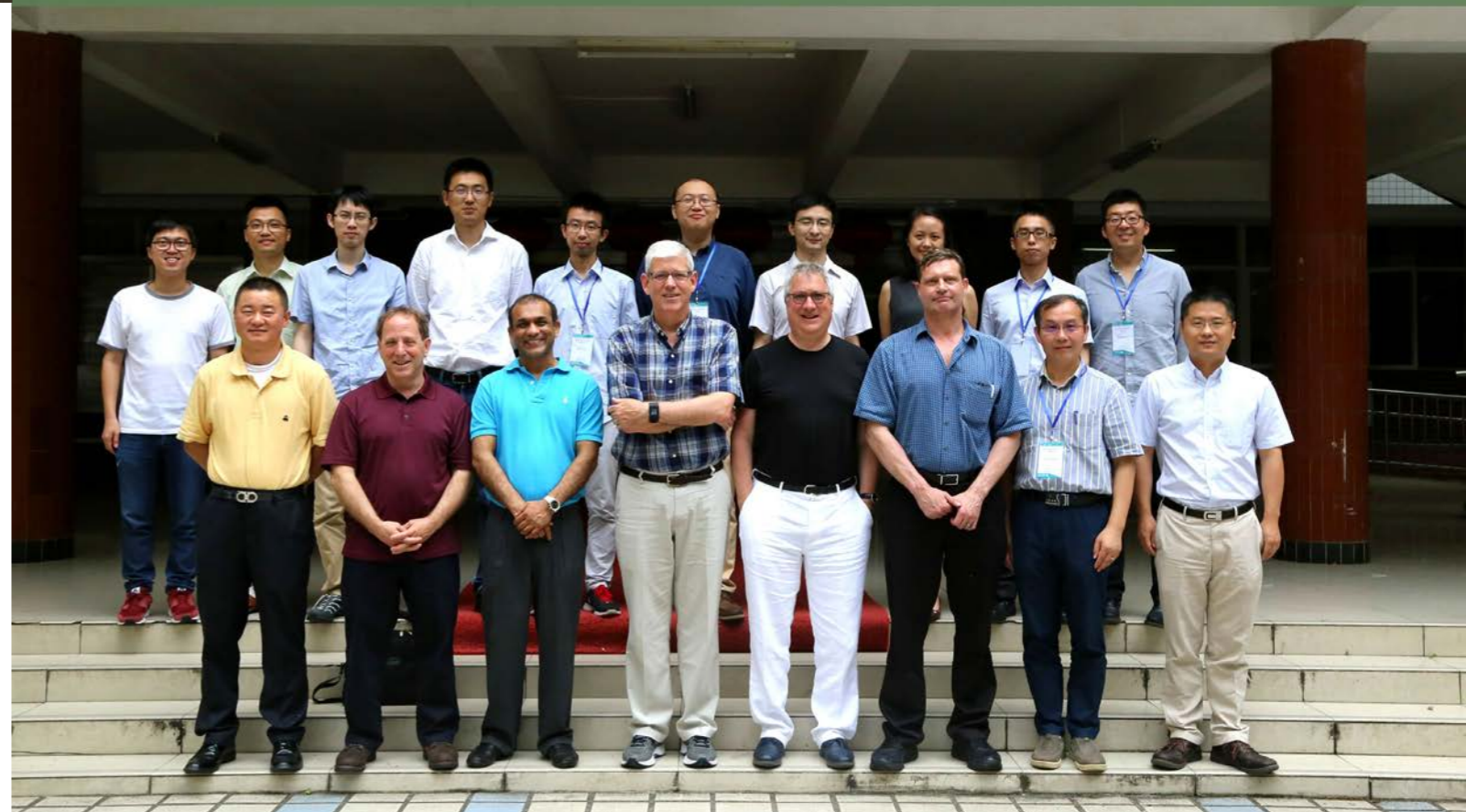
座谈会现场



与会嘉宾与校长合影

除了主题报告、政策论坛及学术报告外，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在本次会议中还主持召开了广东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座谈会，大会的参会嘉宾与广州各区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齐聚一堂，详细了解各学校的基本情况，包括招生政策、学生生源、学费收取以及财政支持等问题。

本次大会加深了学术界和政策界的联系与交流，为政策制定与实证研究提供了良好平台。同时也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和新的信息，加深了各界对流动人口子女问题的理解。



与会人员合影

● 6月10日，为期4天的“2017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圆满结束。来自城市与房地产顶级期刊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Real Estate Economics*,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的主编齐聚 IESR，来自 *Georgetown Universit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张思思进行开幕致辞

Ohio State University, Syracuse University,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名校近20名学者在研讨会上带来了精彩的学术分享。4天的研讨会包含了学术讲座、学术报告、政策论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位参会嘉宾带来了多元的视角与研究。

来自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助理教授谷一桢作了题为“*Preliminary Descriptions of th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Market*”的报告



俄亥俄州立大学 Mark Partridge 教授对此进行了点评



伊利诺伊斯大学香槟分校 Daniel McMillen 教授作了题为“*Decompositions of Spatially Varying Quantile Distribution Estimat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okyo House Prices*”的报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史炜进行了点评



来自加拿大银行的周捷作了题为“*Household Portfolio Choice Before and After House Purchase*”的报告



南开大学助理教授张云齐进行了点评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 **李涵**  
作了题为 “*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on Firm  
Inventory*”  
的报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副研究员 **孙伟增** 作了题为  
“*Does Home Purchase  
Restriction affect Elite  
Graduates' Job Search?*”  
的报告



伊利诺伊斯大学香槟分校的  
**Daniel McMillen** 教授  
进行了点评



新加坡国立大学 **符育明** 教授  
进行了点评



来自南加州大学的  
**Richard Green** 教授  
作了题为  
“*Wage Spillovers,  
Housing Cost Spillovers,  
and Child Outcomes*”  
的报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副教授 **张思思** 作了题为  
“*Understanding Housing  
Demand in Urban China*”  
的报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助理教授 **朱宏佳**  
进行了点评

乔治城大学 **Sumit  
Agarwal** 教授对此进行了  
点评





雪城大学

**Stuart Rosenthal**

教授作了题为“*Building Specialization, Anchor Tenants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  
**赵大旋** 对此进行了点评



俄亥俄州立大学  
**Mark Partridge** 教授  
作了题为“*Agglomeration and Firm Wag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的报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助理教授 **薄诗雨**  
对此进行了点评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  
理教授 **刘诗濛** 作了题为  
“*Housing Wealth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ina*”  
的报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助理教授 **史炜** 作了题为  
“*A Dynamic Discrete Choice Model of Reverse Mortgage Borrower Behavior*”  
的报告



雪城大学  
**Stuart Rosenthal** 教授  
进行了点评

乔治亚州立大学副教授 **姚文雄**  
对此进行了点评





Housing Policies: What Have We Learnt from U.S. Experience?  
圆桌论坛现场

● 乔治亚州立大学副教授 **姚文雄** 及乔治城大学 **Sumit Agarwal** 教授分别带来了长达 3 小时的专题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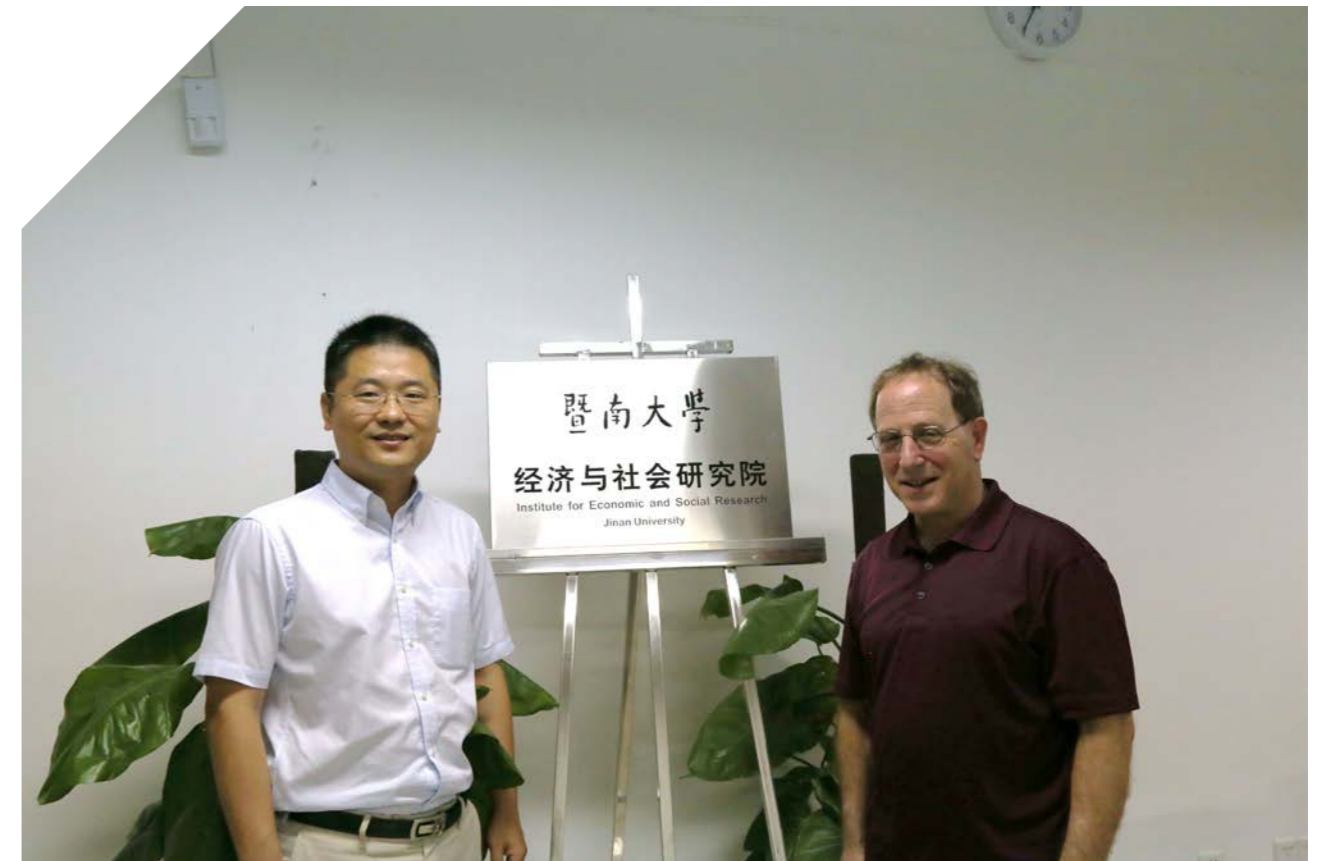
● 会议间隙，参会嘉宾之一、美国雪城大学经济系教授 **Stuart Rosenthal** 还专门访问了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并与冯帅章院长进行了友好交流。他表示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团队有着雄厚的实力，在顶级期刊上发表多篇高质量论文，他十分看好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发展。



乔治亚州立大学副教授 **姚文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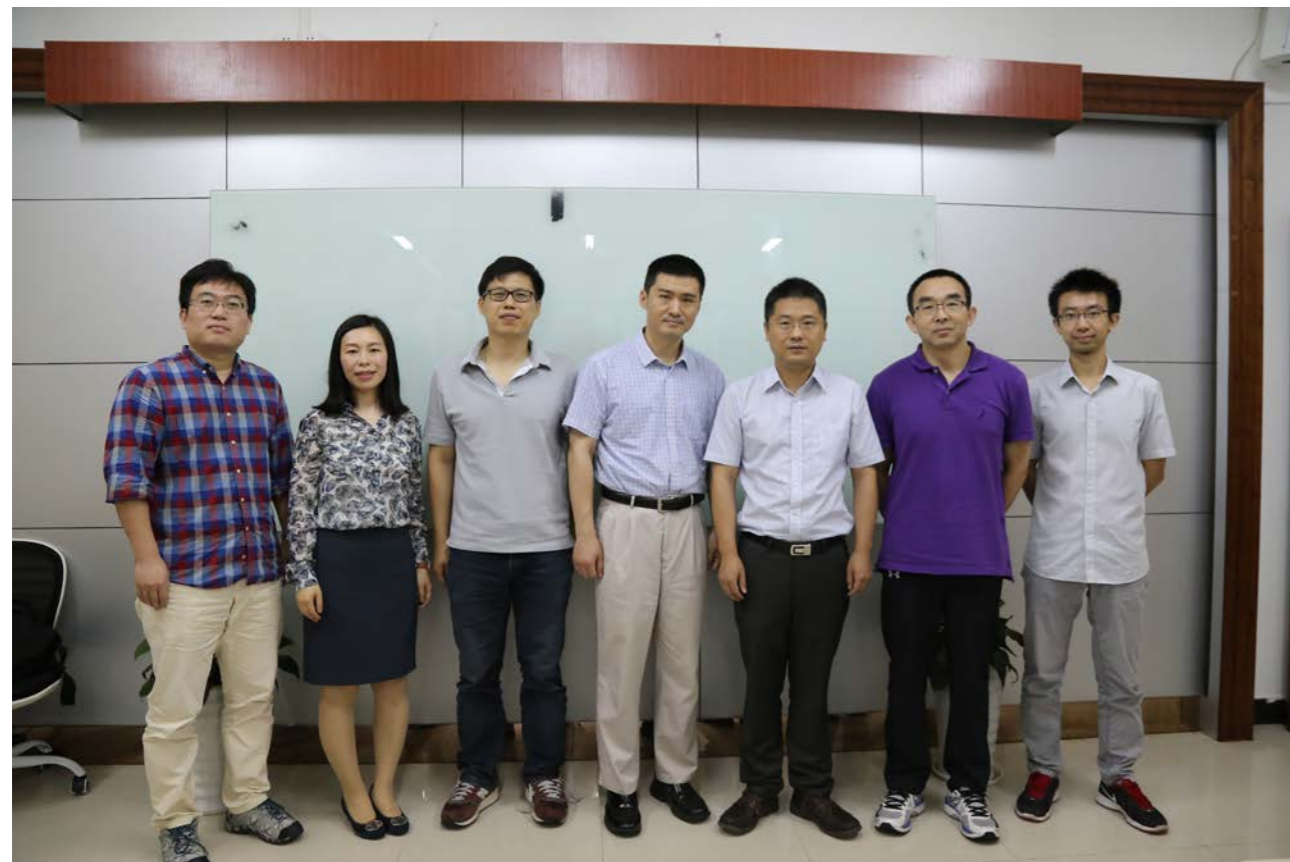
乔治城大学 **Sumit Agarwal** 教授



冯帅章院长与 **Stuart Rosenthal** 教授

#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计量经济学学术研讨会

● 2017年6月14日，我院主办的计量经济学学术研讨会在中惠楼106B室顺利举办。来自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的学者们报告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与会嘉宾合影

斯坦福大学 洪瀚 教授  
报告了题为“Numerical  
Delta Method and  
Bootstrap”的论文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  
授 王晓虎 带来了题  
为“*In-fill Asymptotic  
Theory for Structural  
Break Point in  
Autoregression: A  
Unified Theory*”  
的论文报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  
究院副教授 徐吉良 分享  
了题为“*Specification  
Testing and  
Simple Close-form  
Estimation for  
Nonparametric IV  
Regression Models*”  
的论文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  
授 颜瑾 分享了题为  
“*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the  
Random Utility Model  
with Rank-Ordered  
Choice Data*”  
的论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胡颖尧 教授报告了题为  
“*Dynamic Decisions  
under Subjective  
Beliefs: A Structural  
Analysis*”的论文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  
究院助理教授史炜 报  
告了题为“*A Dynamic  
Spatial Panel  
with Endogenous  
Interaction Matrices  
and Common  
Factors*”的论文



冯帅章院长与洪瀚教授

● 参会嘉宾斯坦福大学洪瀚教授在会议间隙还与我  
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进行了友好交谈。交流当中洪瀚教  
授对研究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表示非常看好经济  
与社会研究院的发展，希望未来在计量经济学领域可  
以与我院教师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 首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 2017年6月26日-6月28日，汇集全球顶尖学者的“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顺利结束。来自牛津大学、杜克大学、多伦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名校的顶尖学者在为期3天的研讨会中共同探讨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问题。本次会议除了加强学者在国际贸易、产业组织和发展经济学领域间的互动，还为学者们交流讨论不同国家的微观企业数据质量提供契机，成为了全面比较不同国家间微观企业数据的分享平台。此外，五位顶尖经济学家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圆桌讨论也为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创新政策提供了创新性观点。



会议现场



达特茅斯学院  
Nina Pavcnik 教授报告了题为“*Export Markets and Labor Allocation in a Low-income Country*”的论文



杜克大学助理教授  
Rafael Dix-Carneiro 带来了题为“*Margins of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Trade in a Developing Country*”的论文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教授 James Tybout 报告了题为“*Born-to-Export Firms*”的论文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助理教授 蔡澍 报告了题为“*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ducational Choice: Evidence from China*”的论文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教授 冯帅章 分享了题为“*Human Capital and Directed Technology Change: Evidence from China's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的报告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  
张红松 带来了题为“*Monitoring, Input Prices,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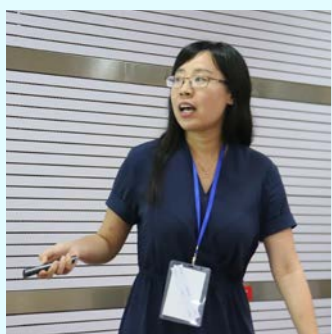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助理教授 王歆  
带了题为“*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l Migration with Labor Market Distortions*”的论文



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  
**Pamela Medina**  
分享了题为“*Within-Firm Responses to Import Competition: Quality Upgrading and Exporting in the Peruvian Apparel Industry*”  
的论文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助理教授 **白洁** 报告了题为“*Collective Reputation in Trade*”  
的论文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 **Mark Roberts** 报告了题为“*The Long Run Return to R&D in Taiwan Electronics Industry*”  
的论文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魏尚进** 分享了题为“*Intrinsic Openness and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Quality*”  
的论文



哥伦比亚大学 **Eric Verhoogen** 教授分享了题为“*Using Exchange Rate to Estim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Evidence from Colombia*”  
的论文



多伦多大学教授 **Loren Brandt** 报告了题为“*Stage-level Production in Chinese Steel Sector*”  
的论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 **Rocco Macchiavello** 带了题为“*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the Coffee Chain in Producing Countries*”  
的论文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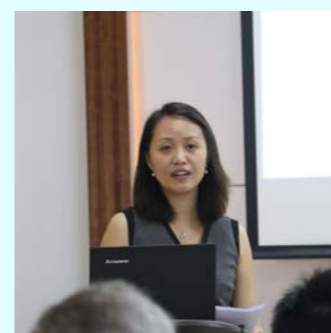
杜克大学教授 **徐熠** 带来了题为“*Notching R&D Investment with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in China*”  
的论文分享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陈祎** 分享了题为“*Marriage, Childrearing, and the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within the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的论文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张思思** 带来了题为“*A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Housing Demand and Supply in China*”  
的论文分享



复旦大学副教授 **李志远** 报告了题为“*Terms of Trade Gains from Task Offshoring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asks*”  
的论文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 **陈婷** 分享了题为“*The Speculation Channel and Crowding Out Channel: Real Estate Shock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in China*”  
的论文



## 企业微观数据分享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助理教授 **白洁** 分享了中国企业的微观数据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 **Mark Roberts** 展示了美国及欧洲的研发创新数据



杜克大学助理教授 **Rafael Dix-Carneiro** 分享了巴西企业的微观数据

## 圆桌论坛讨论

● 圆桌论坛由杜克大学教授徐熠主持，多伦多大学教授 Loren Brandt、清华大学教授鞠建东、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北京大学教授余淼杰及教授张晓波共探讨了中国产业政策相关话题。



圆桌论坛现场

与会嘉宾合影



## 芝加哥大学 再度牵手 IESR

### 2017 Summer School 震撼一夏

● 6月30日，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ESR) 与芝加哥大学 HCEO 国际工作组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Global Working Group) 联合举办的“2017年广州暑期学校项目 (Summer School on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Guangzhou at Jinan University)”圆满结束。本次暑期学校项目进行为期5天的专门授课，吸引了来自波士顿大学、

哈佛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新加坡管

理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顶尖学校的学子，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顶尖经济学家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经济学课程。在课程结束后，每位学生都获得了 HCEO 工作组与 IESR 共同颁发的结业证书。

短短5天的课程结束了，相信各位学子的经济学之路将会越走越远。



中国人民大学 **赵忠** 教授讲授了题为“*Demographic Change, Labor Market, and Economy in China*”的课程



康奈尔大学 **Lawrence Blume** 教授讲授了题为“*Introduction to Networks*”的课程



杜克大学 **徐熠** 教授讲授了题为“*Productivity,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Dynamics*”的课程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和研究顾问 **Bhash Mazumder** 讲授了题为“*Economic Research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的课程



西班牙朋培法普拉大学 **Ruben Enikolopov** 教授讲授了题为“*Information Inequality and Social Image*”的课程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Christopher Taber** 教授



同学们都收到了结业证书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付超** 教授

上课瞬间



多伦多大学 **Loren Brandt** 教授

# SEMINAR



第**36**期：

上海财经大学  
副教授**黄振兴**谈  
对自然事件模糊性  
测度的新方法



第**39**期：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  
**肖俊极**谈  
中国能源规制政策  
的福利影响



第**40**期：

复旦大学  
助理教授**兰小欢**谈  
家庭背景与国家政策对  
中国商业经营的影响分析



第**37**期：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张川川**谈  
中国的宗族、创业精神  
及私人企业的发展



第**38**期：

澳门大学  
教授**Rose Lai**谈  
双“国”记：中美房地  
产场的繁荣、泡沫和破灭



第**41**期：

武汉大学  
助理教授**潘振宇**谈  
Partisan and Bipartisan  
Gerrymandering



第**42**期：

中国人民大学  
助理教授**赵大旋**谈  
中国的外来  
务工人员与城市





第**43**期：  
香港科技大学  
助理教授**黄阳光**谈  
金融诈骗与  
投资者的认知



第**44**期：  
香港浸会大学  
助理教授**王睿新**谈  
礼品互换与风险共担：  
信号传递理论与来自  
中国农村的证据



第**47**期：  
中国人民大学  
副教授**龚亚珍**谈  
空气污染对中国死亡率的异  
质性影响：来自县级  
面板数据的证据



第**48**期：  
中国人民大学  
副教授**陆方文**谈  
随机经历对人们态度  
的影响：来自北京汽车  
摇号的证据



第**45**期：  
西南财经大学  
副教授**赵国昌**谈  
唐山大地震对当地  
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第**46**期：  
中国人民大学  
讲师**马骏**谈  
最小对比度回归不连续  
设计的实证似然操作测试



第**49**期：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李龙飞**教授谈  
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广义  
经验似然估计和检验



第**50**期：  
多伦多大学  
副教授**韩璐**：  
融资约束是否能  
抑制房价暴涨？



第 51 期：  
新罕布什尔大学  
教授**黄如锦**谈  
校正现场抽样偏差：  
应用于娱乐需求  
分析的新方法



第 52 期：  
上海财经大学  
副教授 **Nathan Schiff**：  
欢迎光临！新菜单上市：衡量  
产品对竞争的反应



第 55 期：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沈凯玲谈  
中国的国企、户籍  
与工资的关系

## 暨南论道 系列讲座



第 53 期：  
清华大学  
副教授**吴斌珍**谈  
劳动力市场经验与快速  
增长经济体中的教育回报



第 54 期：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教授  
**Jens Suedekum** 谈  
空间工资收入差距——  
员工、企业及匹配效应



● 2017 年 5 月 8 日，香港科技大学 Albert Park 教授为暨南大学师生作了题为 “The Changing Demand for Tasks and Skills in China” 的公开讲座。此次讲座是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暨南论道” 公开讲座系列的第十一讲。在讲座的开始，Albert Park 教授首先展示了

第 11 讲：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Albert Park** 谈  
中国职业和技能  
需求的变化

一个基本事实。根据世界银行 2016 年的研究报告，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都呈现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作正增长，中等技能工作负增长的“正 U 型”模式。然而中国却呈现出相反的模式，尽管高技能工作存在正增长但其幅度远小于中等技能工作增加，而低技能工作则减少，存在“倒 U 型”模式。

## 思想 聚焦

中国缺少能够直接测度职业技能的数据。对此 Albert Park 教授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即将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与美国劳工部 2003 年职业任务数据 (ONET) 相结合、利用中国社科院收集的 2016 年六个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中关于职业任务的信息 (STEP) 以及利用他本人和合作者 2015 和 2016 两年在广东、湖北两省收集的企业员工匹配数据 (China Employer-Employee Survey)。

结合上面的三种方案，Albert Park 教授证实了世行报告中关于中国职业技能需求的“倒 U 型”模式。2000 年至 2015 年间，中国对中等技

能的需求快速增长，而对高技能和低技能的需求总体呈下降趋势。Albert Park 教授认为中国职业技能需求的“倒 U 型”模式可以归因于产业结构改变、全球化、技术进步与教育扩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对中等技能的需求。机器替代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重复性任务的需求。教育扩招并没有显著增加高技能需求，反映出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技能和职业匹配困难的问题。Albert Park 教授最后指出随着技术进步和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未来中国对于劳动技能的需求将很有可能转向“正 U 型”模式。



● 5 月 17 日下午，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第 12 讲在中惠楼 106 开讲，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简锦汉教授作了题为“教育对于健康的影响”的报告。该研究将台湾的人口普查数据与健保数据进行匹配，将 1968 年台湾的九年义务教育政策作为一个自然实验，利用

### 第 12 讲： 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 简锦汉谈 教育对健康的影响

断点回归的方法考察教育对于死亡率、疾病、健康习惯及医疗使用情况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减低了男性的死亡率，但对女性没有影响，这其中一部分影响可能是源于教育对于收入的正向影响。同时，教育减低了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增加了门诊频率及医疗费用，但减少了住院频率与金额。

# 流动人口子女问题专题

## 冯帅章对话 诺奖得主 Heckman: 中国流动人口 子女问题

编者按:

本文内容基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J. Heckman 教授在 2015 年 11 月 19 日于上海的英文谈话, 文本略有删减及调整, 小标题为编辑方便读者理解而添加。

### 儿童发展理论

**冯 (以下简称 F):**

Heckman 教授,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您。我知道您虽然到过中国很多次, 但还是第一次到上海。我感觉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我们的谈话可以随意一些, 您也可以随时问我问题。

**Heckman 教授 (以下简称 H):** 好。非常高兴能够和你交流。

**F:** 首先, 我想问您一些关于人类发展 (human

flourishing) 的问题。我在您的主页上了解到您最近在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我也知道您非常强调儿童时期对于人生技能和长期发展的关键性。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会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能否请您阐述一下您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理念、主要发现和下一步的研究吗? 另外, 许多人也好奇您作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都非常有建树, 为何选择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将主要研究精力投入到儿童发展方面?

**H:** 其实我的研究是对于经济学已有领域的发展。人类发展是一个有关生活方方面面的, 是比人力资本更广阔的概念。经济学家应该对除了货币收入以外的东西更加感兴趣, 因为我们希望得到更全面的对于人类的活动和福祉的理解, 这是我研究的出发点。

研究人类发展首先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衡量人类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比以前有了更好的理解。我们之前认为人类的发展和教育、学校、成绩等等认知能力方面的因素联系最密切, 我们现在了解到其实能力的维度非常多样化, 而认知能力以外的很多东西往往也非常重要。其次, 人类技能发展其实有一个生命周期, 即有着非常不同的关键激励周期和技能进化周期。而这些关键激励周期对于政策的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再次, 与学校教育相对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家庭教育。家庭在孩子的学前教育、学校学习以及对孩子的帮助和鼓励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要关注更广范围的东西, 要认识到基因不是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 还有环境、教育等都很重要, 还有很多教育过程不止是发生

在学校, 还发生在家庭、工作地点等等环境里。所以这些都是对于之前研究的一种延伸。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比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提过人类繁荣的概念。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话题, 因为这些都和促进发展的有效政策息息相关。我们现在一个比较大的发现就是孩子早期的学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社会环境下有很多家庭都处于经济压力之下, 尽管可能比三四十年前的家庭更富裕一些, 这些家庭很可能没有为小孩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 不仅仅是财力资源, 还包括时间、激励机制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领域, 这对于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个人对此感到非常的兴奋。

**F:** 所以您下一步会怎样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主要通过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

**H:** 实证分析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同时也需要更好的理论模型的支撑。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人类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是由新的实证数据指引的, 而实证数据的搜集很大一部分又被理论研究的发展所驱动, 所以我也会继续在理论比如说生命周期技能动态发展理论上做努力。举个例子, 我之前有一个很聪明的学

生, 他目前正在尝试建立一些理论试图去理解父母的知识结构对儿童发展的作用。一些低收入家庭例如单亲妈妈、青少年妈妈对于如何良好地培养孩子的知识非常匮乏, 她们不知道如何与孩子沟通、鼓励孩子、促进和支持孩子在学校的发展。这不仅仅是对事实的描述, 更提供了政策性建议。所以, 基于这些观察他对于这些方面的活动进行了更多细化的度量, 同时也发展了相应的理论。这其实就是科学的发展过程, 测量和理论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科学的良好发展都比较流行这样一个过程。我认为当前的人类发展领域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延伸和发展, 这非常重要, 因为在各个阶段涉及到各个方面, 比如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健康、和他人的关系等等, 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就是政策方面, 我们如何令人信服的去评价一个政策, 去理解这个政策的运行机制, 不是简单的说这个政策可能会有效, 而是为什么这个政策会有效? 我们做的很多实地项目包括实验都可以去验证政策是否有效, 但是只知道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影响的,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好更有效, 这些就是在理论上现在的进展。我个人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我希望能够花费我的整个人生去研究人力资本, 很早之前我就研究过这方面, 当我在一次失败之后重新

再回到这个方向上时, 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 它可能可以从早期的时候就改变一个人, 甚至影响整个社会, 提高社会公平和生产效率, 影响社会中的每个人。

### 留守儿童问题

**F:** 说到儿童的发展, 我想您知道中国存在的持续的人口流动现象, 而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流动人口子女问题。据估计, 目前中国有大约 1 亿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从儿童发展的角度, 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当然中国存在如户籍政策等比较独特的制度安排。您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到底是一个例外还是有更一般的意义?

**H:** 我对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还是有所接触的。我认为具体的数字可能会因计算方式的不同而有差异, 比如父母双方都在外面或是父母一方在外, 或者是否是被祖父母抚养等等。前几年我通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曾经参与过这方面的探讨, 他们邀请我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 我们谈论了中国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问题, 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会有助于改进政府的相关政策。大家都知道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的营养需要往往得不到满足,

所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最初实施了一个营养改善计划，为孩子提供营养。

我和伯克利大学的 Paul Gertler, Sally Grantham-McGregor 及其他合作者基于牙买加的一个研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个研究是基于 1986 年到 1987 年间 Sally 团队在牙买加的一个随机实验。实验的干预针对发展迟缓的 9-24 个月的小孩。包括两部分内容：营养补充和家访。家访的具体内容是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对孩子进行每周一小时的拜访，侧重于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心理社交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干预不仅仅是针对孩子，更是针对孩子的母亲，教给她们正确的养育方式。我们的研究发现在 20 年后，实验组的小孩平均收入要高出控制组 25%，几乎和那些正常孩子没有区别。而主要的效果都来自于家访干预，而非营养干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人对于这一结果感到惊讶并对此非常感兴趣，这也促使他们在甘肃省实行了类似的儿童养育干预项目，这一项目现在仍在实施当中。

**F:** 这听起来非常不错。我听说斯坦福大学的 Scott Rozelle 教授和他的中国合作者们也在做类似的项目。

**H:** 是的。Rozelle 做了很多很出色的同一类型的试验研

究。他参加过我们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的一次会议，他对牙买加的研究也很感兴趣，我们对这个研究进行了很多的讨论。Roselle 在中国进行了很多的干预实验，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尽管留守儿童问题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在中国我们似乎同样可以做的是为留守儿童建立一个更好的早期生活环境。这有助于弥补他们的早期的不利发展因素，当他们长大一点上学之后，他们将享受和城市出生的孩子类似的培养。Sally 在牙买加的课程被其他人模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也改编了她的家访课程，尽管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是不论怎样，这都是一件有助于留守儿童健康发展的事情，都积极地帮助和激励了这些中国留守儿童。总体来说，人类发展理论在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上可以有很多应用。

## 流动儿童问题

**F:** 接下来我想谈论的有关流动儿童的话题，即和父母一起迁移到城市中的流动儿童。我进行流动儿童的研究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在城市做了很多调查，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比较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上学的流动儿童，这些民办学校是针对流动儿童的低成本、低质量甚至是非法的民办学校。所以我们在做这些调查的同

时，也对不同学校的学生进行标准化的测试。在考虑到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自选择性后，我们仍然发现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质量存在明显差距。

**H:**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也许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更多的背景。比如，这些流动儿童上的民办学校是由政府出资建立的吗？还是用自己的资金在运转？他们是否在入学政策方面更加灵活、可以自己雇佣老师、决定学校的环境等等？

**F:** 这些民办学校并不是政府建立的，它们最初都是完全民办的学校，有一些移民到城市的人在农村家中可能有一定的教学经验，来到城市后，他们看到了流动儿童的这种教育需求，所以他们就开办了这样的民办学校。可能最开始他们只有很少的几个学生，但是在后期就发展壮大起来。他们也收学费，但是远远低于公办学校。这些民办学校在入学方面也没有什么门槛，所有人都可以来这里上学。尽管民办学校存在相当的自由度，但由于民办学校的投入水平很低，相比公办学校其教学质量还是会差很多。

**H:** 有没有一些使得民办学校达到公办学校平均水平的计划措施？

**F:** 从 2008 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实施了一项政策，他们关闭了中心城区的所有的流动儿童民办学校，而在边缘城区仍保留了这类学校，然后对这些民办学校提供资金支持。例如，现在政府会为每个学生向民办学校提供每年 5000 元的资助，所以流动儿童在这些学校就不再需要交学费。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的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都是公共财政支持的，只是两者的支持力度不同，民办学校大概每人是 5000 元的标准，但是公办学校的资助标准将近 20000 元，所以两者之间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在 2010 年到 2012 年两年间上海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成绩差距减少了一半，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得益于上海政府的投入。

但是更重要的是民办学校并不在教育的体制中，两者是被有差别对待的，他们不是在一个同等水平上竞争的。比如，小学最重要的就是初中升学，如果你从一个公办小学毕业，尽管没有上海户口，你也有很大可能升学至上海公办初中，因为公办小学和公办初中之间有一对一的对接；但是民办小学没有这样的安排，除非公办初中有额外的学位，才有可能从民办小学招生。我们的研究就发现，即使考试成绩完全一样，公办小学升本地中学的概率还是会比民办小学大得多。

**H:** 那么现在对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改革计划是怎么样的？

**F:** 现在情况其实更加困难了。因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尝试控制人口规模。这其中的一个措施是通过提高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来控制移民数量，因此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门槛都同时被提高了。不论是进入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你都需要各种证明、手续以及父母社保方面的要求。所以这对很多流动儿童在城市入学造成了困难。

## 控人政策与户籍制度

**H:** 为什么要实施这么不明智的政策？这就像是抛弃了下一代，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着人口增长缩水、人口老龄化突出的问题，弥补逐渐下降的人口就需要高质量的人群，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好的学校，这些流动儿童将在未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制定政策者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吗？

**F:** 我认为地方政府可能是更多地从本位主义出发，因为流动儿童的教育支出对于政府来说是一种负担，比如上海政府目前需要承担每个外来学生 5000 元的财政支出。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且可能随人口进一步流入而增加。北京和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可能面

临非常大的人口压力，而较小一些的城市对于流动儿童教育方面的政策更为宽松。

**H:** 那么中央政府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呢，因为这是涉及到下一代的事情，就算地方政府不愿意，中央政府是不是应该有这方面的政策，而且地方政府在这当中也会受益，因为这样会使得城市劳动力素质上升从而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所以在我看来现在这种政策是绝对没有意义的，这很让人费解。

**F:** 我同意您的看法，这其实也是我以及其他很多人一直以来所呼吁的。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采取更强有力的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当然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就如同您谈到的，地方政府也应该有动力去更积极地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拿上海来说，目前大多数的新增的流动儿童其实都出生在上海，他们只是没有上海的户口，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大部分是不会离开上海的，无论是好是坏，他们都将留在这座城市里。所以，地方政府应该考虑的更长远一些。

**H:** 而且控制人口本身也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比如会形成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可能还会增加犯罪率、社会混乱

等等。但也许是因为我来自美国，美国的政府和中国的政府有所不同，我想我们分析问题应该在具体的制度框架里面。根据我读到的一些文献，大概是 10 年前的讨论中国人力资本政策的文献，我一直想要去理解的是，刨除流动儿童问题不谈，出生地到底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教育投入的水平，因为教育都是各个省、市独立分开的，很多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会很低，但是像上海北京会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因为它们会有更高的财政收入。所以，尽管大家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大家都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种族、文化等等。但问题在于，各个地方的产品的价格是类似甚至相同的，无论是甘肃还是上海都有着很多能力突出的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他们应该得到更高的工资，但是因为出生地区的不同造成的不平等已经不仅限于是个社会问题，更是对经济的干预。

**F:** 对，我同意。但是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传承下来的，所以这些是相互影响的，如果你只改变其中一件事情而不改变其他的，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

**H:** 确实，如果只提高一部分但不改善其他部分可能会恶

化现状，但是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你其实提到了很多改善措施。例如首先是户籍政策，其次给孩子提供很多资源和制度上的支持，无论他们是不是流动儿童，都给他们平等的机会。对于迁移问题来说，从基本意义上来看，迁移问题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问题，为什么农村相对城市的工资更低，城市的经济生产力仍在不断增长，对于一个自由竞争市场来说，当劳动力增长的时候，对于房产的需求就会上涨，人们就必须承担这样的房屋价格上涨。从某种程度上这是自我调节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劳动力价格在上升，这降低了需求。如果加入一定的竞争，有一部分资本就会流动到西部地区，这一点其实现在正在发生。所以从政策上应该让劳动力和资本去回报最高的地方流动。移民问题有关你提到的针对流动儿童上学的限制，为什么政府不直接对于父母设障，我认为可能是政府不希望减少工厂的劳动供给。

**F:** 是，有一种发展思路是希望外来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缴税，但是不希望他们从城市退休，拖家带口的到城市里来。尤其是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政府希望更多引入高技能劳动力而不是低技能劳动力。

**H:** 但那也是一些国家比如瑞士、德国很多年前的政策。德国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我记得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的欧洲，由于经济的飞速增长，劳动力需求快速增长，有一大部分从土耳其进入的移民，也有一些从非洲过去的移民，他们是作为临时工进入欧洲，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又被遣返。但是结果显示，至少德国的案例是这样，这很可能不是一个明智的政策，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移民很难和当地人民沟通；第二，分成两种阶级社会会带来社会问题，人们会对此感到很不舒适。中国应该借鉴这些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和欧洲不同，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把国家内部的劳动力区分为西部地区 and 东部地区两部分来对待是不合理的。

(文字整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17 级研究生 吕佳玮  
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月5日文章)

## 《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新书发布会访谈

“窥斑知豹，深入剖析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亡羊补牢，认真寻求流动儿童教育的解困之道。”

这是名为《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的封面话语。本书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陈媛媛以及上海证券报宏观产业部记者金嘉捷合著，是冯帅章和陈媛媛老师从 2008 年以来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的系统总结。

嘉宾讨论



5月20日下午，《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在暨南大学举办了首场新书发布会。不仅三位作者悉数出席，为本书作序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所所长吴霓也亲临现场，四位嘉宾首次讲述著书背后的故事，与在场观众共同探讨流动儿童教育之路。

**【主持人】（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王芷苓）：**首先向吴老师（吴霓）提出一个问题，您最初与这本书怎么结缘的，能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

**【吴霓】：**“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新书发布会，这本书，我们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城市的未来，我们因为这个群

体结缘。我和冯教授原本不认识，他发了一封邮件给我，说自己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下一步想开展联系。之前我也有接到很多这方面的邮件，但是他的邮件非常独特、简短，内容包括‘我做什么事情，希望你做什么事情，我为你提供什么条件。’此外，上海财经大学这样一所学校，开展这样的研究，以前比较少见，

我也很好奇，我想来看一看怎么样。后来，我也有参加他们的会，他们也参加我们的会，感觉投缘，于是我们逐渐联系上了。最后，固化在书上的就是序言，我们之间的序是同辈人，或者是同辈的学术学者之间的序，这个序就是研究、探讨、讲感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序里讲到，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友谊，我们共同期望什么，这种序和常见的序不一样，结这样的缘非常高兴，通过书我们又将缘续下来了。”

**【冯帅章】**：非常感激吴霓老师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当时确实并不认识，但是因为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一直在积极寻求学术上的联系和帮助。确实，在我们做这个研究得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当时我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感觉没有头绪，因为按照原来的研究计划到学校进行调研确实太难了。当时我们想了各种办法，在公办学校我们动用各种各样的关系，在民办学校，正好在电视里看到唐晓杰博士（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在讲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我们就赶快联系他，通过他和周纪平会长的关系我们才与上海民办学校牵上线。最后能够到公办、民办共有 20 所学校进行调研，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我也特别高兴他们今天都能够到现场。

## 公办与民办学校学生的差异

**【主持人】**：通过集体的力量你们联系到很多学校，并且进行了长期的追踪。关于这本书，你们在这么多所学校里追踪了那么多学生，基本的结论是什么？这些孩子他们在表现上有什么差别？特别是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

**【金嘉捷】**：我们也是直接走访调研了那些学校，先说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我们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分别进行调研时，有几点发现：在学生的表现方面，可以看到公办学校的孩子在课堂上更加积极一些，整个课堂氛围也很好，民办学校相比公办学校整个感觉上稍微压抑沉闷一些，大家举手发言讨论气氛不是特别热烈。学生这样的表现差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校类型产生的，公办学校更加注重素质教育，所以孩子更加活跃一些，民办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只能关注到基础的教学。在政治信任度方面，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更加信任政府，公办学校的孩子的信任度会低一些，这是非认知能力上的。在成绩方面，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优于民办学校。在家庭背景方面，体现在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的月收入差异，能够进入到公办学校的这些流动儿童，他们父母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都是要

优于在民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

## 消失的孩子

**【主持人】**：书里有个细节，你们在做调查时，每做一次调查都发现流动儿童的样本流失率特别大，每次你们的样本量都在减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陈媛媛】**：流失率在流动人口的跟踪数据里应该都是难以避免的。在流动儿童的数据里，我们的流失率其实不算高，流动儿童的流失率主要是因为不能在上海参加中考和高考，所以很多都是在小学高年级，或者是初中就回了老家。如果他们的家长将电话号码换了的话，就很难再找到他们。另外我们后期的电话跟踪也会碰到拒访的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广告电话、诈骗电话，比如，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说明是上海财经大学的调研组，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你们是推销家教的，就将电话挂了。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碰到拒访的问题，我们会用短信的方式做进一步的解释，或者通过他们的同学找到他们，然后再打电话解释。通常一个样本，电话追踪至少要四五次才会放弃，最大限度将流失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主持人】**：所以人与人之间

信任的缺失导致你们做调查的难度加大？

**【陈媛媛】**：对，实际上流动儿童的家长会比上海家长要好，他们对这个电话调研的接受度高一些。现在有了微信，我们很多样本可以通过微信与家长保持联系，及时发送报告，我相信未来这部分流失率会更加低。

**【冯帅章】**：所谓流失，主要是发生在流动儿童毕业之后，我们在小学阶段就给他们做过跟踪调查，这个时候流失率非常低，除了一些学生转学。第一轮和第二轮调查是同样的 20 所学校，所以配合率非常高。当他们小学毕业之后，没有办法在学校里找到他们了，就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取得联系。一直到现在，我们调查的最初样本现在已经读到高一，所以这个流失率非常高也是非常正常的，比如换电话、搬家，或者不接电话。我们目前的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原来的样本在继续跟踪，他们已经读高中了，我们刚刚做完这次的跟踪调查。另外从这些学校有新的样本，就是说后面的四年级、五年级的学生，又有新一轮的跟踪在进行。

**【主持人】**：除了入学门槛的变动，流动儿童本身在上学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同学或者老师的歧视，他们在心理感知

来说，他们会不会觉得老师将班干部让上海的孩子当？

**【冯帅章】**：歧视是一种主观感受，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从数据判断，公办学校里面既有本地儿童，也有外地儿童，很多方面包括做班干部以及班主任对他们的评价，这都是他们主观上的很多感受，从这些方面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有非常明显的歧视证据。

**【主持人】**：那上海本地家长会不会表达出不想自己的孩子跟流动儿童在一起，不知道有没有问这部分的问题？

**【陈媛媛】**：实际上我们发现家长确实在这方面有偏见，有 1/3 的家长不愿意到流动儿童比例比较高的学校，或者即使已经在这个学校的家长，他们认为流动儿童应该单独编班。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至少在我们的样本学校里，混合编班对本地儿童并没有负面影响。

## 公办与民办学校的办学质量差异

**【主持人】**：民办学校的质量在提高，这与政府财政在近年来的大力投入功不可没，但书中研究发现民办学校的质量依旧赶不上公办学校，能否解释一下原因？

**【金嘉捷】**：正如刚才所说到

的，近几年以来政府对于民办学校的财政供给和补贴提升，对学校质量提升有非常大的影响，包括我们和校长、教导主任访谈也发现他们也是这样的感受，在问卷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因为教师的薪酬在 2010-2012 年间，有提升 2000 元 / 月，这么大的幅度使得民办学校的教师流动率大大降低，学校的质量相应地在 2 年间有比较显著的进步，这是比较受鼓舞的现象。但是这种财政的补贴对于民办学校的教学质量提升是有天花板的，不是说一直提升下去就可以和公办学校一样好了。两种类型的学校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的水平，关键还是教育体制，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是教师，民办学校的教师没有办法平等享受到像公办学校教师有的例如评职称、课题申报、全面培训等，他们是没有什么的。另外，体现在学校层面，公办学校拿到政府的钱也是远远多于民办学校，我们走访时就可以有直接感受，公办学校的校舍特别漂亮，有美术馆、乐器室、电脑房，走到民办学校就感觉落差特别大，很多孩子没有自己的电脑房，问他们怎么上计算机课的，他们说教室有一台电脑，每一个同学上去试一下，就是这样比较辛酸的差距。民办学校的校长也给我们反馈，拿到的补贴大部分是满足教师的薪酬发放，但是在学校的硬件设施投入上远远不够。最后一点，体

## 流动儿童的教育之路

制差异体现在学生身上，学生没有办法升学，从小学升入初中，公办学校有比较畅通的升学机制，但是民办学校的孩子就比较困难，这可能是当下没有办法突破的制度鸿沟吧。

**【冯帅章】：**我们研究的初衷就是比较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存在差异一点也不奇怪，到现在上海民办学校的生均经费已经非常好了，有6000块钱。据袁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今天讲的，北京公办生均经费是4万块，上海可能也是差不多，至少也是两三万吧，所以差距非常大，出现学校质量的差距也是非常正常的。研究中让我们惊奇的是，民办学校在2012年和2010年间质量可以进步那么多，差距缩小那么多。实际上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民办学校在为随迁子女提供教育服务方面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当然像嘉捷也有说到，民办和公办学校在体制上有很大的天然鸿沟，这也造成了即使政府进一步投资民办学校，也不能完全达到公办学校的水平。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尽管民办学校的学生考试成绩在上升，但是家长的满意度并没有上升，这跟升学有关，升学不是看成绩，很大程度上是由你是从公办还是民办毕业来决定的。

**【主持人】：**吴老师，您自己也是主持和参与国务院、教育部、地方政府的很多研究服务工作，能不能从政策的角度来说一下怎么解决，或者未来大致改进方向应该是怎样的？

**【吴霓】：**流动儿童问题应该说是短时期内很难解决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国情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它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我们在解决的过程中，可能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配套，单纯的从教育一方面去促进还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它是综合性的政策改革范畴，需要民政、公安、卫生、人口、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政策，这些都要综合配套才能解决。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政策能够在哪些方面有所促进呢？首先是普惠普及学前教育，现在第三期学前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实施了，可以关照到大量流动群体，这个政策我觉得应该明确提出来。其次是流动儿童生均公用经费问题，因为过去流动儿童是属地管理，从一个省流动到另外一个省，流出地的生均公用经费是到不了流入地的，尽管量比较小，钱过不去的话就导致当地政府没有积极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实施电子学籍制度，带来的利

好就是经费可以根据这样的电子学籍制度跟随人走。再次是义务教育经费中央统筹，目前义务教育阶段是省统筹，我曾经提出应该是中央统筹，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人口可以计算出来，那么这个钱中央财政完全可以进行相应的准备，所以我认为应该上升到义务教育经费中央统筹。最后就是异地考试应更加开放，现在高考改革还不彻底，尽管今年上海、浙江已经进入到新高考，但是还差一步没有走通，就是高校完全的自主招生。如果我们实施了完全高校自主招生，实际上流动人口的指标问题就不存在了。

## 背后的故事

**【主持人】：**你们用了8年时间调研，这么长的时间坚持做下去，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你们的触动特别大，可以跟读者分享一下吗？

**【陈媛媛】：**我们调研做了这么多年，每次做的时候都有各种触动。在做电话调研的时候，很多家长会主动跟我们聊很久，都不肯放下电话。基本上反映的情况是，自己在上海工作，但是孩子不得不回去，在电话里还是可以感觉到家长很无奈又无助的心情。最近

我们正在做新样本，上个星期我在一所民办学校里，问卷里刚好问到小朋友是否知道初中要去哪里上，如果是回老家说的话是爸爸还是妈妈陪你回去，我刚好站在一个小朋友的旁边，那个小朋友拿着笔没有写。我小声问他，你现在知道你初中要去哪里上吗，他没有说话，抬头看我的时候已经有些眼泪汪汪，然后他打勾选择了回老家读书，自己回去。虽然我知道在我们的样本里已经发现大概有一半学生到初二的时候就回老家读书，大概80%的孩子是自己回去。当时调研的时候看到小朋友的表情，我还是很触动。

**【主持人】：**冯老师能否总结一下这本书？

**【冯帅章】：**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还是蛮激动的，觉得自己能写书了，从读书的人变成写书的人，这点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再来看这本书，我觉得内容还是非常不够，我们这本书尽管是多年研究的总结，但是它涉及到的面还比较小，只是上海这个地方，只是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小学生。相比较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理解的问题，关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我觉得还是太初级了。我希望更多人能够在有更多数据的情况下将研究推向深入。作为研

究者更多要提供一些研究的结论，一些无可推诿的证据，发现更多的事实，帮助政策制定，帮助社会更好的面对这些问题，做我们能够做的。

**【主持人】：**回到开始的问题，城市的未来在哪里，四位嘉宾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城市的未来在下一代孩子的成长里。当我们几十年以后再看这批流动儿童，可以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没有人抛弃你们，你们就是城市的未来，你们就是祖国的未来。

**【观众提问】：**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是否值得借鉴到其他城市去，是否有北京模式、广州模式、深圳模式，是否适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陈媛媛】：**现在几个大城市在流动儿童方面的政策差异还是比较大，我们这本书集中讨论了上海08年到12年期间的做法，这段时间上海的做法是值得其他城市学习的，上海对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补贴确实提高了他们的教育质量，在解决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利的公平和受教育质量的公平上做的是比较好的。

**【冯帅章】：**确实有不同的模式，这本书是上海模式，希望

下本书是广东模式。

**【观众提问】：**你们发现公办学校儿童父母受教育程度优于民办学校的儿童，公办学校儿童的表现也优于民办学校，这会不会导致阶层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

**【冯帅章】：**至少我们的研究发现，公办学校里上海儿童和流动儿童差别并不大，差别并不显著，但是我们发现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即使是流动儿童间差别也是比较大的，这是基本的发现。所以根据我们这个发现来说，主要还是制度的问题，如果我们给流动儿童同样的制度，比如说让他们进入到公办学校，甚至是好的公办学校，我觉得就有同样的机会。

**【陈媛媛】：**关于阶级固化这个问题，其实取决于我们在城市对流动儿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如果能够做到保证他们入学基本受教育的权利，那么阶层固化的问题可以有所缓解。

**【主持人】：**好的，我们今天新书发布会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也感谢四位嘉宾为我们呈现了睿智精彩的对话。



## 避免流动儿童失学 学者吁突破超大城市 教育供给困局

### 编者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流动的规模愈来愈大，与此伴随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7年6月1日，正值儿童节之际，财新网刊登的《避免流动儿童失学 学者吁突破超大城市教育供给困局》一文介绍了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及上海财经大学陈媛媛副教授以上海市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为切入点历时8年的研究成果。现转载全文，以飨读者。

特大城市逐年收紧的流动儿童入学门槛使北京、上海等地的流动儿童入学率连续降低。对此，

一批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和暨南大学团队的经济学者在新研究中建议，特大城市应顺应人才市场变化，为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提供更多教育资源。

其中，在公办教育资源供给上，可将义务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明确对应起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法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经费问题，“确保教育供应的可持续性”。

同时，应让民办学校成为公办学校之外的重要教育资源补充，放开民办学校的准

入门槛，放低民办学校的入学门槛，允许一部分接收流动儿童的民办学校由民间资本运营。

在儿童节之际面世的《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一书中，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等人提出上述政策建议。陈媛媛、冯帅章等人提出担忧，由于“教育控人”等政

策，目前在特大城市中，一些主要招收流动儿童的民办学校生源减少，面临生存危机。对于原本就存

在教育资源紧缺问题的这些城市，此举不仅使得现有教育资源大量浪费，“更减少了潜在的教育供给”。

此前，于2017年3月公布的中国首本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也公开披露，在北京，非京籍儿童的“入学门槛”正逐年升高，到2015年，非京籍儿童家长需“本区就业”、“连续社保缴纳证明”、“租房完税证明”、“限定暂住证

起始时间”的入学需求已扩至北京大多数区县。

上海在2013年也逐步收紧流动儿童入学政策。2013年颁布的《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以“合法稳定居住，合法稳定就业”为条件。仅按“合法稳定居住”这一标准，2012来沪人员中就有503万人的子女合法入学“不达标”。而2016年在幼儿园大班在读的学生中，有57%的学生达不到入学资格，面临“被迫返回老家”或“迁移他区就读”的命运。

### “教育控人”致特大城市 入学门槛走高

2014年后，上海对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逐渐升高。《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一书指出，从2014年，全上海开始要求流动人口必须缴满6个月社保或持灵活就业登记证，其子女才有入学资格。

以社保缴纳为例，2014年因入学要求加码，很多从事低技能职业的外地家长为孩子入学特地在学校招生前到当地社区补缴社保，而过了入学季后，就有家长“因生活拮据而不再继续缴纳费用”。但到了2016年，上海进一步要求必须每年连续缴纳社保，且

每年都会严格检查，否则其子女会被退学。

家长有无房产也逐渐成为流动儿童入学的制度门槛之一。如浦东新区2015年后的政策即规定，对于父母持有有效期《上海居住证》且达到标准分值、有浦东新区房产证的可以优先分配子女入学。

陈媛媛、冯帅章等人发现，入学政策收紧后受到主要影响的是在小型工厂、小微企业上班的合同工。这些企业需要为员工支付每月900多元的社保，个人缴纳400多元，因一些小厂和企业并未为上班的打工者缴纳社保，因此直接导致其孩子在入学时存在困难。

此外，因沪上有区县教委对孩子入学年龄有严格时间段规定，若流动儿童当年无法满足入学条件，即使第二年证件手续齐全，也存在因超过规定年龄范围而无法入学的情况。

超大城市控制人口的制度正在不断制造流动儿童“回流”的趋势。陈媛媛、冯帅章等人认为，“教育控人”不仅无法缓解人口压力，还会造成诸多伤害，“城镇化趋势下的人口压力不应当通过‘堵’的方式来解决”。另一方面，以居住证、社保缴纳、房产证等一系列指标为门槛的入学条件也反映出目前教育制度依附并服务于户籍制度的现实，“由此带来制度歧视”。

### 公办学校应继续成为 主渠道

《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一书指出，目前流入地公办学校已经成为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主渠道，但是在人口控制的背景下，许多地方公办学校对于流动儿童的开放程度仍然偏低。

“承认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确实比民办学校要高”，陈媛媛、冯帅章等人认为，对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这是进行政策讨论的前提。根据其带领的团队在上海5个区、20所小学、近3000名学生中的跟踪调研，在公办学校接受教育的流动儿童，学习成绩显著提高。一组标准化考试成绩差异数据显示，民办学校流动儿童语文平均成绩为55.9分，比公办学校流动儿童少了10.5分。

同时，在成绩相同的情况下，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进入上海初中的机会远远低于公办学校。

陈媛媛、冯帅章等人还发现，在上海，流动儿童能进入的公办小学主要是教育质量处于中等或以下水平的学校。在许多接纳流动儿童的学校里，流动儿童的比例超过90%，这是因为许多家长会主动将自己的孩子转到其他较少接纳流动儿童的公办学校，即使在同一所公办学校，流动儿童也可能被单独编班。

“在目前的条件下对于流动儿童全部开放公办学校并不现实。”陈媛媛等人建议，在过渡期间，应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将超大城市中心城区一些富余公办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 避免盲目关闭民办学校

“政府应充分理解对于教育的梯度需求，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即使不能进入城市公办学校，能够进入质量略逊的民办学校仍不失为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陈媛媛、冯帅章等人提出建议，对于流动儿童，民办学校应成为公办学校之外的重要教育资源补充，要“避免盲目关闭”。

但在目前，由于“教育控人”的政策思路，超大城市民办学校的入学率大幅下降，“学生数量萎缩直接导致民办学校划分到的生均经费减少，造成部分学校正常运营难以为继，而面临关停风险”。陈媛媛、冯帅章等人建议，对于当前民办学校由于生源萎缩而面临的生存问题，地方政府应当增加民办学校的生均经费以支持学校继续运营，补充对民办学校的专项经费落实，并对这些由于缺乏专项经费而硬件设施落后的情况，建立专项基金。2016年，上海对民办学校的生均经费补贴为每学年6000元，“但仍有不少学校由于生源下降而面

临关闭风险”。

“在二孩放开的人口政策背景下，人口增加将使得教育供应资源更趋短缺，民办学校的补充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一书建议，加大对这些学校的扶持，确保其生存。

“对于拥有大量流动儿童数量的特大城市，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财政挑战。”陈媛媛、冯帅章等人建议，除中央财政需支付一部分这些流动儿童的教育费用外，考虑到地区教育经费的差异，流入地政府可通过“向雇佣外来人员的企业征税”“允许民办学校向学生收取一定的学杂费”等方式，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而若流入地财政资金充裕，“像上海那样，对于符合条件的民办学校直接进行生均经费的补贴，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陈媛媛、冯帅章等人表示。

### 大城市应长远规划供给

《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一书还提出，为适应人口流动和大规模城镇化的趋势，地方政府在进行教育规划时，应将不具有本地户口的常住人口的需求充分进行考虑。例如，将流动儿童的教育规划与城市发展规划结合，优先保障教育用地，应对超大城市一些学校因学

位紧缺、班级拥挤而加剧的流动儿童入学难度。

此外，超大城市对于流动儿童的教育吸纳也应在9年制义务教育框架基础上，向其后的学段延伸，“给予他们向上流动的空间”。

陈媛媛、冯帅章等人认为，在上海等超大城市，应对中专、职校、技校“三校”作为放开高考制度前，流动儿童过渡性政策中重要的升学渠道予以重视。目前，在上海等城市，对技校生的入学也有积分制度的要求，“在本地‘三校’资源供应过剩的情况下，应当对流动儿童予以放开”。

《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一书还建议，超大城市在解决随迁子女继续接收高中教育的问题上，可采取与外省市合作举办联合高中的方式，这些学校采取校舍由上海负责，师资由所在省负责委派，并使用原所在省的教材的方式，合作解决随迁子女的高中教育问题。

目前，上海正与长三角地区的省份进行合作，设立上海安徽学校、上海江苏学校、上海浙江学校。而在北京，一所由北京市昌平区教委与江西临川合办的北京临川育人学校也已在进行教学。

(本文转自财新网)

# 首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讨论精华之：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首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于5月20日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研讨会上，与会嘉宾们围绕“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展开交流研讨。讨论精华如下：

### 地方实践：全方位助力

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彭波局长根据自己的工作实践，向与会嘉宾介绍了绵竹市留守儿童工作的具体情况。绵竹是县级市，地处四川盆地的边缘，人口有52万。据绵竹市的统计，到2017年，小学段的留守儿童有1432人，中学段有900多人。据此，绵竹市教育局从2004年开始了各种实践：在学校当中以课题的



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  
彭波 局长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  
副教授 张宏亮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  
司公共服务处处长  
刘晶晶

方式探索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如外出农民工留守儿童教育途径研究等；在各镇乡学校建立留守儿童之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2014年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台流浪未成年人社会救助实施细则，2015年出台了具体方案。彭波局长也坦言，留守儿童工作队伍的培养也是当前十分突出的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给予支持。

### 微观调研：家庭投入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影响巨大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张宏亮从2010年开始在湖南省隆回县进行长期留守儿童调查和跟踪。他介绍，隆回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城乡教育资源投入非常不平等。从成长环境来说，农村双留守儿童（即父亲和母亲都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是最弱势的群体，且在隆回县占全部留守儿童的三分之一。张宏亮副教授

对留守儿童成绩和父母状况进行相关性分析，收集了留守儿童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之间10-12个学期的成绩，同时设计问卷让他们回忆每个学期父母的状况。结果显示，家庭投入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巨大，父母是否在身边对留守儿童成绩的影响十分显著；同时在单留守的情况下，母亲不在身边对孩子的影响相较于父亲不在身边的影响更大。

### 政策风向：将强化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教育作为重点工作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公共服务处处长刘晶晶首先介绍了卫计委开展的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方面的工作。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家卫计委从去年5月开始布置留守儿童教育工作，并将强化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教育作为卫计委五项重点工作之一，将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教育项目与健康扶贫、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相结合。



宋映泉

具体来说主要有几个方面：配合民政、教育、公安部门将农村留守儿童信息采集、登记、信息共享、评估帮扶工作做好；指导各地心理健康专业机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以健康关爱为抓手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目前已在12个省份、27个县启动了实施贫困农村留守儿童健康项目；成立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教育项目技术指导组，加强对项目的跟踪指导，推进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立，今年还将重点建设农村留守儿童爱心健康驿站等。

### 局限：留守儿童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宋映泉副教授调研发现，政府部门、NGO组织、学术机构对农村留守儿童有大量的干预措施，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但是实际效果却不显著。他认为，目前政府、非政府、学术机构所做的干预措施是想以此替代家庭，但是事实上家庭在儿童成长中不可替代。同时，很多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干预措施实行较晚，例如从初中才开始干预，但实际上对留守儿童的干预越早越有效。归结起来，想办法让家庭的功能健全起来是比任何干预措施都更行之有效的方法。

北京大学  
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宋映泉 副教授

### 广开言路

####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请问卫计委是否有将计生部门基层工作转向优生工作的计划？

刘晶晶：从整体的大趋势来说，现在不管是一孩还是二孩，不管是个人、家庭，还是政府机构，关注的肯定是人口优化，这是一个趋势，我们也在做人口质量提高方面的工作。

就流动人口来说，目前国家卫计委的工作有两个方面。第一，提倡健康教育，让健康教育深入到各个方面，包括健康宣传等，让流动人口主动树立起健康意识。第二，消除服务的户籍差异，让流动人口能够享受跟户籍人口一样的均等化服务。

部分地区的公办学校学生很少，而民办学校学生却很多，原因是民办学校可以提供全天看护。请问留守儿童教育问题靠公办来解决还是靠民办解决更有效？

彭波：就绵竹市当地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公办学校比民办学校更多，民办学校的收费是很高的，所以在绵竹市学生绝大多数是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这一问题应当从政府投入的资源分配的角度来思考，县级教育部门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很大的难度，我们只能将自己的工作做实。究竟哪一类学校

有更好的办法，还需要有更多的调查研究才能回答。

#### 有部分学校的留守儿童之家成为虚设，这样的问题如何面对？未来将如何解决？

杨剑（国家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处长杨剑）：儿童之家作用发挥的很不乐观，是我们目前比较困扰的问题。最大的困扰在于，不光是地方，还得有人管，不光得有人管，还得有人来。借鉴河南一个县的经验，这个县的留守儿童之家，每个周末都有志愿者来，搞一些有趣的比赛、活动，这样很多留守儿

童就自觉到儿童之家来了。我们的想法是，借助社工、志愿者，将儿童之家做实。

#### 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监护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杨剑：如果有家庭，孩子的第一监护人肯定是父母亲；如果父母不在，委托监护人就交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没有家庭的话，福利机构就是孩子的监护人。

监护人的监护能力要进行评估，如果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就要约谈孩子的父母；如果父母解决不了，下一步就应当是公安部门介入了，监护

人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很多沿海大城市提高了流动儿童入学的门槛，导致很多儿童被迫回乡。现在有没有专门对回流的儿童做特殊重点的关注？

宋映泉：大概在2009年我们就开始注意回流儿童的研究。留守儿童中就有相当多是回流儿童，其实回流是非常不好的，对孩子身心都有非常坏的影响。政府部门确实要关注这些群体，我们还要呼吁大城市在对待流动儿童问题上应该“软”一些，不要这么“硬”。

## 首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讨论精华之：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在首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上，与会嘉宾们围绕“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展开交流研讨。讨论精华如下：

### 吴开俊：解决珠三角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省级政府统筹好教育支出结构是关键。

广州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教育学院教授吴开俊指出，珠三角长期以来都没有解决好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主要原因来自于政府内部努力程度不够。从数据上看，2015年珠三角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大概是46%，同年东莞市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只有2成多一些，而广州和深圳也只有4成多一些。但是，吴开俊指出，在珠三角9市中佛山是个例外，“佛山的随迁子女大概有40万，其实已经占了小学的55%比重，但是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到了70%以上，这值得我们反省。”

而对于珠三角普遍存在的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吴开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冯文猛

表示其根本原因在于省级政府没有统筹好义务教育经费以及教育的支出结构。虽然广东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在全国排名靠前，但是看生均指标，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生均指标排名几乎垫底。此外，吴开俊认为，解决好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加强公办学校的建设也至关重要。

### 冯文猛：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要放在城镇化的大视角下思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冯文猛首先提出，对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应该放大视角，在城市化进程中考虑农村和城市正在面临的问题。冯文猛说：“我们的城镇化进展非常快，城镇化直接涉及到户籍改革，户籍

改革直接涉及到流动儿童。”2014年，国家出台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指出要严控城区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北京、上海等市在2013年以后增强了人口控制，实行了“以教育控人”的措施，“不符合条件就不能上，五证变成了二十多个证。”而广州在这些年间整体变化不大，依旧有积分入学等政策，也有大量民办子弟学校存在，但还有很多人因为入学手续繁琐而无法入读公办学校。此外，冯文猛在近年的研究中发现，流动人口的家庭出现了分层现象，对于不同的家庭，在能否达到入学条件、怎样达到条件以及学生入学后的状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 周纪平

### 周纪平：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不可能全关，也不可能全活

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表示，就上海农民工学校而言，最初制定政策时认为兴办这类学校是短期行为，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由于公办学位不足，部分农民工学校仍要延续下去进行补充。同时，上海二胎化即将开始，教育资源会更加紧缺，所以农民工学校的存在也很有必要。但是，2013年以后，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大规模城市建设时代已经结束，上海也随之提出紧缩政策，因而农民工学校也面临着洗牌和“关停并转”（关闭、停办、合并、转产）。“目前上海五十多所农民工学校办的非常好，跟公办学校的差距不大，但是还有五十多所办的不好，有捞钱的趋势，还有五十多所在中间，推一推就可以上去，这些老板自己也说如果不努力也会死掉。”周纪平认为，“关停并转”势在必行，同时利用这个机遇也要把好的学校保存下来。但事实上，去粗取精并不易，如果好的民办学校被政府征地，也依然逃不过关门的命运。周纪平呼吁，农民工学校在上海实现教育均衡化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因而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要对它们多加考虑。

### 唐晓杰：提议政府按照平均生均经费对随迁子女家庭进行补贴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唐晓杰

究所副所长唐晓杰首先对近年来的研究数据做了介绍，2010-2013年是上海随迁子女教育发展最好的时间，但是在2014年国家出台居住证相关政策后，上海实行了人口管控，原来小学阶段的随迁子女占比一度高达54%，现在降到了43.7%，初中随迁子女也从三十多万降到12.3万，约占上海初中生总数的29.7%。同时唐晓杰指出，上海最初是从产业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实现人口控制，而后来却逐步走向教育控人，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他认为，近年来随迁子女学校的发展速度变慢，和公办学校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首先就是学生的自信心、学习动机以及对学校的认同度都在下降，由于媒体各种炒作，一些学生养成了仇恨社会的心态。”唐晓杰指出，虽然2016年国家出台了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是强制的、普及

的、免费的，但是目前大部分随迁子女却通过自己缴费上学，“我建议按照国家平均生均市域经费来加以补贴，例如6000到8000的额度，这样家长的负担大大减轻，也可以享受到国家的免费义务教育政策，这是他们应该享受到的。”

关于教育经费的统筹，唐晓杰提出，要根据经济发展程度进行省级统筹，因地制宜，将三级政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关于随迁子女的入学条件问题，唐晓杰认为，目前公办学校对随迁子女入学的社保缴纳门槛过高。

### Topic 1: 为什么佛山和重庆很好地解决了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当地有怎样的激励机制？

吴开俊：首先，佛山的积分入户条件相对较低。其次，佛山是一个地级市，在财政上与省政府的努力程度不同，尤其是南海、顺德等区域。就顺德区而言，区一级对外来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就非常大。

冯文猛：根本原因是佛山、重庆等地比北京、上海的人口压力小。北京、上海包括广州等地人口压力大，同时也在寻找适合城市的新增长模式，需要引进合适的外来人口。在目前



广州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教育学院教授 吴开俊

的城市化进程中，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城市形成城市群，城市群内分工合作，一个城市有多个增长极，人口均匀分布。北京、上海不应排斥所谓的低端人口，克强总理也在说，如果城市没有多样人群是没有活力的，所以并不是说中央就要将低端人口要赶出去，城市血管是要通的，不能堵起来。

### Topic 2: 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常态问题还是阶段问题？

**周纪平：**我国城市化应该是一个长远的过程，欧洲完成城市化用二三十年，我们就是三四十年完成城市化，所以我们是急风暴雨式的，问题特别尖锐、特别多。上海是一座有吸引力的城市，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不让外来人口进入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城市化的步伐放缓。

### Topic 3: 北上广深等城市是否出现了就业极化现象？

**冯文猛：**一个城市同时需要低端、中端和高端三类就业者。中端可能会被机器替代，最高端需要脑袋加入思维，可能替代不了，将来的价值会越来越高。小商小贩是机器替代不了的，这是肯定需要的。没有

毛细血管，人是没办法很顺畅的活着的。但是，低端人群多数是非正规就业，住房等各方面都缺乏保障，应该将这类人群转为正规就业，纳入到正规体系中，使这个群体的权益得到保障。他们的群体得到保障，提供的服务更好，这对一个城市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 Topic 4: 上海原来有市级统筹教育经费，为什么现在变成区级统筹了？

**唐晓杰：**原来上海解决随迁子女教育经费问题是区里拿一半、市里拿一半，但是考虑到事权和财权要相统一，就将权力全部下放至区级。同时，部分区域如闵行区、宝山区、嘉定区等，认为镇一级也有资金，因而又将事权下放到镇里，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来解决教育问题。将多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可能要有不一样的方法，一刀切不是很好的办法。

**陆建非**（上海师范大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各区的发展模式有差异，上海也不例外，部分地区的事权、财权同时下降，有利于调动地方干事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在经济比较好的地区可行，但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可能上面统筹比较好。一个政策很难将中国这么大的差异的情况全部统筹起来。

### Topic 5: 政策上是否可以考虑一部分人可以选择交社保，有一部分人不想交社保就交学费？

**唐晓杰：**目前教育领域最不公平的地方在于，需要政府关爱的随迁子女没有享受到免费的义务教育。目前大部分流动人口都是非正规就业，强制要求他们缴纳社保并不可行。个体户、非正规就业的人口，为了交社保挂靠公司，还要付出代价，要交管理费，这是非常不人道的，本来是血汗钱，又挖来一块，政府就缺这点社保钱吗？唐认为，随迁子女需要特殊对待，即使没有缴纳社保，这类群体的教育问题也要得到解决。

## 产业政策专题

### 产业政策圆桌论坛： 政府从市场中 有序退出更利于 经济发展

6月25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行主题为“中国产业政策”的圆桌论坛，杜克大学终身副教授徐熠主持此次圆桌论坛，多伦多大学教授Loren Brandt、清华大学教授鞠建东、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北京大学余淼杰和张晓波教授共同参与了此次圆桌论坛。嘉宾围绕中国产业与贸易政策、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未来经济走向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 嘉宾简介



## 魏尚进

魏尚进博士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及外交与公共政策学院终身讲席教授。他同时还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以及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2014-2016年间魏教授担任亚洲开发银行（亚行）首席经济学家，同时担任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局长。他曾于1992—1999年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先后担任助理教授与副教授，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的经济学专业的正式教师。



## Loren Brandt

Loren Brandt是多伦多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多篇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 张晓波

张晓波博士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千人计划”讲座教授。拥有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张晓波教授为国际SSCI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主编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领域。近五年来先后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等权威英文期刊和《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 余淼杰

余淼杰博士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全球经济管理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家。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顶级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70多篇。发表论文曾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评为年度最佳论文，并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是首位独立获得该奖的华人经济学家。



## 鞠建东

鞠建东博士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产业组织。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等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承担有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多项科研项目。

## 应更重视地方政府层面产业政策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第 16 年。6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欧盟应当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 15 条条约义务，在针对贸易不公平制定有关新规则时也应遵循 WTO 原则。这意味着对中国贸易不公的“替代国”做法有望取消。中国加入 WTO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该如何评价入世及其他贸易和工业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讨论中，魏尚进、Loren Brandt 和鞠建东都肯定了加入 WTO 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魏尚进认为，如果没有加入 WTO，中国就不会出现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这样成功的企业。当 1990 年中国还在讨论是否加入 WTO 的时候，有人担忧随着市场渠道的开

放，国内实体经济可能会受到冲击。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国内企业数量增加。Loren Brandt 也认为中国加入 WTO 减少了贸易壁垒，提升了企业间的竞争性，降低产品价格，使得中国贸易进口额上升。

余淼杰认为，加入世贸和改革开放比国内市场体制改革发挥更大作用，这主要在三方面：重要中间投入增加，提高产品质量，经济发展中的规模效应凸显。加入世贸后，中国企业可以避开国内既得利益集团，按照国际市场规则进行贸易。

张晓波认为，地方政府层面的产业政策应得到足够多的重视。产业政策在地方政府层面有强大的能力影响经济的发展，形成产业集群。但目前过多的注意力被放在中央层面的产业政策上。实际上，两者都应该得到足够多的重视。鞠建东提出可以从产业政策执行的难易程度去评估政策效果。对于产

业政策而言，如果政策是简单的，那就是好的。如果政策是复杂的，政策效果则难以评估。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产业政策一般是简单的，政策效果也是好的。于中央层级的政府而言，如高铁建设等相对简单的政策，效果是好的。但当政策需要自上而下执行时，就变得复杂，因为需要很多个部门的参与。

随着投资的增加，未来中国的贸易开放政策会变得更加复杂，鞠建东说。

## 政府从市场中有序退出更利于经济发展

Loren Brandt 认为，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影响经济，如十三五规划、中国制造 2025 等在以往历史基础上推出的中央政策，表明政府希望参与经济活动的更多方面。这些自上而下的政策出台，会让地方政府变得更加敏感。张

晓波则强调了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地方政府是相互竞争的，这是中国与印度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不同的一点。在中国，当地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的颁布影响当地企业。政府在提升当地企业产品质量上发挥作用，这是通过刺激激励进行的。以浙江温州为例，政府通过给予免息贷款或银行信贷给产品质量高的企业，以刺激企业生产。中央政府则在税收层面影响地方经济。

魏尚进认为，政府在经济中可以扮演两种角色，分别是引导经济发展和从市场中有序退出。从入世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和风险投资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来看，政府有序从市场中退出，比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更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空间，但政府有时会释放出错误的市场信号。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余淼杰认为，对于加

工贸易而言，将面临更多的贸易不确定性。随着中国的用工成本的上涨，选择在中国进行贸易加工的企业将会减少，国内市场和加工贸易市场的竞争格局会发生变化。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同样重要，政府和市场应该同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的贸易进口额会增加，余淼杰说。

Loren Brandt 还预测未来中国将进一步降低产能，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到 4%。

(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学生记者 谭璇璇)

## 中国经济学研究向

——学术发表如何

## 何处去？

推动经济学研究发展高端圆桌论坛实录



### 从左至右：

主持人：

**冯帅章**，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嘉宾：

**符育明**，  
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副院长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  
长江学者、千人计划讲座教授

**蒋东生**，  
《管理世界》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刘国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孙宁**，  
南京审计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院院长、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时间：

2017年6月6日

地点：

暨南大学

**冯帅章**：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圆桌论坛。本次圆桌论坛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学研究

向何处去？学术发表如何推动经济学研究发展？

其实办此次论坛的想法，最开始是由我和 Heckman（诺奖得主 James J. Heckman）教授交流时想到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因故取消了亚洲之行。在今年1月份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由 Heckman 教授召集了大概六七名诺贝尔奖得主，讨论了美国主流经济学界评价最高的五本经济学杂志对于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学者，尤



其是年轻学者的影响，其中谈到了很多过分拔高五本顶尖杂志带来的不好影响。我在跟 Heckman 教授交流时就想到，也许我们也可以在中国进行这样的讨论，不一定是讨论 TOP5 带来的问题，但是对经济学研究发展还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学教育进入非常快速的发展期，越来越多国内的高校和国外高校开展交流，越来越多的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使国内经济学界在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非常显著的提高。同时，中国经济学界也面临自己独特的挑战，比如英文期刊、中文期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还是实证研究？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讨论。

第一个环节是他山之石。在这个环节我们有请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符育明教授分享他的观点。符教授是城市经济学以及房地产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也曾经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同时担任美国房地产与城市经济学会委员会成员、国际著名期刊 Real Estate Economics 编委会成员。

## 他山之石

**符育明：**总体来说，学术杂

志对于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学者的影响很大，一方面，高质量的期刊推动了学术成果共享；另一方面，期刊作为学术评估的指标，可以指导学术发展。

从国际上来说，经济学领域顶尖的五本杂志——TOP5，影响力特别大。从趋势来看，投稿 TOP5 期刊的竞争越来越大，过去几十年中 TOP5 投稿增长非常多，但发表并没有增加很多，录取率从七八十年代的百分之十几，降到现在的百分之六。

的确，纯粹做理论研究的学者在减少，做实证研究或者做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研究的越来越多。同时，做实证研究的作者，选择合作发表的形式比较多，这可能首先因为需要作者有不同的技能、不同的知识背景，一起来合作做研究；其次因为每一篇文章从研究到发表的周期也比较长，所以也需要有更多的合作者一起来完成。

从年龄上来说，至少在美国，教授退休的年龄在提高，所以 50 岁以上发表顶尖杂志文章的作者的比例也相对提高。

另外，对文章的偏好来看，不同的杂志有不同的偏好，例如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发表比较多的是应用型的研究。

从研究领域来说，发展经济学等偏实证方面的研究比重在增加，计量方面、工具方面的比重稍微有所下降。如果研究跟潮流比较接近的话，也会增加发表的机会。同时发表文章也要考虑到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需求方面要衡量研究领域对社会的影响，从而影响发表的概率。高端杂志的影响力比较大，所以好的文章聚集在高端杂志，就如城市经济学中的集聚效应。杂志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好的文章越多，名声就会越好，层次就这么分开了。

**孙宁：**日本经济学界完全分成两个学派，有一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尽管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势力非常大。另外一派是近代经济学，其实就是西方经济学。如果需要熟悉日本的大学，一听学校的校名就知道是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了，而且这两个学派的老师不会有任的学术交流，这是日本经济学的现状。当然了，他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慢慢在消退，而研究近代经济学的学校越来越多。

**甘犁：**我讲非常具体的吧。我现在还是德州 A & M 大学全职教授，也是系里的资

深教授。在我做助理教授的 90 年代末、2000 年初的时候，当时所在学校（德州奥斯汀大学）大概是排名 20 名左右。那个时候我们要拿到 tenure（终身职副教授）的标准是发两篇 TOP5 的期刊，基本上就可以拿到。没有 TOP5 的文章，就不要想了。至少我去的前几年没有人拿到过，一批一批人离开了，系里觉得标准太高了，大家发起来很难，而且能发表的人就被其他的学校挖走了，可见 TOP5 对年轻人影响多大。而现在 TOP5 不是必要条件了。我想了解一下 Heckman 教授关于 TOP5 的基本论据是什么？

**冯帅章：**他其实使用了很多数据，比如说列了 TOP20 的学校，发现这 20 所学校发顶级期刊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在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上，可能 70% 的文章都是这 20 所学校发的。我感觉 Heckman 对于过度重视发表 TOP5 期刊，而不是真正重视研究表示忧虑。尤其是他认为有些年轻人的研究做的非常好，但是没有发过 TOP5，这对他的发展可能有不利的影响。

**刘国恩：**最近六七年间，在经济学的顶级期刊上发的文

章有一个特点，过去实证方面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是要有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要花比较大量的篇幅先铺垫，然后再讨论后面的相关问题。但我们发现最近几年 TOP5 有一些文章基本上将这部分省去了，开门见山就谈这个研究讨论的是什么主题，这个主题讨论的是哪些社会中的重大经济问题，过去这些问题可能研究过，但是过去的研究有缺陷等等。所以现在似乎更多开始关注发现的是什么，将前面一些不是特别必要的部分省略掉。我也注意到，发这类文章的作者，尤其是 MIT（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学者比较多。现在发顶级期刊的应用研究文章需要三个条件，想法很好、观察视角很好、数据很好，比如别人拿不到的数据你拿到了，同时对数据的使用也要非常好，比如说甘教授有很好的数据就是中国的家庭金融数据。还有就是应用计量技巧非常好，如果比较幸运的话，也有可能发到非常好的杂志上。当然我们也无法解释里面更深层次的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至少给不擅长或不愿意花太篇幅写理论模型的人提供了机会，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

## 理论还是实证？

**冯帅章：**第二环节：理论还是实证。事实上近来国际主流经济学界也有很多讨论，包括认为实证研究是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因为数据的可得性、计算能力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学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到底中国经济学界是需要更多针对具体国情的实证研究，还是比较抽象理论研究，可以为我们冲击诺贝尔奖？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甘犁老师和孙宁老师先给我们做五分钟的主题发言。

**甘犁：**做理论研究的人，无论是华人还是美国人，都可以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组织行为当中的普适规律，大量的理论学者在做这件事。去年我做过一个统计，2010 年以来在 TOP5 期刊上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发表的文章只有 1%，在这 40 篇文章中大概有 100 个合作者，这 100 个合作者当中只有二十个是本土学者，如果加上海外华人，大概就是三四十个的样子。中国经济的 GDP 在全世界占 15%，1% 的文章与 15% 的 GDP，显然是不匹配的。至少在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地位，而且我们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本来

应该有大量的研究要做。

问题出在哪里呢？中国经济问题不是主流问题，中国经济学家总体来说在国际上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包括暨南大学、上海财大、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过去十几年引进了差不多上千名的海归学者，他们通过课程教学带动了更多的年轻学者。我们经济学研究的范式是没有问题了，是国际化了，对方法论的掌握没有问题了，也是国际化了，我不相信还有什么方法是我们学者掌握不了的，我们这么聪明的人，有什么好的方法都可以掌握。我们有方法，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去做，虽然我们不是名校，可能发TOP5受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不至于说只发1%，我一直都在想到底是怎样的原因导致的。我觉得是因为没有提出好问题。发现问题可以靠观察、琢磨，但是更重要靠数据，靠大量有代表性的数据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以后，有理论框架、理论模型、分析，才能讲出道理来，然后才会有新的实证研究来验证数据、验证理论、验证模型。因此第一阶段是发现问题，第二阶段是理论创新，最后是实证的数据验证和应用。对此，大家应该没有争议。而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核心

当然是没有数据。

刚才主持人说，这么多团队在做各种各样的调查，好像我们数据很丰富了，完全不是的。比如昨天晚上我在抓紧改一个公积金报告，公积金9万亿的缴存额，4万亿的余额，24%家庭的工资收入，我们却没有研究，几乎是零。公积金连问题都找不到，怎么研究？我相信国际学术界是会研究的。比如关于时间的使用，这么宝贵的时间资源，我们没有研究，因为没有数据，搞不清楚中国人的时间分配是怎么做的。再比如我们跟大众汽车合作，大众汽车想知道中国每年两千万的汽车销售现状下，中国汽车需求是怎样的，中国汽车消费和住房、子女、二胎、结婚、离婚等各种现象的关系是怎样的。再比如我们提出精准扶贫，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贫困家庭的调查。没有问题、没有数据，怎么发顶级期刊呢？在我们做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调查之前，不清楚中国老百姓有多少钱，但是我们搞了差不多接近十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不清楚老百姓究竟有多少钱，我们还怎么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的阶段还不是做实证，我们的阶段还是在发现问题，一旦发现了问题，自然大量的学者就会去跟进。好的问题，将中国问题讲出来，我是相信能

够发顶级期刊的。我就简单讲这些。

**冯帅章：**谢谢甘老师，下面请孙宁老师讲一讲。有人认为中国做理论太少、做实证太多，您怎么看？

**孙宁：**甘老师所讲的阶段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通过好的数据才能发现问题，我们希望搞实证的经济学家尽可能的发现更多有趣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说到理论，大家想到的就是它非常抽象，都是用数学研究。事实上理论也没有那么可怕，其实有的理论非常接地气。另外年轻学者可能做抽象的数理研究，其实也不要紧，给他们一些宽裕的时间，将功底再做的扎实一些。他们有了有一定积累之后，肯定会在现实中找到问题，做一些更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在研究生阶段做的研究非常抽象，做一般均衡存在性的问题全部都用数学。尽管我是数学系毕业，为了做我的博士论文，还自学了很多数学。当时做这样的研究，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做着做着我可以和现实结合起来，而且有非常多的现实意义。例如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为美国设计通讯频谱的

拍卖，原来通讯频谱都是无偿发放给运营商的，但是经济学家帮助联邦政府通过拍卖的方式来发放，为政府获取了几百亿美元的收入。国内我们很多都是靠行政命令发放资源，如果也可以借鉴美国的方法，用市场机制或者拍卖的方式来发放公共资源，也可以给政府回笼大量的资金。在我眼中很多东西都可以通过拍卖进行市场配置，比如说各个高校的EMBA名额，这就是资源，因为它有价值。另外像烟酒专卖的许可证，都是资源。

理论经济学有时候和现实是非常接近的，非常接地气。现在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市场设计，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例如中国的车牌，有很多城市是有偿发放车牌，北京是通过摇号的方式，上海通过拍卖的方式。其实这些问题背后都需要理论经济学家来研究，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提炼出新的经济学概念和问题。例如，我在研究国内的车牌配置问题时，就提出配置机制的有效公平性问题。做拍卖理论的都知道，我们在评价一个机制时通常是从两个维度来评价的，一个是效率，一个是收益。但是当我们配置的是公共资源时，除了考虑这两个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公平性。公平性的概念怎么定义？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所以做中国问题研究，我们也有可能提炼出一些新的问题。

另外，我讲一下日本经济学界关于理论研究的状况。日本经济学界有一个传统，就是做理论经济学，从五十年代就有非常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例如有宇泽弘文。我回国也有十几年了，我了解到中国经济学学会研究理论的还是非常少，可能也就是两三个，而且还经常讲应用经济学。日本经济学会春季和秋季两次大会，关于纯理论的分会场每届至少有四五个，所以日本是有研究理论经济学的传统的。但是在国内，包括海外的华人，理论经济学家的确比较少，做的特别好的学者，例如周林老师、田国强老师这样的人非常少。其他一些国家，像土耳其、日本、印度等，做理论的非常多。美国一流高校做理论有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华人在美国高校做理论的，目前可能就是方汉明，但方汉明现在也是更多的从事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

我不是说要将理论和实证分割开，经济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理论的角度、实证的角度、实验的角度进行研究。现在大家都说这是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给我们提供了了解经济现象、

掌握经济规律的工具、素材，实证研究就是要利用这些数据去发现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经济现象或经济规律，这就需要有理论研究。一个好的实证研究，背后必须要有比较强的理论支持。反过来，我们有了理论，也需要有实证研究去验证。其实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比如说物理、天文学也是这样。先观察到一些现象以后，我们需要有理论物理学家做一些设想、假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然后进一步用观察验证这些物理理论。其实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也是非常类似，不要将实证和理论分割开。有一些做实证的学者说真正好的实证研究并不多，我想这背后可能是在国内缺少好的理论研究的支撑。这是关于理论和实证，我的一点观点。

**蒋东生：**首先感谢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讲一件事。中国的经济学界讨论问题的时候太偏于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性、微观理论的讨论在国内从来都没有成过气候。在微观理论方面，无论哪一本杂志都是很弱的，包括《管理世界》，《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而且国内的理论学者，不喜欢给国内

的刊物投稿，只看准国外刊物去投。我曾经有想法在《管理世界》上开一个栏目——中国经济微观分析，我专门找了一些研究者接触这个领域，最后我发现做不下去。

如果没有微观理论架构的话，我们对于市场交易这些问题很难有一个学理性、深层的理解。现在我们提出实证和理论问题，可能更偏向于将实证认为是计量经济学，更偏向于目前中国宏观问题的研究，而对微观有一些忽视。我个人觉得其实可以关注微观研究，向孙宁老师学习，也许他们可以努力出一本独立刊物。这件事我本来是预想《中国工业经济》去做的，但他们也没有做。甘老师的观点我也特别同意，我们首先从事实出发，不认识到事实就没有办法往下走。首先就是经验，经验寻找问题，然后确定事实，确定事实之后找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关联性，最后在事实的基础上去做理论的创新。我想这样的路径，是符合我们认知的路径。

**符育明：**新加坡尽管经济体量很小，但人均收入很高，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分量。新加坡提出的问题也是很少，由于政治上一党专政，政府也不欢迎学者去提问题，所以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数据，

但是很多数据也不公开。美国的情况是每一个政策的立法与出台，都需要辩论，要争取选票，就要研究对老百姓有怎样的影响，需要数据进行研究。

**刘国恩：**我从来不做理论，虽然我本身也是数学系毕业的，但是我对做理论的理解是这样的，理论是从实践进行提炼、抽象、总结而形成规律性的东西，并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对现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果失去了最后这个环节，这样的理论在我看来就没有太多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过去，至少我们所知道的经济理论包括两类，一类是技术性的理论研究，将我们所熟知的相关问题和观察，用数学形式表现出来。另外一类理论是规律性的，无论谁来研究它，基本上都跑不出这个规律的约束和指导。比如说有一些理论性的研究，包括周期理论，就越来越受到很多的质疑，如果周期理论真的成立，对我们现实应该有指导意义。

**甘犁：**我回国的时候，我算是做实证的，但是我还是有纯理论的研究，计量理论和经济理论都有。我一直认为实证的主流首先是对理论的验证，然后是对理论的应用，

利用理论验证和预测。现在的实证主流，就是对理论进行推导，然后得出变量正相关或者是负相关的推论。理论本身隐含了因果关系，实证就反复去验证，这是国际上实证的主流，是现在年轻学者做实证的主流。现在研究中国也是这么做，我只是觉得中国本身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在中国的研究，再往前走一步，不能说就从普世性理论推导到实证的检验，应该再往前一步发现以前中国和别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如果中国所有的东西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发展这么快，其他国家发展不起来，没有这么简单，不同可能就是环境的不同、可能就是制度的不同，可能是因为我们更加勤劳吧，可能是人的不同，或者我们更想赚钱，这些也有可能的。

## 中文还是英文

**冯帅章：**若干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发英文期刊，应该说成为了一种潮流，但是中文期刊同样非常重要，今天来了两位重要中文期刊的编辑。首先有请《管理世界》编委会副主任蒋东生教授

谈一下。

**蒋东生：**这要看发表文章的目的，如果你想要达到很现实的目的比方说毕业、评职称，甚至是否可以更好的跳槽，或者是能拿到国家级的项目等等。就中国目前的评价体系来说，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能发外文比较好的期刊，肯定不要发中文，因为这对你追求功名的目的更有帮助。除非你自身已经功成名就了，可以自由做学问了，想对中国大多数人讲一点自己的心里话，那就发中文期刊。

另外我觉得是大家不要一心投国外期刊而不顾期刊的质量。还是要追求公认的那几个TOP5，至少是TOP10。投国外排名较差的期刊有时候不如投国内比较好的刊物。近年来国内有学界有一些变化，更重视中文期刊，近期五年或者是十年，中文期刊在评价体系中的位置肯定在国内会上升。

再讲两个事情。第一，我觉得国际期刊跟国内期刊很大的区别是在审稿体系上。国外审稿体系更加关注国外关注的问题，国内的审稿体系肯定是关注国内关注的问题，关注的问题有差异。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国外期刊在审稿更注重于学理评审。而国内期刊在注重学

理评审的同时，还会自觉不自觉都对文章进行经验性检验。因为文章作者和审稿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文章所研究的问题大家都有经验，即使没有经验的话也可以去问有经验的人来讨论一下你讲的这件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从某一个意义来说，你在投稿的时候实际上就要考虑到这一点。中文期刊的前途是什么呢？我很悲观。为什么悲观呢？因为期刊有三个基本功能，期刊实际上是学术性的载体。有三个基本功能，传播信息、创造信息、评价信息。但是由于网络的出现，期刊传播信息这个功能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创造信息也比较少。第三个评价信息的功能是主要的。这件事毛病肯定很多，但是反过来说谁能替代？不能光指责它，还要找一个东西替代它，因为评价功能不能没有。如果有一天期刊的评价功能被替代了，学术期刊就没戏了。

**刘国恩：**我们发表学术论文目的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看看你发表论文地方的话语体系掌握在哪些人手里。目前至少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评价体系是在西方人的手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还你处于事业上升的阶段，

那还是得将特别好的文章投到现在学科评价、学术评价的西方经济学的相关杂志。

我们发表学术论文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传播信息、影响社会和世界，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希望能够产生改变世界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可能将很好的东西放在目前国内好的杂志上，也许产生的效果、产生的作用不一定比西方的杂志更小，因为受众人群不同。举个例子，周其仁老师的研究不是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做出来的，但是对中国相关政策的影响很大。我们给年轻教授的建议在你能够将饭碗拿住之后，可能要转向研究中国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发表的取向可以更多偏向于中文杂志。

**甘犁：**我补充一下蒋老师所说的评价体系的问题，就是依然存在独立于杂志之外的评价体系。在美国最顶尖的学校反而根本不看你的文章，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我的导师丹尼尔·麦克法登27岁评上教授时，只有一篇不算顶尖杂志的文章。但是德布鲁教授对他的评价是“这个人太聪明”，这就够了。顶尖的学校不去数这些“豆豆”，越往下的高校数豆豆越厉害，现在不光是数豆豆了，还要根据豆豆的大小精

确计算。我觉得这是可悲的，这是简单粗暴的管理，是不应该的，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命运交给少数几个顶级期刊的 editor，我想这是有风险的。

**刘国恩：**为什么顶尖大学可以采用除期刊之外的评价体系这个问题，我想这些大学之所以是顶尖大学，就是因为它们已经有这么一个平台、有这样的队伍、有这样的文化传承、有这样的高度。如果要将这个标准复制应用到水平更低的学校，估计这种靠人评价出来的结果，要比数豆豆的问题更多了，涉及到游戏规则、把控程度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应该更多的理解为什么顶级院校可以更好的使用这个方法，而比较低层次的学校不宜使用这个方法，所以还不能一刀切。

## 回顾与展望

**冯帅章：**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学研究取得很大的进步，学术期刊也是发挥了很大作用，具体发挥了什么作用，在回顾的基础上可以展望一下未来的趋势。十年以后我们再坐在这里谈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是怎样的水平？

**蒋东生：**从 95 年开始倡导学术规范化到现在，差不多

二十多年的样子，这期间中国期刊做了什么事呢？我觉得在前期基本上就是模仿，甚至投来的一篇文章完全是西方的套路，只是换了中国的数据，然后从简单的模仿到复杂的模仿一步步的发展起来。再加上海外学者的回归，这样的过程就直接引领了整个学术规范化，学术研究范式向国际化转轨。到今天我们试图在摸索自己在理论上的道路问题，但是还没有走出来，我对期刊是有一点悲观的。

但从经济学本身而言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在中国发展大背景下有许多中国问题是无法用西方理论解释清楚的，而这些问题就期待着中国学者，而且只能期待中国学者。

**刘国恩：**判断未来最好多看看过去发生了什么，如果看战后五十年，有两个现象特别显著。首先就是全球化，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全球化引领者无疑是美国，中国应该说是最大受益者之一。美国随着新总统特朗普上台，政策发生转变，特别是前两天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美国顶级经济学家基本一致地认为美国拱手将全球化的高地让给了中国。如果中国真的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将全球化这个大旗扛起来，那将对中国经济学研究争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大有帮助。

另外一点，如何拷贝西方学术研究，我想对蒋老师所说的做一个补充。其实拷贝不拷贝，内容很难拷贝，我们拷贝的只是方法。现代经济学研究形成的这一套研究范式，除非有什么重大缺陷，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改，我们要更新的一定是内容。这次历史舞台上全球化转型赋予中国的机会比过去多得多，相信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学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会更加重要。

**孙宁：**当然我很赞同刘老师的几个观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关于中国的研究肯定会在 TOP5 上的发表越来越多。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什么都是拿别人的，中国人有这样的义务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本身作出贡献。我希望将来咱们在经济学的一般教科书当中由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定律越来越多，希望年轻人当中可以出现这样的学者。

**甘犁：**大家知道中国在校学生 1/4 是经管类专业的吗？而这个比例在美国绝对不超过 10%，甚至还要低。所以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一定是有一个中国经济

学的市场存在，这个市场要对接国际经济学市场，对接国际主流杂志。但是经济学不是像电影一样，只有大明星有饭吃，小明星没有饭吃了，可以有一批人做对接国际市场的研究，而有大量人研究中国经济的各种细节问题。

今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首先就是对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的解读。我们今后的十年，对中国的解读一定比现在深刻，不至于像如今这样无法清楚地解释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这个问题。如果能从一个侧面、几个侧面、若干侧面将这个问题讲清楚就不得了，这应该能够成为高水平研究

## 互动交流

**观众提问：**刚才各位老师讲很多学术研究、学术论文发表方面的问题，请问各位学术发表怎么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怎么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者与政策制订者的交流互动？

**刘国恩：**我从 2006 年回国以后基本上全程参与了国务院医改工作。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学者们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来看，学者们要想影响政府的相关决定

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在医改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就像主流经济学的争论一样，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究竟在这当中发挥多么大的程度，以至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把握尺度。说老实话，我不认为他们的决定受到我们多少影响，但是有一个贡献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争论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尖锐。

从我们学者的角度，不要将自己的研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定作为评判我们研究价值的最高尺度。这个社会有很多主体，政府是主体之一，让相关领域的人员，包括百姓、院长、医生、产业界人士等等通过我们的研究来加深对社会的认知带来的价值要比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更高一些。我更在乎自己的研究有没有传播正确的东西，有没有让社会更了解这些问题，而不是政府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是我的体会，跟你分享。

**观众提问：**我是跨界从公共管理到经济学，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应用经济学尽管做了很多实证研究，而且用了很复杂的数据模型，但是得到的结果与我实际观察调研到的实际现象很多只是基本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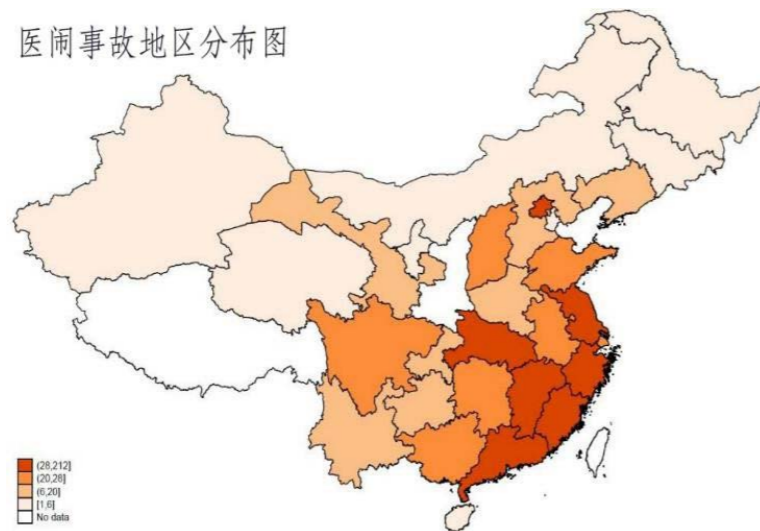
合，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怎么看待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研究？

**甘犁：**你说的问题，我理解，这也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刚才国恩谈到周其仁教授，我非常佩服，他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典型调研。他的思考方式就是深入到一个地方，然后将这个问题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流、去谈，更多是像费孝通先生的乡村调查这么一套模式和思路，这是首先需要的。但是同时也需要大规模抽样调查的经验，二者不可或缺。现在从老师到博士，到硕士，到本科，做的都是一样的，数据一拿来就回归，如果系数是正的就正说，负的就负说，然后就写政策建议了。我觉得这是范式出现了问题，有时候我称它是“新八股”。我觉得二者要结合，要有统计的样本数据，但是同时要深入细节做调研。好的研究、好的学者需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不可忽视任何一方。

## 我们将失去好医生吗？

● 两年前，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助理教授宋彦，还在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那一年，《纽约客》文章《刀尖之下》[1]，令他印象深刻。一个17岁的哈尔滨青年，由于有肺结核病史，医院告诉他脊柱问题暂时无法治疗。他便持刀袭击了四名医务人员，造成一名医生死亡。“脑子里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回国后就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调查。”

“对于高考医学专业录取和医闹的相关关系，国内基本没有人进行过实证分析。”当宋彦开始为脑海中的构思寻找证据时，因为缺乏高考录取等相关数据，他不得不将这个想法暂时放在一边。不久，事情出现了转机。在一次研究院的内部学术会议上，同事薄诗雨做了一个课题报告，其中涉及到高考数据的使用。“可以和同事合作，把想法继续做下去！”



注：  
图片来自未发表论文 Shiyu Bo, Joy Chen, Jing Liu, Yan Song, Sen Zhou : Occupational Hazard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 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一个横跨东西半球的团队建立起来——“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 Joy Chen 和教育系的 Jing Liu 与 Sen Zhou，主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搜集和初步整理，包括高考数据、医闹事件数据、控制变量数据等。薄诗雨和我则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回归分析。”邮件、微信等即时通讯和视频会议，保证了研究资讯传递畅通无阻。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看似互不相关的数据，渐渐揭示出令人忧心的现实……

medicine-related majors and the size of their intake.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College Enrollment Dataset

Year	Number of Provinces Included in the Dataset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College	Number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Medical Related Majors	Ratio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Medical Related Majors
2005	30	2064052	130373	0.0632
2006	30	2212660	149883	0.0677
2007	30	2419560	159312	0.0658
2008	31	2617349	171866	0.0657
2009	29	2564988	174550	0.0681
2010	29	2738889	183923	0.0672
2011	28	2690016	182768	0.0679
2012	29	2536494	173857	0.0685

注：  
表格来自未发表论文 Shiyu Bo, Joy Chen, Jing Liu, Yan Song, Sen Zhou : Occupational Hazard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 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 如何由现象得出结论？

提起医院，许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摩肩接踵的景象。医院拥挤而忙碌，在宋彦眼中，却不是能持续的“好现象”。他们的团队通过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医闹的影响下，中国医生的数量和质量双双呈现下滑的趋势！

“正如你所见，在 table1 高考录取数据表中，医学相关专业的逐年录取比例，甚至在 2011、2012 年还有回升，与我们的结论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然而，数据仅仅表现出简单结果，复杂的因果关系都被省略了。研究者们要做的，是透过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辨别

不同的变量，爬梳其来龙去脉，给复杂现象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要注意到两个问题。在数量上，我们应该考虑地区经济因素、人们对医闹事件的感知等。此外还有专业录取数量定额的问题，如专业招生数量必须达到某一定额才停止。另外，大学专业调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在相同数量甚至数量上升的情况下，医学生“质量”（以高考成绩衡量）可能会有所降低。“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甄别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不同的变量，对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

从 2016 年 10 月开始，到 2017 年 1 月，宋彦所在的团队主要对三

个数据库进行了深度分析。第一个是高考录取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2005-2012 年，囊括所有参加高考并被大学录取的考生数据，呈现了每年录取的大学生总数、被医学专业录取的学生总数、医学生比例。第二个数据库是慧科新闻数据库，作者识别出了 2005-2012 年间见诸报端的所有医闹事件，以时间、地点归类，并以伤亡人数度量严重性。第三个数据库是经济与社会数据库，包含 GDP、人口、社会等变量，如医生和病床数量等，研究团队将这些数据放入模型，控制项目不关心变量的影响。

关于高考医学专业录取和医闹关系的论述，逐渐充实起来，最终以论文的形式呈现现在我们面前。

## 小数据大影响

研究团队用医闹事件中的伤亡人数来衡量医闹的严重程度，用学生选择医学专业的比例来衡量未来医生的供给，用入学医学生的平均分数线和最低分数线来衡量未来医生的质量。实证结果显示，省级医闹的严重程度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考生选择医学专业的比例会下降0.56~1.7个百分点，医学专业平均入学分数会降低0.72个百分点、最低入学分数降低0.49个百分点。——乍一看，这些数据都很“小”。

然而，小数据却发挥着大影响。“近年来，全国的考生维持在900万左右。任何微小的“百分量”，乘以这个巨大的基数，绝对量都不小！”宋彦说。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IESR的研究团队从冷冰冰的数字背后，窥见令人不安的未来——我们或许将失去好医生。

值得注意的是，《柳叶刀》发布的一项研究佐证了文章的观点。文章显示，2005年至2015年间，我国共培养了431万五年制医学毕业生，以及41万七年制医学生，共计470万医学生，但医生总数只增加了75万。医生流失加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

研究团队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对医院医生的薪酬、药品价格和治疗费用等实行严格管控，即使医闹的增多、医生职业风险增大，中国医生的薪酬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提高。职业风险得不到补偿，人们从事相关职业的意愿被削弱。长此以往，社会上医生供给减少的趋势会愈发明显，医生供给的质量也将显著降低。

我们将失去好医生吗？“我有一些医生朋友。据我所知，他们特别不鼓励自己的孩子踏入医疗行业。”宋彦略显无奈地说：“我觉得，‘失去好医生’的窘况或许正在发生。”

## 未来我们该做什么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时，宋彦说：“今年5到6月，我们将会去武汉和香港的学术会议发表演讲，届时看看有什么反馈，期望能得到更好的数据和思路，再对论文作进一步改进。”

是否应该对令人不安的趋势实施积极的干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涨工资可以吸引一部分人去承担这个风险，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仅仅起到缓解的作用，这不是解决医患关系的治本之策。”他顿了顿，“应该改变医院

的盈利模式，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医疗单位做出了一些改变。一位一线医生这样表示：“医院近两年建立了医疗随访机制，患者对医务人员若有何不满，都能被反映到医院领导层。另外，由于医院进行信息化建设，患者从挂号到计价交费能一次性完成，大大减少患者的就诊时间，获得患者的好评。”同时，体制改革诸如医生多点自由执业，正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

“在医疗这一块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目前正在构思的是医闹与医生治疗策略关系的研究，即医闹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医生采取的治疗手段。”对他未来的一些研究工作，宋彦如是介绍道。

“啪哒啪哒……”在采访过程中，宋彦仍对着电脑，快速地做一些研究数据的处理工作。IESR的研究者们满怀着对社会的关怀，努力工作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社会，正在被他们一点一滴地探索……

（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学生记者李蔚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宋彦 本文载于微信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16日文章）

## “性别歧视”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的万恶之源么？

● 在前不久刚落幕的“两会”上，关于实施已近一年的二孩政策的讨论仍不绝于耳。一些人大代表反映，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育龄女性就业、升职、加薪等的压力，连傅莹女士也感慨道“道理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此，也引发了社会大众和媒体对于目前男女性在职场上的差别待遇的讨论，并且许多观点认为这种差异实际上是一种“性别歧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看待“性别歧视”？“歧视”的根源在哪里？

### “歧视”的根源

自20世纪中叶起，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与男性在教育、劳动参与、收入等方面的差异迅速缩小。尤其在教育方面，在发达国家女性的教育水平多已经赶超男性。但在劳动力

市场表现方面，性别差异依然存在。而**我国的情形是：性别教育差异在不断缩小，而性别收入差异反而不断扩大**。Zeng et al. (2014)整合了55篇涉及中国性别教育差异的文献，发现我国性别教育差异整体上已大幅度收窄，在城镇地区以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已经观测不到显著的性别教育差异。但在张俊森老师等2008年的一篇研究中，使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数据估计发现，**我国女性对男性的收入比例从1988年的86.3%下降到2004年76.2%**。近几年的其他研究表明这一趋势依然在延续。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一性别差异的存在？这一趋势的背后是否是性别歧视的加剧在作祟？为方便之后的讨论，我将只关注性别工资差异。需要注意的是，性别劳动力市场差异决不仅仅包含工资差

异，另外也包括劳动参与差异、工作时间差异等。

经济学上分析性别工资差异的一个经典方法是Blinder-Oaxaca分解。简单来说，就是将女性和男性的工资差异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由教育、工作经验等可观测特征差异所解释的“被解释部分”，剩下的残余项被称为“未解释部分”——这部分也经常被称为“歧视”。这也是目前研究我国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方法。因为我国也出现了“教育反转”的现象，即女性教育水平赶超男性，不难想象工资差异里“被解释部分”所占比重甚小，于是很多学者就得出结论：性别歧视是导致我国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但果真如此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本身就有着很大的生存压力，仅仅基于偏见而与生产力无关的“歧视”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利的。举例来说，假设男

性A与女性B生产力相同，一个企业由于偏见不愿意招聘女性B而录取男性A，这时其他企业就能以更低的工资录取女性B，因此企业在生产力相同的情况下用工成本会相对较高，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由此可见，性别工资差异的背后是生产力的差异。那么生产力差异的来源是什么呢？

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家庭角色与家庭内部分工如何解释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表现中的差异，通俗的说法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Zhang et al. (2008) 发现，在我国单身女性的工资与单身男性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已婚女性和母亲的工资会落后于男性。**我最近的一项合作研究也佐证了这一事实，在结婚前，男性和女性的工资趋势大体平行，并维持在一个较小的差距内。在结婚后，工资差异快速上升，并在女性“三期”出现一个暂时的高峰，哺乳期结束后女性的工资收入基本可以回复到怀孕期前的水平，但之后伴随着孩子的成长，性别工资差异再度不断拉大。**性别工资差异动态变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在结婚生小孩后，女性在家务劳动、看护小孩上投入的时间远高于男性，**这既降低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工作的时间，也

分散了女性在工作中的精力。比如我们观察到，小孩出生后女性请事假或病假频率提升远高于男性。

## 如何降低性别工资差异

我们先假设政府的政策目标是降低性别工资差异（这应不应该是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另一个单独的问题，在此不多加讨论），那么应该怎么做？是应该规定女性享有更高的福利，比如更长的产假吗？增设专门针对女性的补助？这类政策，经济学里有一个很贴切的名词，叫**强制福利（mandated benefits）**。相关研究表明，如果目标群体非常具体并且很容易定位（女性就是一类易于定位的群体），那么强制福利的正效果很大程度上会被工资下降的负效果所抵消。这也不难理解，企业有自己的考虑，在相同生产力的情况下，如果需要为女性员工支付更高的成本，那势必会在其他方面寻求弥补——降低女性员工的工资。即使政府通过政策法规强制规定男性女性工资相同，先不论这类法规的可执行性，企业也可以在招聘时对女性应聘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来实现平衡。

那么是否存在能够有效降低性别工资差异的方

法？根据我之前的分析，之所以会存在性别工资差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女性相比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负担（尤其是照料孩子），导致女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而不是工作上。按照这一逻辑，如果能够切实降低女性的家庭负担，将有效降低性别工资差异。特别是在长期内，企业可能改变预期，意识到女性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中。问题是，如何降低女性的家庭负担呢？

我们假设照顾一个孩子的总负担不变，那么这个总负担先可以先分解为社会部分和家庭部分，然后家庭内部再将家庭需要承担的部分分摊到各个家庭成员头上。因此，**降低女性的家庭负担无非两种手段：一是由社会提供更多的婴幼儿看护支持，降低家庭的负担；二是其他家庭成员担负更大的责任，降低母亲的负担。**

关于第二种手段，我认为政府在其中的作为有限。姑且不论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家庭的内部决策，孩子看护负担的家庭内部转移对家庭福祉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如果孩子由祖父母看护，那么会不会对老人的身体造成负担？确实有研究指出，很多老年人非常乐意照顾孙子女，并且陪伴孙子女让

他们感到高兴，但这种看护负担对老年人身体上的长期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另外，**伴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进，祖辈对于照顾孙辈的支持和帮助在未来很有可能下降。**那么，鼓励父亲分担更多的看护责任是不是会提高家庭福祉呢？这就涉及到比较优势的问题。如果父亲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比较优势，母亲在孩子看护上有比较优势，那么强制让父亲从工作中抽出更多的时间用在看护孩子上，就会对家庭总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可能反而会降低家庭总福祉。此外，父亲对于孩子的看护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代母亲的看护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改变看护孩子负担的家庭内部分担有难度的话，**提高来自社会的支持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我国对于婴幼儿照顾的社会支持一直十分欠缺。0-3岁的婴幼儿基本以家庭照顾为主，经济较为富裕的家庭可以雇佣保姆，但这并非普遍现象。即使到了孩子入园年龄（3-6岁），依然有大量幼儿无法进入幼儿园，并且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一些大中城市的幼儿入园率已基本达到85%，而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内，入园率依然偏低，有的地区幼儿学前一年的入园率还不到50%

（刘伯红，2008）。可见，目前我国对于婴幼儿看护的社会支持存在巨大的缺失与发展空间。加大这方面的社会支持，一方面可能直接提升看护孩子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间接改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当然，具体政策效果如何，如何设计最优政策，还有待更严谨的学术研究。

最后，我想说一点，我们对于女性的关注，不应该局限在“工资收入”、“劳动参与”、“雇佣”等有具体经济指标的方面，**更应该关注女性的“福祉”与“选择权”。**举例来说，女性A想生育二胎，并且之后打算将主要精力放在照顾孩子上，因此向公司提出辞职，公司批准了；女性B也想生育二胎，但公司没有同意辞职，并通过种种手段迫使她留在工作岗位上。从“工资收入”的表现上，无疑女性B会赚取更高的收入，但她的“选择权”没有受到尊重，“福祉”受到了损失。对于这种“选择权”的歧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如果一些女性倾向于将大量时间和主要精力投入在家庭上，让丈夫在外安心发展事业，孩子健康成长，家庭和睦美满，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高效的“生产力”呢？

（作者：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助理教授 陈祎

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13日文章）

## 当环境守法成为“新常态”，蓝天白云才会常驻穹顶

● “奥运蓝”、“APEC 蓝”能否持续？如何评价近几年珠三角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

大气污染治理，一直是公众热议的环保议题。

在今年刚结束的两会上，“蓝天保卫战”继续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 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实现这个目标又需要哪方面的努力？面对以上问题，我们专访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唐曲。

**产业结构升级是解决大气污染的根本方法**

2013 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十条”，提出了十项具体的污染防治措施。2017 年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实施的最后一年，要实现既定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同时，今年两会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蓝天保卫战”，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给出了一些明确的措施，包括：从燃煤电厂和居民散煤使用两方面加快解决燃煤污染问题，全面推进重点行业 and 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强化机动车尾气治理，加强对雾霾形成机理的研究、重点区域联防联控、应对重污染天气等。

唐曲认为，除了这些末端治理措施外，“彻底解决大气污染问题还需要从源头入手，将污染治理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联系起来，加快化解过剩产能，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落后产能，优化能源结构。”另外，严格环境执法和督查问责，落实地方政府的环保责任，健全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也是重要的应对措施。在唐曲看来，只有当环境守法成为“新常态”，蓝天白云才会常驻我们的穹顶。

### “两会蓝”能否持续取决于效益与成本的比较

近几年，“奥运蓝”、“阅兵蓝”、“APEC 蓝”、“两会蓝”的出现，说明了雾霾是可以控制的，但这背后是大量工地停工、企业停产、机动车限行管控。这种短期内效果显著的“风暴式”污染治理模

式能否持续？

对此，唐曲认为，“这取决于蓝天白云带来的效益与停产停工导致的成本之间的比较。”环境经济学对此已经展开了大量研究，包括空气污染对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工作效率的负面影响，利用人们的防护投资行为定量评估对清洁空气的支付意愿等。M. Greenstone 2002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清洁空气法案在实施的最初 15 年（1972-1987）导致不达标县的污染行业失去了约 59 万个工作机会，370 亿美元资本存量，以及 750 亿美元产出。唐曲在博士论文中估计了美国 SO2 排污权交易改革会导致电力行业增加约一倍的减排成本。目前，她与合作者正在利用中国的数据研究空气污染对认知能力以及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

归根结底，“对污染治理最大的担忧来自于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唐曲说。

### 我国排污权交易仍未真正市场化

我国从 1993 年开始探索大气排污权交易的实施，1999 年以江苏南通和辽宁本溪两地作为试点，与美国环保局合作开展了“运用市场机制减少 SO2 排

研究”项目，并于 2001 年在南通实施了我国第一例 SO2 排污权交易。2002 年试点范围扩大，建立“4+3+1”SO2 排污权交易试点。2007 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到 11 个省市，并将 NOx 也纳入交易范围。2014 年，国务院提出到 2015 年试点地区全面完成现有排污单位的排污权核定，到 2017 年底基本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2016 年国家发改委明确在 2017 年启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回顾我国排污权交易市场建设历程，唐曲认为，总的来看，尽管试点地区不断扩大，但实际排污权交易并不活跃，已进行的大多数交易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机制下的排污权交易。

那么，在排污权交易制度建设方面，国外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唐曲向记者介绍了美国于上世纪末推行的酸雨计划（the Acid Rain Program）。

早于 1990 年，美国在修订清洁空气法案中就引入了排污权交易制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酸雨计划。酸雨计划的目标是通过两个阶段的努力，使美国燃煤发电厂 SO2 年排放量降为 1980 年的一半左右。在这一目标下，美国环保局首先确定了一个

允许电厂排放的 SO2 总量（Cap），然后将这一总量分解为若干排污许可（permits）。每一份排污许可代表着一定的 SO2 排放量，并且可以在所有电厂之间以 1:1 的比例进行交易。大部分的排污许可是依据每个锅炉的历史煤炭用量和一定的排放标准无偿进行分配的。由于不同电厂的减排成本存在很大差异，酸雨计划提供的在自行减排和交易排污许可之间的选择机会，激励了电厂寻找最低成本的 SO2 控制措施。酸雨计划以低于其他污染控制政策 15-90% 的成本实现了美国 SO2 排放量的大幅削减。尽管该计划近年在美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但唐曲认为，对中国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仍具有参考意义。

### 排污权交易需考虑不同污染物特点

唐曲认为，未来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需要注意以下 5 方面的问题。

首先，排放总量的核定非常重要，要同时考虑环境质量目标和减排压力，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态调整。总量过低会带来高额的减排成本，导致减排目标难以实现，并影响交易制度在企业层面的接



受度；总量过高则无法真正体现环境资源价格，不能给排放者提供足够的减排激励。为此需要正确掌握企业的排污现状。

其次，关于初始排污许可的核定和分配。美国酸雨计划根据企业基准期燃料消费量和一定的排放标准核定初始排污许可，并进行无偿配置。我国各试点地区对初始排污许可有不同的核定标准，并明确提出初始排污许可实行有偿配置。尽管理论上初始排污许可的分配不会影响排污交易市场效率，但在实践中由于市场分割、不完全竞争、已有环境政策的作用等，初始排污许可的核定和分配方式是否会影响企业最终的排放水平，以及利益在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三，在交易机制的设计上要考虑不同污染物的特点。如SO<sub>2</sub>和NO<sub>x</sub>属于非均匀混合污染物，其污染的影响与排放源地点和扩散条件有关，如果所有地区的企业都按照1:1的比例进行交易，那么排放许可的价格（边际减排成本）不等于实际的污染边际损害，排污权交易不能实现理论上的经济效率。而CO<sub>2</sub>则属于均匀混合污染物，不同区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相互链接可以扩大市场规模、

带来更多的交易主体、降低减排成本。在进行跨区域碳市场链接时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则是如何使不同的市场设计和配额能够相容。

第四，在行业和区域覆盖范围方面，排污权交易市场通常都从电力、钢铁、石化、建材等排放量大、减排有一定潜力空间的行业和重点区域入手。这种不完全的覆盖会导致排放泄露（emissions leakage），即生产（以及相应的排放）转移到没有纳入交易体系的企业和地区，从而削弱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减排作用。为此需要综合利用多种环境管理手段建立一个统一的减排体系。对于纳入排污权交易市场的行业和区域，还需要注意与已有环境管理政策的衔接。

最后，唐曲认为，如何获取准确有效的企业排放监测数据是我国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 珠三角大气污染需精准治理

2015年珠三角地区SO<sub>2</sub>平均浓度14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一级标准；NO<sub>2</sub>平均浓度34微克/立方米，有8个城市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在备

受关注的PM<sub>2.5</sub>方面，2015珠三角地区平均浓度34微克/立方米，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相对2013年下降了25%以上，提前两年完成了大气十条中期目标要求。

该如何评价近几年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

“总体来看，珠三角地区空气质量状况优于京津冀、长三角及全国平均水平。”

唐曲认为，珠三角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有其地理位置的独特优势，也得益于该地区经济起步早，对空气污染问题能够做到早发现、早应对。“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经验说明通过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强区域联防联控、严格环境执法，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大气环境改善。”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地区臭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2015年臭氧甚至超越PM<sub>2.5</sub>成为主要污染物。唐曲认为，未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还面临着许多挑战，需要深入实施精准治污，加快解决大气复合型污染问题。

（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唐曲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学生记者 谭璇璇  
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20日文章）

## 大数据时代， 我们为什么 还要入户调查？

● 在当下大数据风行的时代，我们依然在执行住户调查，而且一直在坚持。

社会在越来越走向数字化，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交织出了一个大数据的新网络。我们个人实时的消费习惯、资产配置、出行模式、地理定位、社交关系、娱乐活动等，都被编码成不同形式的信息储存在各大商业公司的数据库中，为市场营销、金融咨询、甚至政治选举这样重大事件的预测提供了海量的信息基础。这股潮流近年来也渐渐地蔓延至了学术界，涌现出了很多颇为新颖的研究话题。在学术价值上，大数据宝贵的一点就是极大程度将数据的收集化繁为简，省去了冗长的问卷调查过程，为研究者节省了不少精力和时间。

而此前的几十年时间，**住户抽样调查**一直都是社会研究的一个主要数据源。如今在这样一个大数据风行的时代，传统的住户调查会逐渐地被

淘汰吗？为什么我们现在依然在执行住户调查？笔者近期在参与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RUMiC）督导培训会议中，有一些思考，在此抛砖引玉，与各位同行分享。

**首先，住户调查注重个体和家户行为的成因，而大数据更多的分析只是局限于相关性。**

研究者利用住户调查的问卷信息，探究某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机制。比如，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在家的老人精神状况的影响。而大数据的亮点之一，就是包含了某固定群体的全样本，这**有助于精准地分析某固定群体的总体特征**。比如，大众点评网的用户有五成以上是女性，年龄段聚集集中在15至40岁之间，或者民谣歌手歌词中念叨“南方”比“北方”的频率高出六个百分点等等类似这样的描述性统计。这样的分析揭示的，**仅仅是某种趋势和规律。**

**其次，住户调查涉及的个人信  
息维度更广更深。**

问卷会收集个体及其家庭的生活条件、福利状况、教育历史、工作信息以及近年来逐渐增加的各种心理认知和健康方面的测度。同时，家庭中所有成员的特征、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活动也会被收集。研究者不仅可以利用个人信息探索个人行为的成因，也可以探索代际的家户决策的成因，如教育投资、转移支付、老人照料等。而大数据，虽然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数据集很多，但都只有各自侧重的维度。携程的出行数据、淘宝的交易数据、微信的社交数据，在目前的商业环境和数据保密协定的规制下，它们彼此很难完全融合，使得研究者可以全方位地了解个体。

**再次，住户调查能确保访问到当前大数据中遗漏的个体对象，同时进行逐年追踪。**

农村人口和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学术研究中需要高度重视的两部分劳动力。这当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互联网的频繁使用者，他们的家庭情况如何，需要我们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才能了解全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必须通过访员孜孜不倦的联系和沟通，才能保证我们可以追踪其家庭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演变。

大数据不是万能的，当然，住户调查也不是。受访者拒访率的提高，**越发增加了执行调查团队的工作难度**。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正在进行的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简称 RUMiC) 培训会议期间，具有该项目多年调查经验的督导汇聚在一起。他们每一年都带领一队访员去实地采访新住户，并联系往年老住户进行追踪调查，也缘于此，他们与很多当地的外来务工人员相识。某地的督导讲述了一次自己冒着大雨给受访住户送去节日问候和调查致谢礼金的场景。

“调查不是冰冷的你问我答，不是填完问卷就走人。跟受访者的深度交流都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的确，传统的住户调查可以提升的空间还有很多。比如，今年 RUMiC 调查的执行

RUMiC 培训使用平板模拟访问

方式由**纸版记录全面升级为平板电脑问卷**，社会调查中心的同事们每天加班加点编程修改程序模板，对问卷内容字斟句酌、调整逻辑跳转关系和导入老住户原有信息，确保平板操作的问卷方式能让访员和被访者都更好地接纳。因此，拥抱新的变化，对传统的住户调查着实重要。

说到这里，我也去搜集了一些国内住户追踪调查的情况，发现优质的住户追踪调查依旧屈指可数，我也深感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建设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库的大业任重而道远。目前我们承担的三大项目——中国家庭就业调查、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项

目、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追踪调查都已全面启动，旨在提供优质的长期家户追踪数据，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后期动态。既需适应大数据的潮流，也执着于对厚数据的追求。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在努力，而且会一直坚持下去。

(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王芷苓**  
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4月25日文章)



## 小额信贷， 精准扶贫之利剑

● 四川巴中南江县，川柏树村的金银花在阳光下绽放。它们迎风摇摆，为这个偏僻的山村招来“金银”。几个老人挥着手，脸上挂着笑容，送别即将往城里打工的子女……然而，在中国腹地的其他地方，“贫困陷阱”仍十分显眼——即使投资回报率很高，贫困家庭因为缺少投资资金，很难发展生产，只能继续陷于贫困的境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功使7亿多人口脱贫，有效地消除了大面积贫困。但是另外一方面，相当多仍处于赤贫状态的家庭，散落在偏僻的山村。这些家庭致贫原因多样而复杂，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已经难以奏效。“有时，区域性的扶贫项目，甚至会拉大地区内的贫富差距。因为那些

能力较强的人，更有机会获得贫困扶持资金。”蔡澍解释道。“现在的扶贫工作已经瞄准到‘户’。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建档立卡’的工作，为贫困户建立个人档案。”在蔡澍看来，在现阶段，“小额信贷”是精准扶贫的一把利剑。

### 对“小额信贷”的评估

“‘小额信贷’是国际学术界使用的广泛意义的术语。在中国，具体指的是‘贫困村互助资金’。”目前，蔡澍试图分析，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能否突破早期扶贫措施的局限。每年，国家将贷款资金通过农村信用社下发到村。由村民选举成立委员会管理和运作贷款资金。家庭如果需要资金，可以到委员会申请，签协议盖章后，凭证去信用社取钱。借款用于什么项目，由家庭和村庄自己决定。这不同于早期的专项扶贫贷款，如资金专门用

于修路等。“初步研究发现，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一定程度上契合‘精准扶贫’的理念。”

2016年3月，蔡澍跟随团队，到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进行调研。他发现，南江县的川柏树村，正在推广金银花种植。农户可以到植保站购买金银花苗。金银花种植对劳动力要求不高，种植一到两年后就可以采摘，出售给药材公司，为农户带来可观的收入。“这个产业前期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除了种苗的购买，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川柏树村地处山区，降水容易流失，需要建设蓄水池。”蔡澍观察到，帮助拓展经济作物种植的同时，互助资金也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年轻人可以到外地打工，进一步扩大家庭收入。



川柏树村的金银花种植已初具规模

试验组家庭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明显增加，如更多从事经济作物生产、加大畜牧业饲料的投入。同时，互助资金也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在试验组有更多年轻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

### 在中国的实验结果令人惊喜

“我们很惊讶地发现，这个随机干预实验的效果非常明显！试验组收入增加得非常快，消费明显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如果前期农民得到贷款进行生产性投资，由于投资回报率较高，他们不仅能够将贷款还上，还能够继续扩大生产，形成良性循环。



收入增加的农民盖起了新房，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

十年前，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刚开始试点。实施早期，国家委托相关研究单位对项目进行评估。评估的方法主要是随机干预实验。

评估工作在山东、湖南、河南、四川、甘肃五个省份展开。评估组在每个省选出两个贫困县，在每个贫困县中选出五个贫困村。再随机选择3个为试验组，发放小额信贷资金，剩下的2个为对照组。“诚然，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方差别较大。实验在同一个县内的村庄中随机选择试验对象，客观的差异较小。”

两年后，评估组对农户进行跟踪调查。评估组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蔡澍和他的团队发现，同期在印度、墨西哥、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等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试验，小额信贷对农户增收没有明显作用。这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通过对比分析，蔡澍和他的团队认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四个。

首先，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很大。如果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收入增长可能非常巨大。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农民工打工一个月所得的工资，可能等于他原来进行半年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

第二，在中国城市，农村流动人口相对容易找到工作。中国加入WTO后，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飞速发展，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与此不同，印度IT产业发达，对高学历劳动力需求大。受学历制约，印度农村人口进城后可能面临失业。因此在印度，小额信贷使贫困户农业收入增加，外出打工收入并未增加。在中国，则是农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双增加。

第三，中国贷款周期长。中国的小额信贷通常以一年为周期，外国的小额信贷很多要求每月甚至每周还款，这可能导致农户资金流断裂，削弱农户投资生产周期长但回报高的项目。

最后，中国小额信贷项

目刚刚起步，国内农村缺乏资金的现象比较严重。外国NGO比较发达，贷款项目借NGO组织已经得到广泛的推广，农村生产性资金相对比较充足。

### “救急不救穷”

“可以看到，小额信贷项目的推出，满足了农村家庭生产性活动的借贷需求。”蔡澍进一步解释道，“在乡村，自己生病或孩子上学缺钱，跟乡邻借钱相对容易。但如果要置办产业，钱就比较难借。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消费性借款容易取得，生产性借款较难取得。”

在论文“Lend to the Needy, but Not to the Poor: Indirect Effects of a Microcredit Program on Informal Financial Networks”中，蔡澍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互助资金下发到村后，没有贷款的家庭，跟亲朋好友的消费性借款反而减少了。

“按理说，没有接受互助资金的家庭，应该不会受到项目实施的影响。”有趣的现象促使蔡澍深入研究下去。排除诸多因素后，他得出一个比较可能的解释：项目实施后，家庭发展生产的资金有了一定的保障，因此家庭生产性储蓄的动机减少了。

让我们进行一个思维实验。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

年关将至，至少面临两个花钱的项目：一是置办年货，二是购买开春的种子和秧苗。根据“救急不救穷”的原则，一个家庭较易借到置办年货的钱，较难借到开春购买种子的钱。没有互助资金项目的时候，对于家里的储蓄，一个家庭倾向于留到开春购买种子和秧苗，因此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购置年货。有了互助资金后，村民预期到，明年开春可以从互助资金获得贷款，所以没必要存储开春购买种子秧苗的钱，买年货则可以动用家庭的储蓄，无须向亲友借钱。这也表明，村民在融资选择上有优先排序，他们倾向于能不借钱就尽量不借钱。“这关系到人情借还和面子问题。”

关于“救急不救穷”，蔡澍曾在不少会议上多次和其他国家的研究者讨论过，“我发现这个现象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普遍存在的。”

### 小额信贷不是万能药

是不是跟村委会比较熟悉的村民，比较容易获得贷款？“接下来，我们会分析人际关系与贷款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比如，获得贷款的户主与村委会的负责人是否有相同的姓氏，家庭贷款率与家庭成员在村委会任职是否有相关关系，等等。”

此外，贫困村互助资金的成效与地区背景高度相关。尤其在地处偏远、缺乏发展资金



村长在田间讲解金银花种苗种植技术



蔡澍（左一）与村民访谈

的乡村，项目效果会更显著。扶贫工作中，人的因素也非常重要。“一个地区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地区有‘能人’。在南江县调查中，我发现村官、扶贫工作主管官员的个人能力很重要。”蔡澍提到两个人物——南江县扶贫办的兰主任和川柏树村的村长。

“对于扶贫工作，别人可能认为是一种任务，兰主任则把它当作切身的事儿。他几乎跑遍了全乡的所有贫困村，细致了解信贷项目的贷款利率、资金分配等问题。他还善于想办法，让全县各村上报发展项目，类似‘竞标’，公开评比优劣，选出最有潜力的发展项目。项目如果进行得好，还有奖励措施，或下次有扶贫资金时会优先考虑。”

“在川柏树村，村长在村民中间比较有威望。种植金银花之前，村长带领大家尝试过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摸着石头过河’，最终选择了金银花。村民对村长的支持是该村成功的一个关键。”

贫困家庭自身的因素同样重要。如有些人偏好于即时消费，储蓄愿望不高；或比较保守，不愿投资风险较高的生产活动。“目前的数据库里面没有这方面的度量，接下来的调研会尝试增加相关问题，并考察这些因素与扶贫项目的交互作用。”

“学术界存在争论，‘贫困’到底是受市场等外部因素制约，还是受个体内在因素制约。我想是兼而有之。”蔡澍

总结说。

### 多样化的扶贫方式

贫困原因的多样化，使各地采取的扶贫策略各不相同。目前，已经有“黑土麦田（Serve for China）”项目、光伏电站扶贫、劳动性收入奖励等多种形式。

对于那些缺乏发展条件的地区，比如地震灾区、存在地方病、地理环境恶劣等“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区，会考虑易地扶贫搬迁。

“目前，异地扶贫搬迁的规模挺大的，约占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一。一般以自然村为搬迁单位，优先安排贫困户。”关于异地扶贫搬迁，蔡澍计划参与一个跟踪调研，观察搬迁家庭生活的变化。“希望可以总结

一些经验。”

至于那些“扶不起”、没办法帮助的家庭，则会有社保资金、五保资金兜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日新月异，“很多人觉得中国渐渐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广大的腹地，很大一部分人仍在贫困线挣扎。深入农村调研，目睹很多农村老百姓的疾苦，深有感触。”

“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学生记者 李蔚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助理教授 蔡澍  
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5月19日文章）

## “减税”真的能“减负”吗？ ——中国制造业企业经营之痛

有过企业调研经验的前辈总会谈到，与企业座谈最重要的两点忠告：第一，企业对政府部门的态度谨慎，感情复杂，可谓又爱又恨。一方面，他们迫切希望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害怕政府巧立名目，新增罚没支出。第二，企业家座谈时喜欢吐苦水，只要问企业经营遇到什么困难，企业家总是滔滔不绝。

5月中，我们走访调研了2家位于江门的制造业企业。这两家企业分别专注于泵制造和模具生产，一家企业处于全行业领先的位置，另一家企业则处于地区中游水平。除了回答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调研提纲，两家企业最频繁提到的两个词就是：“税收优惠”和“行政收费”。让我们非常意外的是，企业最叫苦不迭的，希望我们能够以学术文章或者调研报告呈现给政策制定部门看的，并非税率高或者融资难的问题，而是无法承担的高额行政性配套收费。

江门这家专注于泵制造

的行业龙头企业，产品销量占全世界总市场份额的30%。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同时开发新产品线，企业决定扩建。然而，企业进行新项目投资遇到的头号难题，就是报建。根据我国有关部门的规定，一个项目的报建涉及土地、规划、建设、发改、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环保、消防、供电、水利、电信等多个部门。报建费用零散且繁多，包括土地使用费、测绘费、房屋建设税、房屋质检费、房屋使用费、电力配套费、消防费、白蚁防治费、避雷费、人防费、自来水开口费、能评费、环评费、排污费等等。企业告诉我们，他们在建的新项目，仅行政性配套费用就高达千万。更让企业无法接受的是，费用均根据建筑面积收取，而非土地使用面积。尽管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努力集约用地，但是仍然无法享受任何优惠政策。另外，这些配套费用通常是中央政府层面收取的，江门市无权减免。

事实上，我国企业税费痛感特别明显，也来自于企业

多把行政收费都视作税收。企业规费的名目繁多，反映的正是政府部门的庞大和冗杂。今年4月，财政部颁布了财税[2017]20号文件，提出为了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从2017年4月1日起，取消或停征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50%。取消或停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上面提到的测绘仪器检测收费、白蚁防治费和房屋转让收费等。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企业和实体经济对税费的敏感性程度会远超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尽管在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思想下，中央政府已经开始为企业减负，但是这些政策究竟是隔靴搔痒还是改革的肇始，还有待观察。当我们问及，企业是否会因为经营成本过高而选择迁到内地甚至东南亚地区，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深知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是练“内功”，去面对自身的问题并改进。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些高昂的行政收费让他们不堪重负的时候，也不排除离开的可能。

（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牛梦琦  
原文载于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6月14日文章）

## 企业如何“走出去” 带动 国际化人才需求

在第121届广交会的展位上，山东潍柴进出口有限公司销售副经理杨明勇正在向采购商介绍一款柴油机产品。“潍柴已在美国、欧洲等地设立研发中心，招揽各国人才充实技术团队，研发针对当地的产品，也是快速打开市场的一种方式。”杨明勇说，在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如何抓住国际人口红利日益成为企业关注的问题。

记者近日采访了多家正逐步开拓国际市场的制造业企业。一方面，企业转型升级、机器换人，用工成本不断降低的同时，智能制造更有利于产品进入海外高端市场；另一方面，国际化人才在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过程中的价值正日益凸显。

### 机器换人： 智能制造打开高端 海外市场

智能家居、智能家电的概念在国内火热，同样也受到很多采购商的追捧。在格兰仕展位，以普罗旺斯智能空调、3.0KG壁挂式迷你洗衣机、10公斤大容积蒸汽洗滚筒为代表的智能生活家电，展现了“智慧家，趣生活”的品质生活新场景。

格兰仕海外市场部负责人介绍，格兰仕产品定位正经历中低档到高档转型。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格兰仕在进入欧洲市场的过程中，欧盟对空调能效比等环保要求高，在国内人力等要素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格兰仕通过引入自动化生产，“机器换人”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标准化水平，也满足了欧盟市场的高要求。

同样，美的集团不仅产品走向智能化，智能制造战略极大提升了产品品质和制造效率。2016年11月美的集团武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建成国内首条

自动化空调外机柔性生产线，工作人员从1.2万人降到3000余人。

广东轻工业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一名外贸负责人介绍：“特别是每逢年底，国内很多工厂工人提前回家过年，经常出现订单无法按时交货的情况。”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加之近年来国内环保要求也不断提高，他接触的一些加工企业也选择到东南亚等地投资设厂，将技术带到当地。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表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供应紧张、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可以对生产技术进行调整，加快智能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从而缓解劳动力短缺压力。而一些行业龙头型企业可以加快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投资设厂生产，利用全球劳动力，构建全球服务和零配件支持体系。

### 海外拓展： 高端国际化人才需求旺盛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217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205.4亿美元，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受到重点关注。

冯帅章表示，在拓展海外市场过程中，“国内大部分企业缺乏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清晰思路和战略规划。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的差异性，更需要利用全球人才的经验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及风险，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出口贸易伙伴国的多元化。”

在广交会现场，美的集团洗衣机事业部海外市场负责人称，“全球化经营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有时候直接派中国人去管理业务，因为文化等差异，结果并不理想，要让当地员工发挥积极性很

## 人才竞争： 创新政策机制留住人才

杨明勇说：“除了提供好的待遇外，潍柴也在积极帮助海外人才申请各类人才政策支持。”格兰仕、美的等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如何引进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都是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大量懂国际语言，熟悉国际文化规则，掌握法律商务知识的人才，尤其是服务贸易的发展，更依赖于人才的竞争力。

冯帅章告诉记者，我国既是一个移民输出国，同时又越来越成为一个移民输入国。到2015年，中国有1000万的外出国际移民，比2000年增加了接近一倍。同时，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专业人士。根据联合国估计，中国境内有接近100万的国际移民，占全部居

民的0.07%。现阶段，全球化人才流动逐渐成为主要趋势，中国需要抓住国际移民的红利，促进国家发展。

冯帅章认为：“在人才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机制保障更多的人才从全球化中受益，势在必行。”记者了解到，去年我国密集发布了一系列人才政策，国家层面开始实行更加灵活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制度；中关村先试先行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为来华创新创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提供出入境便利；多地试点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等，而且形成了区域人才政策竞争发展的局面；各个自贸区以及北京纷纷对各项重点改革举措先行先试，引领示范和推进人才对外开放。

(本文转自南方日报2017年4月27日A07版)

重要。”他介绍，美的集团的人才战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练兵，更加适合美的企业文化和发展节奏，特别是更加注重中国人才的国际化属性，在语言等方面加强培养；另一种方式，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发挥海外人才在销售、设计、研发等环节的作用。

格兰仕海外市场部负责人也表示，格兰仕北美分公司、中国香港分公司、日本研究中心基本都是当地人才。中国本土的制造、研发、设计等环节关键岗位上，企业自主培养的人才和来自日韩的专家团队各一半。在进行海外市场拓展过程中，格兰仕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剧增。

# 数据 调查



合影



学生访员培训中

## 我院调查中心赴蜀开展绵竹儿童 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 追踪项目第二轮预调查

2017年5月17日，我院社会调查中心副主任张晓一行8人赴四川省绵竹市开展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第二轮预调查。本轮预调查对金花和清道两所学校的三、四、五、六年级的所有学生、学生监护人及班主任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还对两所学校所有在外务工的学生家长进行了电话访谈。

5月18、19两日，工作组对61名通过简历筛选的学生进行了综合面试。本次预调查经过前期的简历筛选，共102位报名人员进入面试环节。最终经过层层筛选，共31名学生通过面试，进入培训队伍。

为保证学生调查员能够深入理解调查项目，推进项目顺利进行，社会调查中心副主任张晓、项目主管简昱

夏及肖和对31位学生调查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项目介绍、问卷讲解、面对面访谈及电话访谈的模拟练习和数据录入训练等内容。培训期间，项目组根据调查员的现场完成情况进行实时考核，暨南大学的录音核查团队对电话访谈模拟练习环节中的所有录音进行了核查。最终有22位表现优异的调查员通过考核，进入正式调查工作。

5月22、23两日，调查在金花学校和清道学校正式开展。调查员分组进班，按照既定流程认真有序地开展工作：监护人问卷、学生问卷、班主任问卷、电话访谈，期间校方领导与班主任也积极配合。直到下午学生放学开始陆续离校后，项目组成员和调查员才完成所有清点工作，准备返程。晚上调查员继续进行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电话访谈和问卷录入工作。目前工作组正在进行紧张的数据录入和总结工作。本轮预调查进一步完善了调查员招募与培训、实施流程各环节，为下学期即将开展的大规模调查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调查有序进行中

# 直击 CHES 项目 督导及访问员 “海选” 活动现场

自中国家庭就业调查 (China Household Employment Survey, CHES) 暑期访问督导和访员招募启动以来, 我院社会调查中心收到了很多同学的报名申请。社会调查中心副任何李芮、项目主管肖和、项目督导王依淳, 以及 CHES 项目的合作伙伴——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 3 位项目督导于 2017 年 6 月 3 日 -4 日在暨南大学校本部开展了 CHES 访问督导和访员的选拔工作。

来自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南大学等多所省内外高校的近 250 名同学参加了此次选拔。选拔方式分为现场面试和笔试两大部分。由于报名人数较多, 面试分 2-3 个场次同时进行。面试流程包括自我介绍、开放性问题回答等四个环节, 安排紧凑而有序。参与面试的同学们在面试老师设置的种种关卡面前都非常自信从容, 他们努力地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将难题一一化解。面试结束之后, 同学们需要在 20-30 分钟内独立完成一份笔试题目。此外, 社会调查中心项目主管肖和等人通过电话对因故不能来到现场参加选拔活动的同学进行面试, 逐一了解了这些同学的详细情况和个人能力, 从中筛选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人员。至此, 第一轮选拔活动圆满结束, 选拔结果也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请同学们静候佳音。

在这次选拔活动中, 项目组工作人员对同学们的热情与活力印象深刻。相信在这么多优秀同学的共同努力之下, CHES 项目一定会顺利开展并高质量地完成。同时, 参与项目也是大家锻炼能力, 展示自我的宝贵机会, 表现优异的访员和督导还将获得暨南大学团委颁发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称号。项目还在持续接受报名, 所以还没报名的同学请不要犹豫, 紧紧将这次机会拥在怀中吧。



# 我院与四川绵竹市教育局 共办“名师大讲堂” 讲座活动



我院社会调查中心  
副主任 张晓



绵竹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 彭波



苏州十中  
柳袁照 校长

2017 年 6 月 16 日, 我院与绵竹市教育局共同邀请苏州十中柳袁照校长, 为绵竹市各校老师们举办了一场“做一个有生命质感的老师——我提倡的大阅读”专题讲座。我院社会调查中心副主任张晓、项目主管蔺昱夏前往参加。

讲座由绵竹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彭波主持。我院张晓首先简短介绍了举办本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并播放了暨南大学和绵竹儿童

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宣传片。与会人员通过两则宣传片的介绍, 对我校、我院及绵竹项目均有了直观了解。

随后, 柳袁照校长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精彩演讲, 从全新视角阐述了他的教育理念, 提倡大家做敢于摔跤的教育, 做一路有风景的教育, 做超越常态的教育等。工作中的柳校长肩负着教育部华师大中学培训中心兼职教授、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硕

士生导师、苏州中小学教育管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职位, 生活中的他则是位诗人。讲座中柳校长分享了他的优秀诗作, 用精炼的诗句让大家领略到, 教育是一场诗意的旅行。最后, 彭局长以一首诗总结并致谢, 整场讲座在阵阵掌声中圆满结束。

该场讲座是我院与绵竹市教育局共建“社会实践与研究基地”之后, 在当地共同举办的第一场大规模学术



活动，不仅为老师们开拓了教学思想，也让“社会实践与研究基地”真正开始发挥作用。2017年5月，彭波局长和唐军副局长曾受邀参加我院首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并参与了有关留守儿童的讨论。日后，双方将继续加强合作，借助“社会实践与研究基地”的平台，结合双方的优势，在当地进行高水平、高质量的调查项目和学术研究，为当地、乃至全国的教育政策提供实证研究依据。

讲座现场



柳袁照校长与主办方合影



## 【采访手记】

# 如果可以，我愿拿家里土地换城市户口

4月22日是周六，对现年38岁的陈致和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在东莞某高档小区，陈致和有自己的专属“领土”——该小区物业管理中心内的一个4平米独立办公室。今年，是他来到这个单位担任物业管理的第14个年头。

陈致和的办公室光亮通透，内有独立空调，透过半米长的窗户，可以望见刚被雨水洗刷光亮的草坪，像很多有独立办公室的“领导”一样，陈致和办公桌上也放着一座目光骇人的老鹰雕塑。整个上午，他一直把自己埋在座椅中，期间接了2个电话，还有应付偶尔进来的同事。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么一份光鲜的工作，每月给陈致和带来的经济收入也就只有3500元，尽管这听起来的确比他第一份月入700

的小区保安工作好很多。

“有一点感到郁闷和没有价值，因为赚不到钱。”陈致和说。尽管单位给他购买了五险一金，但陈致和目前还是没有固定工作期限的合同工。

来自湖北黄石的陈致和算是老“莞漂”，用当地政府的话说，就是长期为东莞做贡献的资深“新莞人”。

在东莞拼搏，他不仅收获了事业，还找到自己的一生所爱——曹艳舒，并于2004年在老家有了第一个孩子陈子琪。现在他们有3个子女，最大的13岁，最小的8岁。

陈致和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小相架，相片里面两个孩子靠着妈妈的肩膀，露出甜美的笑容。这大概是作为父亲的陈致和每天对自己孩子思念的最好寄托。



办公桌上的家人合照

因为城市生活的高成本，自打大女儿出生，陈致和就决定将自己的子女送回老家，由自己父母代为照顾。最小的儿子在东莞出生，但两岁时也被送回老家，与姐姐们一起开始留守儿童的生活。作为父亲的陈致和，都不知道大女儿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因为花销大，两夫妻只在过年的时候回家，过年几天，大概是3个孩子一年中唯一能偎依在爸妈身旁撒娇的时间了。

在陈致和看来，这是留在东莞必须付出的代价。像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一样，他觉得只有逃离农村，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陈致和说：“我愿意以家里的土地换东莞的城市户口。”但他马上补了一句，“这怎么可能。”

据国家卫计委2016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像陈致和这样在城市中长期工作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2.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8%（截止2015年）。

他们是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主要增长方向，但社会福利、身心健康、工作待遇却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他们的子女在出生后不久，便要离开父母，成为留守儿

童。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简称RUMiC），自2008年开始便聚焦这一特殊人群，以入户调查的方式，研究限制人口流动的因素及其相关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人口流动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生活中的福祉，调查样本现以覆盖全国流动人口数量最多的9个省份和15个城市。作为长期生活在东莞的资深“新莞人”陈致和是该调研的受访对象。在4月22日雨后的上午，趁着工作的空闲，陈致和成为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学生访员甘同学的第一位调研对象，在与访员的一问一答中，陈致和的流动轨迹和生活际遇被一点一滴记录下来，成为宝贵的研究数据。



陈致和回答甘访员问题

（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学生记者 谭璇璇）

## 如果你也在灯火璀璨的城市中漂泊 ——记 RUMiC 项目访问员的一天

4月23日上午10点，项目督导李凤槐和访问员邓红梅抵达了位于广州某数码城，准备对提前预约的几位物业管理员进行访问。今年已经是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简称RUMiC）项目走过的第十个年头，期间不计其数的问卷访问员投入到这项调查工作中，足迹遍布了全国流动人口迁入迁出数最多的9个省份15个城市，调查样本量也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着。对于RUMiC而言，今天是平凡的一天，因为它同过去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并没有太大的分别；今天又是不平凡的一天，因为每天都能听见不一样的关于异乡漂泊的故事。

### 挥别故乡，城市中却没有我的家

今天第一个接受访问



受访者李东接受访问

的是来自陕西的李东，他的工作是负责监控数码城内的电子录像，工作地点就在数码城四楼一个狭小的监控室里。李东说，他2007年第一次来到广州，并通过做烘焙拿到了第一份收入1500元，此后也一直留在广州工作。现在，加上年终奖和节日礼品等，李东平均每月能

拿到4500元的工资。虽然，李东认为这份收入已经略高于留在家乡打拼的同乡人，但是他仍然不太满意现在的工作，打算下个月就去寻找新的落脚点。

工作期间，李东一个人寄宿在公司宿舍里，妻女都在陕西老家。这些年来，李东唯一一次回老家停留超

过3个月还是和妻子结婚的时候，而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和妻子也超过半年未曾见面。当被问及这样的分离是否会影响夫妻感情时，他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想多少会有点影响吧。”李东告诉访问员，他的妻子目前在陕西老家的一间餐厅工作，6岁的女儿正在老家上幼儿园，但他对妻子的工作收入以及孩子上学的花销状况并不清楚，甚至也没有一个大体的概念。

“如果拿你在老家拥有的土地来换广州户口，你愿意吗？”

“不愿意，（我）不想在广州落户。”

李东说，自己既不知道能否继续在广州待下去，也并没有长期留在广州的打算。目前，他也已经在老家购置了房产，并且付清了房子的首付，打算3至5年内就回到陕西老家去定居。

### 一眼十年，艰难中仍不忘前行路

上午的调查访问工作结束时，时间已经接近下午1点了，而下午的访问2点

左右又要开始了。

匆匆的午饭过后，我们趁着休息的间隙聊起了RUMiC调查的成长与变化。今年，RUMiC调查已经全面取消了过去的纸质问卷形式，而选择访员手持平板电脑入户访问的形式，这大大节省了访问和问卷结果录入时间。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反映流动人口的真实生活状况，问卷题目设计精细，且题量较大，每访问一户仍然需要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样下来一天最多只能访问4个住户。据李凤槐介绍，仅广州一市的样本量就有400个，因此每一期项目任务的完成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邓红梅补充道：“今天访问的还是比较配合的老住户，如果想要开展新住户（调查），时间将会更长，访问起来困难也更大。”

其实，即使是做老住户的跟踪调查，也会遇到种种问题。李凤槐说，有时提前联系受访者预约了访问的时间和地点，可访问员到达之后仍然可能扑了个空。另外，一些连续跟踪了几年的老住户认为，这样的调查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帮助和

改善，就会拒绝继续填写问卷。

同时，由于RUMiC的调查对象是城乡流动人口，流动性较大，跟踪访问难度很高。李凤槐说，就目前掌握的调查对象资料看，连续跟踪访问10年的受访者仅仅只有十几个，连续跟踪6年以上的受访者也不超过100个，每年都需要拓展新住户。“有许多受访者都像李东一样，可能明天，也可能下个月就搬走了。所以我们经常和他们（受访者）保持联系，偶尔送送小礼物，及时在数据库里更新他们的个人信息。”

### 每一个城市的劳动者都应被尊重

下午2点左右，张晓虹就匆匆赶到了数码城，这是RUMiC调查组对她的第6次访问。今年58岁的张晓虹和丈夫一起在石牌桥的一家公司做物业保洁员，至今已有十多年。

张晓虹的丈夫陈健昌年轻时是一名知青，被下放到陕西省渭南市南师乡，并在

受访者张晓虹接受访问



那里结识了张晓虹，两人由此步入了婚姻。2003年，张晓虹来到广州，开始了这份保洁员的工作，两年后，她的丈夫也加入了其中。

张晓虹和丈夫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外地工作，女儿也结了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如今，张晓虹夫妇常年在广州租房居住，靠着这份保洁工作养活自己。虽然两个老人的生活比较拮据，每月满打满算只有5000多元的收入，加之年

迈多病，一年的医药费支出至少也要几千块钱，但张晓虹仍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比较幸福，对自己很有信心，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也不时开怀地笑起来。

“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这个（我）很同意。”张晓虹坚定地点了点头。

……

“您愿意和本地人做邻居吗？”

“一般。”

“您愿意和本地人做亲密朋友吗？”

“也一般。（我和本地人）也做不成朋友，本地人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说着，张晓虹又眯着眼睛，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张晓虹告诉我们，自从来到广州，她还没有一次回老家超过三个月，现在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可能近几年就要离开广州，回到老家去务农了。

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李东、张晓虹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他们选择走出贫困落后的乡村，走向灯火璀璨的城市，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工作，却无法在自己每天生活的城市中找到归属感，不知道自己未来除了回到故土还能去往何方。而RUMiC要做的，正是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些在城镇化的浪潮中被推到城市边缘的人们，关注他们的需要，关注他们的迷茫与挣扎。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李东、张晓虹、陈健昌均为化名）

（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学生记者 徐忆璐）

# 原来，你是这样的调查！

## ——绵竹项目调查员心声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的第二轮预调查已结束，但对于参与其中的调查员来说，却永远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经历和独一无二的回忆。无论是持续两天的高强度培训，还是实地入校的真实调查，调查员们都有自己的感受，或酸甜，或苦辣。这些宝贵经历，也引发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持续的思考。



**“最累的不是调查，而是培训！”**

为了让每一名调查员做好万全准备，有能力应对调查现场可能发生的各种状况，项目组安排了两整天满满当当的培训课程，从熟悉问卷、当众模拟演示、一对一模拟面访、电话访谈模拟，到问卷录入，每个人都经历了调查过程所有环节的考验，甚至要PK掉自己的小伙伴，才能拿到那张进入正式调查的入场券。

**梁勤：**大家对整个培训过程的感觉，毫无意外都是：最累的不是调查而是培训！这样说是根据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次才加入这个调查项目，没有经验，老师们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们感到“亚历山大”，在练习的时候也对我们种种“刁难”。但是在后面的实践中，渐渐发现这样的“刁难”不是没意义的，进校园调查时遇到了比培训时更棘手的状况，所以也就应验了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做事前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最全的准备，才能更好地防患于

未然。

**郑曼：**在为期两天的培训期间我真心的佩服这个团队，每个老师都分工明确，培训计划进行得有条不紊，相应时间点该做什么事安排得合理清晰。培训期间，特别是电话访问培训和监护人访问培训内容，训练得很卖力，每当我对一些问题的询问方式和回答方式提出质疑，马上，老师刚好就会解答如何应对，让我心服口服，成功打消顾虑。

**蒲娇：**第一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在车上跟小伙伴说这太难了，感觉自己拿不下。因为超长的工作时间，加上过多的任务，我有一点不相信自己。直到培训第二天，老师们让我们每个人上去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做试讲，我战胜了自己，那种感觉真的超好。

**李顺贞：**两天的培训对我来说其实是很困难的，虽然我当过社长，当过班委，但我惧怕上讲台，更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在老师说签保密协议之前可以退出时，我一度有了退出的想法，那时坐我旁边的一个男生告诉我我要多锻炼自己，多经历几次就不怕了，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后来一想，真的必须

要战胜自己的恐惧了，不然出社会怎么办呢？现在，我做到了！

**刘炎玲：**成功通过面试之后很开心，同时也很紧张，说是会在培训两天之后再淘汰一些人，而且和我一起培训的人还有以前参加过调查项目的，所以在尽我最大努力适应时，我也一直抱着随时被淘汰的心理准备。在此我感受到了和学校不一样的东西，这次更加真切地体验到了选拔的“心跳感”，所以当最终名单出来时，我很紧张的开始寻找我的名字，当看到我的名字的那一刻，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兴奋、美滋滋、煎熬、触动……调查现场的复杂心情**

整个调查涉及到学生、老师、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们，他们可能跟调查员面对面，也可能只是隔着电话交流，但他们的真诚，给调查员们留下的是长久的感动。

**周林平：**晨光熹微，阴雨绵绵，好像这一座城市都被这层朦胧的纱裹着，但它仍然浇不灭我要去工作的热情，

也就是这样坐着车沿着蜿蜒的马路到达工作地点，第二天也是这样重复着第一天的热情……这应该算我大学生生活中第一次正式的经过选拔的工作，从来没有感受过我自己有这样认真工作的时候，我像打了鸡血的一样每天到了工作结束时还能精力充沛，因为我是真的热爱它，像我热爱生活一样。

**陈永：**到了正式调查活动的时候，看到那些活泼可爱的同学们，心里非常开心与兴奋。那些小朋友们都很听话，都能好好地配合我们调查人员工作，给我们调查活动减少了很多难题。感觉自己当了一回小老师，心里说不出的美滋滋！

**田佳奇：**调查中有一个环节是与留守儿童的家长做电话问卷调查，说实话，当时我的内心是煎熬的。在打电话前，我期盼着电话能够打通，有人接我电话就行；打通之后我又要想着怎样拉进与他的关系，说什么他才会更加配合；在访问过程中，自己还要时刻提防他冷不丁地挂断电话。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人，与他们有了各种不同的交流感受，有的喜，有的忧。

**周永莉：**在我负责的班级里面，有个小女孩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在班上18个孩子中，她是做题最慢的一个。她会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阅读题目，当我

走到她身旁时，她会不自觉的埋下头，不再继续答题。完成一份问卷后，由于她的母亲那一栏未填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问了关于妈妈的情况。结果，在刚听到妈妈这两个字时，她就哭了。这时周围的同学就一直在给我们工作人员说不能提她妈妈。后来班主任才悄悄告诉我们，她妈妈去世了，家里人一直骗她说妈妈外出上班了。每次中场休息时间，班上其他的小孩都在嬉戏打闹，而她却拿着一本厚厚的从图书室借来的书在阅读。这时我不禁在想，如果她从小妈妈能陪在身旁，她也会是个快乐的小孩吧。

我之前最担心的还是电话访问。说实话，就中国目前的现况来说，你接到一个电话，虽然对方是通过学校来对你进行的访问，但在涉及工资和家庭开支的时候，的确很难回答这类问题，就我自己而言也是抗拒的。所以，对于那些被我电话访问到的家长，内心真的很感谢他们，谢谢他们的配合与谅解。其中一位阿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给她打电话时她正在工作，旁边还一直有人向她咨询问题。隔着电话，我听到她对向她咨询的人说：你等一下再说，我现在有事。然后又用十分抱歉的语气对我说不好意思，让我继续我的访问。那一刻，内心最深处被深深地触动。

**调查暂告一段落，但思考和影响不停……**

预调查是短暂的，但留下的影响永不磨灭。经过这次的调查项目，很多调查员开始关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开始思考为人父母的课题，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也更加明白了未来的自己应该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罗茂之：**电话访谈中有一道题引起了我的沉思，这道题想了解在外务工的父母是否认为，父母长期不在孩子身边，对孩子的各方面发展是否会有不好影响。在我所访谈的家长中，有一半的人认为没有任何影响。我不知道这些家长是怎样理解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认为没有任何影响。我知道所有父母都是爱孩子的，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评价父母的这种理念到底好不好。思及此处，我的内心非常难受也很矛盾：父母的外出都是为了孩子，而他们所缺席的孩子生活又该怎么办？在他们的认知中，父母长期不在孩子身边真的没有影响吗？整个调查活动结束后，我发现有很多小孩的父母都离异了，而且是在他们一年级左右时发生的。我知道作为一个调查员不应该被情绪所左右，所以我努力让自己保持一颗冷静的心。然而在夜晚的时候我总会忍不住想，这到底是怎么了？婚姻到底代表什么？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当看到一提起父母就



开始哭的小孩时，我难以想象平日里他们是怎样坚强度过的。

**周书羽：**我所调查的是正处于毕业阶段的六年级，在调查中他们围着我让我帮他们写同学录，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同时也感觉到他们需要父母的关爱。在父母选择外出务工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能理解他们的做法，但是作为小孩监护人的爷爷奶奶们对教育并不懂，对小孩教育没有起到正面作用，这成为留守儿童教育方面的最大阻碍。

**杨美欣：**面对一群天真浪漫的小孩，就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其实我从小也是留守儿童，奶奶一手把我拉扯大。与其他小孩不同的是我有两个亲生姐姐，可能不会觉得那么孤单。在奶奶良好的教育和父母经常联系的情况下，我小时候没有什么遗憾。但看到很多留守儿童，还有一些离异家庭中的孩子，他们孤僻不爱说话，渴望父母的爱。面对这些情况，我就知道这个调查做的很有意义。

**艾桂先：**两次的调查，让我对留守儿童投去了关爱的目光，对社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社会中值得保护的群体之一，我们在行动！

最后，让我感动的是这个调查团队给我带来的正能量。张老师、肖老师、蔺老师让我看到的是做事严谨并且毫不含糊，分工明确，对团队持有的责任心。工作中我们能够认真严肃，私下我们又如同朋友，这些所有的所有都让我铭记在心是我的榜样，这些正能量我已接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希望和老师们有更多的沟通时间，能够给我传递更多的正能量，让我有一个更明确的前进道路！

(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社会调查中心  
蔺昱夏 张晓)

绵竹项目访问员们工作剪影

# 对外 交流

## 我院冯帅章院长一行访问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



我院一行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  
所长 向晓梅 教授

2017年4月12日上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带领我院助理教授刘诗濛、宋彦，助理研究员卢晶亮等一行五人前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进行交流访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教授对冯院长一行表示欢迎并就双方未来可能的合作机会展开讨论。

首先，冯院长向向所长简要介绍了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重点介绍我院成立一年多以来在学术研究、学生培养、智库建设等三个方面所做的工作。随后，向所长介绍了产业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工作成果及未来的发展

方向等基本情况。

向所长表示，产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优势在于立足广东省，能够第一时间同步了解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动态，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信息，使学术研究更加的“接地气”。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优势则在于拥有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水平科研队伍，为研究提供强大的学术理论支撑。向所长与冯院长均认为，双方的优势可以相互补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将积极寻求具体的合作方向，一同研究广东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为此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

## 我院冯帅章院长受邀参加第四届流动子女教育学术研讨会暨校长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会议合影

2017年4月15-16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邀参加第四届流动子女教育学术研讨会暨校长论坛。本届研讨会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新移民研究中心主办，由上海市教委政策法规处处长王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农民工子女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周纪平致辞。会议主题为“加

强长三角跨区协同，解决流动儿童教育”，来自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政府、公益机构的共40余位嘉宾就七大专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和讨论。

会上，冯帅章教授作了题为“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或是流动”的大会主题报告，与各界嘉宾就流动人口子女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来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钱颖一教授与 IESR 教师们交流

201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来访暨南大学，作客暨南学习论坛第46期，为全校各级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带来了一场“大学与学院治理”专题报告，详细论述了大学教育理念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改革实践。

在报告之后，钱颖一院长受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院长冯帅章教授的邀请，特意来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与研究院的教师展开交流，人事处处长王兵教授也全程参与交流会。

交流开始，冯帅章院长首先从数据、研究、智库、学生四个重要关键词来介绍了研究院的整体情况，也展示了研究院在治理方面的成绩与下一步的计划。钱颖一院长对研究院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招聘到20多位高水平的教师表示赞叹，对研究院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



钱颖一教授与 IESR 教师们合影

在冯帅章院长介绍了IESR之后，钱颖一院长与在场的20多位教师和行政人员交流，询问了每位教师的研究方向、求学经历、工作内容等。钱院长的亲和力和幽默的语言深深地感染了每位教师，教室里时不时传来阵阵的欢笑声。

期间，张思思老师向钱院长请教了智库发展的经验。钱院长表示，做智库工作首先必须要了解中国现实情况。不同于学术研究，智库的研究成果一定要有政策相关性。因此，研究什么比怎样研究更重要。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要聚焦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交流很快就结束了。最后，钱院长鼓励各位老师能够充分利用研究院创新性的培养模式与制度优势，在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我院院长冯帅章率队访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5月11日上午，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带领助理教授薄诗雨、陈祎、朱宏佳一行四人访问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心主任贺丹及其他专家就“人口与中等收入陷阱”为题展开了研究讨论。

在研讨会中，助理教授薄诗雨代表我院课题组做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人口因素的影响”的文献综述和评论，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也做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展示。专家组对课题组的研究分别作了点评，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研讨会后，我院课题组成员详细了解了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独特的数据资源。贺丹主任与冯帅章院长均认为，双方的优势可以互相补充并进行长期合作，以期继续展开与我国人口问题等密切相关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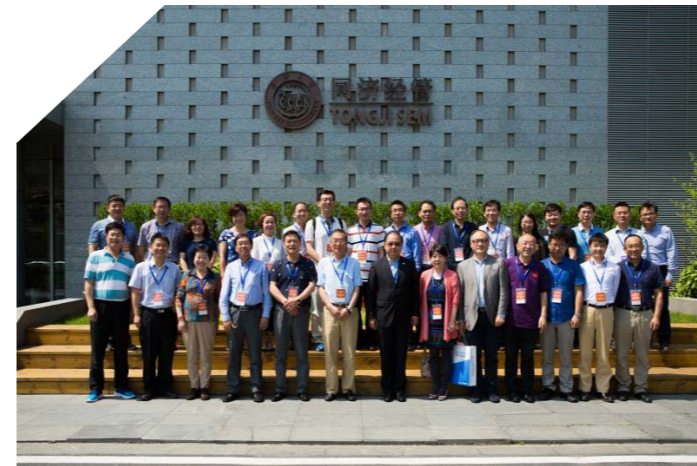
## 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简锦汉所长访问 IESR



简锦汉教授（左）与冯帅章院长（右）

5月17日，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简锦汉所长访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冯帅章院长向简锦汉所长介绍了研究院目前的发展动态，包括师资情况、科研成果与学生培养理念等。简锦汉所长十分看好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发展前景，双方都希望未来可有进一步的交流合作。

##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邀参加“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学术论坛并作主题演讲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学术论坛合影

2017年5月26日，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邀参加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学术活动系列——“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学术论坛并作题为“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子女问题”主题演讲。

参加此次学术论坛的嘉宾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罗楚亮，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罗必良，中



冯帅章教授

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仇焕广，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马恒运，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党委书记朱信凯，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白军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乔光华，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赵德余等国内知名学者。



## 我院助理研究员卢晶亮 参加中国收入分配论坛并报告论文



5月27日，我院助理研究员卢晶亮参加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收入分配论坛（2017）并报告论文。本次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及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联合主办。

卢晶亮报告的论文题目为《城镇劳动者工资不平等的演化：1995—2013》。该文使用1995年、2002年及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利用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 regressions）的分解方法，详细考察了城镇劳动者工资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

工资不平等的分解结果显示，1995-2002年城镇工资不平等的扩大主

要源自于结构效应，即劳动者个体特征回报的变动。高等教育回报的上升以及所有制工资差距、行业工资差距、职业工资差距的变动对工资不平等的扩大都有较大的贡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2-2013年城镇工资不平等的扩大主要源自于中高收入群体（90-50分位）工资差距的增加，

而中低收入群体（50-10分位）的工资差距有所减少。分解结果显示，构成效应，具体而言即劳动者所有制就业分布的变化是工资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构效应中，高等教育回报上升和性别工资差距扩大对工资不平等上升亦有显著影响；而行业间、职业间和所有制间工资差距在这段时间的变化反而起到了缩小工资不平等的作用。

分解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所有制就业分布变化，以及技能工资差距和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是总体工资不平等上升的三大主要推动因素。深刻理解以上因素发生作用的经济机制是制定针对性收入分配政策的关键，这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深入。

## 我院冯帅章教授应邀参加 “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 项目中检查会



冯帅章教授发言

6月8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项目中期检查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应邀担任专家组成员为项目中期检查做专家评估。项目检查会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李一军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何鸣鸿教授与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院士致辞。中国



会议现场

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以及智库项目分别进行了中期项目组报告，并回答专家组提问。在现场参观评估之后，专家组进行了讨论、投票，给出了中期检查意见。最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吴启迪教授进行了总结讲话。

## 我院冯帅章教授一行 3 人赴武大 参加计量经济学 2017 年中国年会



会议现场

2017年6月9日-6月11日，计量经济学2017年中国年会（2017 China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在武汉大学举办。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助理教授陈祎及宋彦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分会场分别作了题为“Human Capital and

Directed Technology Change: Evidence from China's College Expansion”，“Estimat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the Schooling”及“How do violent events towards doctors affect students' major choice”精彩的学术报告。

IESR  
人物



## 希望世界更好一点 ——蔡澍博士访谈实录

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士的时候，蔡澍每天花很多时间看新闻，“看新闻是我的‘必修课’之一。”

蔡澍总是让自己保持“接地气儿”，“我的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方向是中国经济。去香港求学，对内地变得不太了解，是非常危险的！”

追溯蔡澍的求学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刻关心社会现实的学者；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蔡澍对中国贫困问题如此关心。

### 从社会学到经济学

蔡澍本科读的是北大的社会学专业。谈到这段时光，他充满了美好的回忆。“那时，老师的管理十分宽松，我们学院甚至被称为北大的四大疗养院之一！我觉得这样自由的气氛，让同学们有更多的机会读自己喜欢的书，并交流感想。本科四年是

我学习生涯中最快乐的四年……”

令人惊讶的是，本科时期的蔡澍对经济学没有好感。班里很多人选择修经济学双学位，蔡澍却不随大流，选择数学双学位。“一开始以为经济学就是赚钱的，很多人对其趋之若鹜，我很不以为然。”

一切变化源于一次旁听。当时，北大经济中心的卢锋老师开了一门《经济学原理》，上完课后，蔡澍原先对经济学的偏见消除殆尽。“卢老师的课让我对经济学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让我认识到，不管经济学还是社会学，都关心社会问题。不同的学科，看待社会的角度不一样，分析框架也不一样。社会学可能更多基于概念推演，经济学则基于量化分析。经济学有点像数学和社会学的结合。”

更深入的学习，蔡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经济学将个体假设为理性经济人，通过清晰的逻辑推导，搭建一个理想化的模型，以此来讨论个体决策、人和人的互

动，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均衡结果。反驳它的唯一办法是挑战其假设。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推翻这些假设；另一种则是把假设放宽，将更广泛的问题纳入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中。”

蔡澍特别提到了加里·贝克 (Gary S. Becker)。贝克教授运用经济学的工具，分析更加广泛的问题。“比如他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家庭决策、成瘾性消费等等，这些都是早先经济学家没有考虑到的。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

渐渐地，蔡澍开始转向经济学的学习及研究。“我觉得，经济学的方法非常值得其他社会科学学习，从某种程度上，它是最接近科学的社会学科。”

### 名校还是名师？

蔡澍是一名学霸，当时，他拿到了牛津大学、香港科大的录取通知书。最终，蔡澍放弃了不列颠，选择了香港。许多人疑惑，为什么他放弃了名气大得多的牛津？蔡澍的这一选择，让我们窥见一位学者背后深厚的师承关系。

在北大读硕时，蔡澍的硕士导师是赵耀辉。赵老师是 CHARLS 项目的参与者，他的合作者之一是韩裔美国人 Albert Park (朴之水)。因为这层关系，在北大时，蔡澍就与 Park 相识。Park 的老师罗斯特，是早期研究中国的几个外国学者之一。Park 在读博时，便跟着罗斯



蔡澍(左一)和村民访谈

特在甘肃做调研。之后 Park 就一直做中国问题的研究,对中国问题有深刻的见解。由此看来,罗斯特亦是蔡澍的师公了。

当蔡澍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知道了 Park 要入职香港科大的消息。“其实没有想太多就做了决定。当然,名校可以提供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但平时接触、交流最多的,还是导师。读博士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导师。所以我觉得能够师从 Park 教授是非常难得的。”

最终,蔡澍和 Park 同一年进入香港科大。读博五年间, Park 和蔡澍是亦师亦友的关系。Park 教授手把手带蔡澍进行研究,“我跟他身后亦步亦趋。”蔡澍笑着说。“Park 教授不会限制学生的思路,而是启发我们寻找课题。一旦确定题目,他会告诉你可以看哪些文献,应该怎样展开研究。他不会马上否定你提出的课题。”

“想象力很重要,这是决定你能走多远的重要因素。得诺奖的人,一定是具有超凡想象力的人,但这不是全部条件,成功还要依靠勤奋。很多经济学家都很勤奋,包括我的导师,每天他都工作到凌晨一二点。我的导师为我树立了良好的模范。”

## 选择 IESR

蔡澍曾询问 Park 教授如何选择理想的工作地。“当时 Park 认为,首先,在这个平台可以与同一领域的其他学者交流。其次,我能够和这个平台产生交互,即,我为这个平台做出贡献,这个平台同时促进我的发展。”

人生道路上,总是充满意外的惊喜。

2015年11月,蔡澍跟冯帅章在一个会议上相见。“冯老师当时给我介绍了 IESR 的发展规划,我觉得很有吸引力。IESR 聚集众多年轻学者,很多老师跟

我的研究方向一致,内部有很多交流。同时,学院会邀请很多的学者来参加 seminar、暨南论道等活动,组织国际会议。尤其去年组织的 AFIT 会议,有诺奖得主 Heckman,能跟这么多牛人交流,这种机会十分难得。IESR 还是以数据和调研为导向,有社会调查中心,2017年 RUMiC 调查也要开始了,我想我也会加入其中。相信 IESR 的一定会越来越好吧。”蔡澍表示道。

相比读博时的生活,工作后蔡澍面临更加繁杂的任务。事务一多,时间变得比较零碎。然而,做研究需要一整段时间,集中思考一个课题,碎片化的时间对于研究非常不利。“我现在思考的是,如何改进自身的时间管理。尽量将琐碎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腾出一大段时间,集中精力做科研。”

## 深入乡村做调研

蔡澍还记得第一次参加调研的情形。那时,老师高超的访谈技巧,至今令他印象深刻。“那天,我跟北大社会学老师去北京四合院做入户调研。老师一进去,能很快与被访对象拉近关系,让访谈对象像话痨似的说出很多东西。”

概括来讲,蔡澍研究的是“人在有约束条件下的一些行为”。“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与理论中的前提条件不相符合。有很多文献都讨论贫困原因,共识之一就是市场的不完备。比如说,农业回报率其实挺高的,但农户缺钱无法进行农业投资,他们就没法获得这部分收益。”

目前,蔡澍主要研究的是中国的贫困问题。“某种程度上,这受到导师的影响。赵耀辉老师着力于劳动经济学, Park 着力于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这两个研

究领域有一个共通点——关心中国农村的发展。而到农村进行调研,一定程度上跟我原来学社会学有关系。”谈起深入乡村做研究的感受,蔡澍说:“乡间的老百姓挺愿意聊天,不像城市居民戒备心强、警惕性高。然而,由于他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访谈问题要保证简洁易懂,不能‘太学术’。”

“导致贫困的因素很多,像我们之前在中国做了一个随机干预实验,给农户提供贷款,有试验组和控制组,比较实验前后的变化,结果发现实验效果非常显著。类似的实验在国外也做过,实验效果却没有那么显著。由此可见,不同的地方,致贫原因也不同。因此,在制定政策或评估项目时,一定要因地制宜。”在蔡澍看来,“精准扶贫”的概念很重要,即一定要找准对象,下准药方。“我们要从理论角度做一些推演,指出在什么地方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蔡澍至今记得小时候,父母常对他说的两句话:“失败不灰心,回头找原因”、“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他看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一方面是由于兴趣,一方面是由于压力。

“我常常从做学术中寻找乐趣、获得成就感。比如我在做一些文献回顾时,阅读这一领域一些大牛的讨论。当发现他们对某个研究问题摸不着边、讲得不清楚时,我非常兴奋,觉得可以从这个点进行突破。这是很让人激动的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深入农村调研,目睹很多农村老百姓的疾苦,蔡澍感触很大。大都市灯火通明,能否照亮偏僻腹地的贫困人家?贫困人家的不幸,鞭策着蔡澍投入紧张的研究工作中……

(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学生记者 李蔚)

# 学生

# 天地



## 我院 2017 级硕士生 王慷楷参加昆山杜克大学 举办的“影响力 MAX” 英语演讲实训

精彩的公众演讲是表达自我的重要途径，而优秀的英文学术报告能力则是向国际化迈进的必备素养。为此，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硕士项目于 4 月 20 日至 4 月 23 日在江苏昆山举办了“'Maximize Your Impact'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Training”活动。报名信息一经发布，阅读量迅速破万，最终来自全国 19 所高校的 20 名同学成功入选。

即将进入 IESR 学习的首期硕士生王慷楷同学作为入选者之一在活动中做了题为“Migration,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报告。

报告认为，全球经济迅速增长，国

际贸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如何促进贸易模式的转变，尤其是对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在高收益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取得比较优势越来越受到关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此研究利用 World Trade Flow 和 BACI 贸易数据，以及世界银行公布的移民数据等，实证检验了移民通过传播知识而对动态比较优势演进所产生的影响。最终发现：即使一国在某种产品上不具备比较优势，但随着它与在这种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之间移民量的增加，该国也逐渐会在该产品上取得比较优势。举个例子，假设 A 国家 t 年在 P 产品上不具备比较优势，而 B 国家具有。当 A 国家与 B 国家之间的移民量（包括移进和移出）增加时知识得以传播，从而使得 A 国家一定时期内也会在 P 产品上

取得比较优势。

一方面，为了使这一逻辑更加可信，此研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对于移民而言，不论是移进还是移出都促进了知识传播和动态比较优势演进；第二，相对于标准品，差异品中知识的传播对移民的依赖性更强；第三，两国之间文化距离越近，知识传播越方便，比较优势演进也就越容易；第四，移民的这种影响在进入 21 世纪后有所减弱，这可能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致使各种通讯工具迅速普及。另一方面，考虑到移民行为的内生性，本文将期初（1962 年）的移民网络作为工具变量，重新对系数进行估计，结果与猜想一致并且比较稳健。

所以，此研究意在说明：不论是在文献中还是现实中，知识传播与技术交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不容忽视。国家间应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为经济增长贡献动力。

王慷楷同学报告结束后，Junjie Zhang 教授对他在活动中所取得的进步和展现出来的学术素养表示肯定，John Ji 教授对于其研究的结论表示认同，Donald Snow 教授认为他的报告充满激情与热爱，Allen 老师对其报告中化繁为简的例证和自然的过渡方式给予认可，Maxi-Ann 老师则表扬了他认真的态度；同时，各位老师对其以后改进和努力的方向提出了明确而中肯的指导建议。

（作者感谢在“Migration,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一文研究过程中北京大学杨汝岱老师和湘潭大学熊瑞祥老师的精心指导；感谢在湘潭大学商学院第六次季度论坛上，杜克大学陈华帅老师、复旦大学陈钊老师、中央财经大学张川川老师和上海财经大学张牧扬老师的精彩点评；感谢在暨南大学 IESR 首期学术夏令营中张思思老师、马祥老师、朱宏佳老师等的中肯建议。）

## 创新班： 打造经济学教育的“黄埔军校”

本专业排名第一 13 人，专业第二 7 人……这是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本科创新班预培养学生的第一学期成绩。这里汇聚了来自大陆及港澳台地区 20 多个学院、30 多个专业的 57 名同学。从去年 11 月开始，他们每周六从番禺、珠海、深圳校区风尘仆仆赶到校本部，学习 IESR 的两门全英文课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去年 10 月底招生时的宣传语——“一次考试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可能”，鼓励学生勇于改变，为未来创造更多可能性。开班至今，是时候来了解一下这个以“国际化”为特色的创新班究竟“特别”在哪里了。



冯帅章院长与同学们交流

## 用一流的师资 培养一流的学生

说起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你估计会有如下印象：频繁的 seminar、诺奖得主多次来访、教师多毕业于海外名校、论文发表不停歇、社会调查中心有多项大型调查……而在学生培养方面，作为一个成立仅 1 年多的学院，也有她的独到之处。2016 年的优秀本科生夏令营招生中，共 500 多名学生报名，吸引他们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独特的人才培养方式：北美一流经济系培养模式、全英文授课、高师生比、一流项目实践机会。本科生创新班，更是强调本科生基础知识的夯实以及培养学生的自主性。

院长冯帅章从教 10 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让经济学培养有所突破。2015 年，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到 2020 年，中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这样的愿景给了冯帅章鼓励和动力。“何为一流？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师资肯定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他屡次强调，“将一流的师资最大限度地运用在培养一流的学生上去。”

身处广州，冯帅章总会想起当年的黄埔军校，并为黄埔军校广聘天下贤士，接纳全国一流军事、政治俊杰到校工作的远见卓识感到敬佩，他希望创新班也能这样。因此，研究院成立了本科生创新班，用一流的师资培养一流的学生。

## 全英文教学 全方位挑战

创新班所有课程使用国际一流经济学项目通用的英文原版教材，坚持英文授课，因为“英文授课正是国际化的基础，能保证学生与国外主流学术界的交流没有障碍。”冯帅章说。虽然英文授课增加了听课的难度，但不少同学反馈：只要持之

以恒地看，半年就会发现自己的英文阅读能力大幅提升。研究院还聘请了多位特聘教授为学生上课。这里不乏优秀的师资，这一点从近期举办的各类高质量学术活动就可以看出。“研究院 1 周年院庆时，请了 5 位长江学者来演讲，那天让我感受到这里的学术气氛真的很浓厚。”创新班的刘同学说。

有了好的师资与环境，课程的设置便是重中之重了。据冯帅章介绍，研究院将会为同学们开设写作训练工作坊，帮助同学们在思考与写作的互动过程中，完善逻辑思维链条。因此，对同学们来讲，课程压力不小，但效果却不错。参加创新班预培养的武同学称：“虽然每周 4 个多小时的往返车程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既要兼顾本专业课程又要让自己学好 IESR 的内容让我不得不争分夺秒，但这个过程却让我感到充实。”

夯实基础之后，走出象牙塔解决现实问题则是创新班的另一个目标。社会调查中心为同学们提供了实践的窗口，组织开展了多项如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等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学生们将跟随调查中心深入一线，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

据介绍，首期创新班最终将选拔约 20 名学生，对于他们的毕业去向，冯帅章认为有无限可能。但是，在培养阶段给予学生丰富的海外交流机会是必须的。“这 20 多位同学就是我们的宝贝，无论怎样，我们都会努力给他们提供海外一流的交换项目。”冯帅章说，比如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已经和我们长期合作共同举办暑期学校，为本科生海外交流提供了基础。



首届创新班预培养同学

## 学霸与创新班的邂逅

去年 10 月，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启动了首届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本科项目的招生工作。通过各种宣传渠道，IESR 向欲转专业的大一学生发出了邀请。在招生宣讲、答疑活动中，不少学生都表示由于种种原因，没能进入到自己理想的专业，一时找不到改变的出口与路径，而创新班的开办，为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重启了一扇门。

经过笔试与面试选拔，57 位同学进入了创新班的预培养阶段，通过 1 年的预培养课程，创新班将根据他们的成绩与学校的标准决定他们是否最终转入经济与社会研究院。1 学期下来，他们在本专业与创新班的成绩都堪称“学霸”级别的。但是，“好的成绩并不是创新班的培养目标，关键是能为学生提供一个自我成长环境。”冯帅章说，“我最近在读清华大学钱颖一

教授的书，有一点很有感触，杰出人才可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从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创造环境，远比培养更重要。”所以他希望同学能培养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

“永远保持一颗对知识的好奇心非常重要。”冯帅章院长在与同学们交流时提到，曾两次访问研究院的 2000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J. Heckman 教授就是一个对现实不断发问的人，一个至今还奋斗在研究第一线的经济学家，却常常能从本科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希望同学们也能够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对于创新班预培养的学生来说，课程只完成了一半，两个学期的综合成绩决定他们能否最终成为创新班的首届学生，但无论是否如愿，他们这一年的体验都将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武茜 卢晶亮

## “我们欢迎善思考、爱提问、敢试错的同学”

——记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与经济学本科创新班预培养同学交流

4月8日，利用课余时间，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与经济学本科创新班预培养的同学们在惠楼106B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冯帅章教授一方面分享了他对于创新班学生培养模式的理解与规划，一方面也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短短半个小时的交流，教室不时传来了同学们的笑声，冯帅章院长真诚、幽默、既“务虚”又“务实”的分享迅速感染了在场的同学们。速速来看冯帅章院长到底对同学们说了些什么？无论你是不是创新班的同学，都会有所收获。

### “务虚”：创新班需要我们共同尝试、共同探索

冯院长首先向各位同学们表示祝贺，

在上一学期，创新班的同学在宏观、微观两门课程平均分90以上达10人，同时，同学们在本专业排名前五的达到30人。冯院长为同学们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感到高兴，但是，“和成才、成人相比，成绩远远不够”。

### 首先，创新班希望同学们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本科同学早已成人，应该培养自己对信息的判断能力。冯帅章认为，创新班本来就是一种尝试，因此任何创新都是有风险的，绝非一条坦途。如果按部就班地走一条坦途，奋斗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最终加入创新班的同学应是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一同成长、经历的同学，“我们希望你们是有创造性的学生、勇敢的学生、敢于接受失败的学生、勇于承担的学生。”

### 其次，是永远保持一颗对知识的好奇心。

冯帅章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 他还举了另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曾两次访问研究院的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J. Heckman教授就是一个对现实不断发问的人，一个至今还奋斗在研究一线的经济学家，却常常能从本科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与学生合作做研究。“和Heckman教授聊天，感受到他是一个充





满好奇心的人，他强烈的求知欲望深深感染了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也都是不耻下问的人。”

**“务实”**：国际化创新班的 6 个突破  
虽然冯帅章院长并未给同学们绘制出一幅清晰的蓝图，但创新班至今已经确定了 6 个努力的方向，并将始终坚持。

**全英文授课**：从创新班成立伊始，英文授课就是坚定的一大原则，英文授课正是国际化的基础，保证学生与国外主流学术界的交流没有障碍。

**特聘教授授课**：研究院对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培养，一贯坚持了最大限度利用最优质的教师资源，本科生授课教师不仅包括研究院毕业于海外名校的优秀教师，还包括研究院的多位特聘教授，包括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胡颖尧教授等知名教授都会为学生带来短期授课。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老师，还是特聘教授，我们就是想精雕细琢地为你们上基础课。”

**夯实基础训练**：冯帅章院长强调，创新班定会帮同学们打牢基础。例如写作能力，是一个容易忽视但却重要的能力，缺乏写作能力的培训将阻碍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研究院将会为同学们开设写作训练工作坊，帮助同学们在思考与写作的互动过程中，完善逻辑思维链条。

**海外交流**：冯帅章介绍，首期创新班最终将选拔 20 名左右同学，“你们就是我们的宝贝，无论怎样，我们都会努力给你们提供海外一流的交换项目。”目前，来访研究院的知名教授来自 40 多所海外名校，并与研究院建立了长久的合作，比如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已与研究院长期合作共同举办暑期学校，为本科生海外交流提供了条件基础。

**大型调查实践机会**：“有一次我问耶鲁大学的 Mark R. Rosenzweig 教授，我们做很多追踪的调查时间非常长，有意义吗？他回答我，任何的知识都是从经验里获得的。”冯帅章教授介绍，无论掌握多少理论知识，没有实践的支撑都是空想，社会调查中心已经承担了很多大规模调查项目，将为同学们提供很好的实践机会。

**创造条件因材施教**：“如果你很出色，我们就会为你创造机会，让你在本科阶段就能为诺奖得主做助研。”研究院的师生比，可以保证每位同学都有一位专业导师，为每位同学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培养，无论是在学业还是成长与职业规划上。最后，冯帅章还一一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疑问，例如有同学担心自己数学不好怎么办、学术活动是否优先对本科生开放等等，冯帅章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同学们以鼓励，让短短 30 分钟的交流给同学们以无限的思考。

# 图说

# 研究院举办首次 师生乒乓球赛

## ◀ 比赛精彩瞬间



## ▼ 参赛人员合影



## 获奖人员合影 ▼





# IESR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丰富、客观的社会经济问题解读视野。